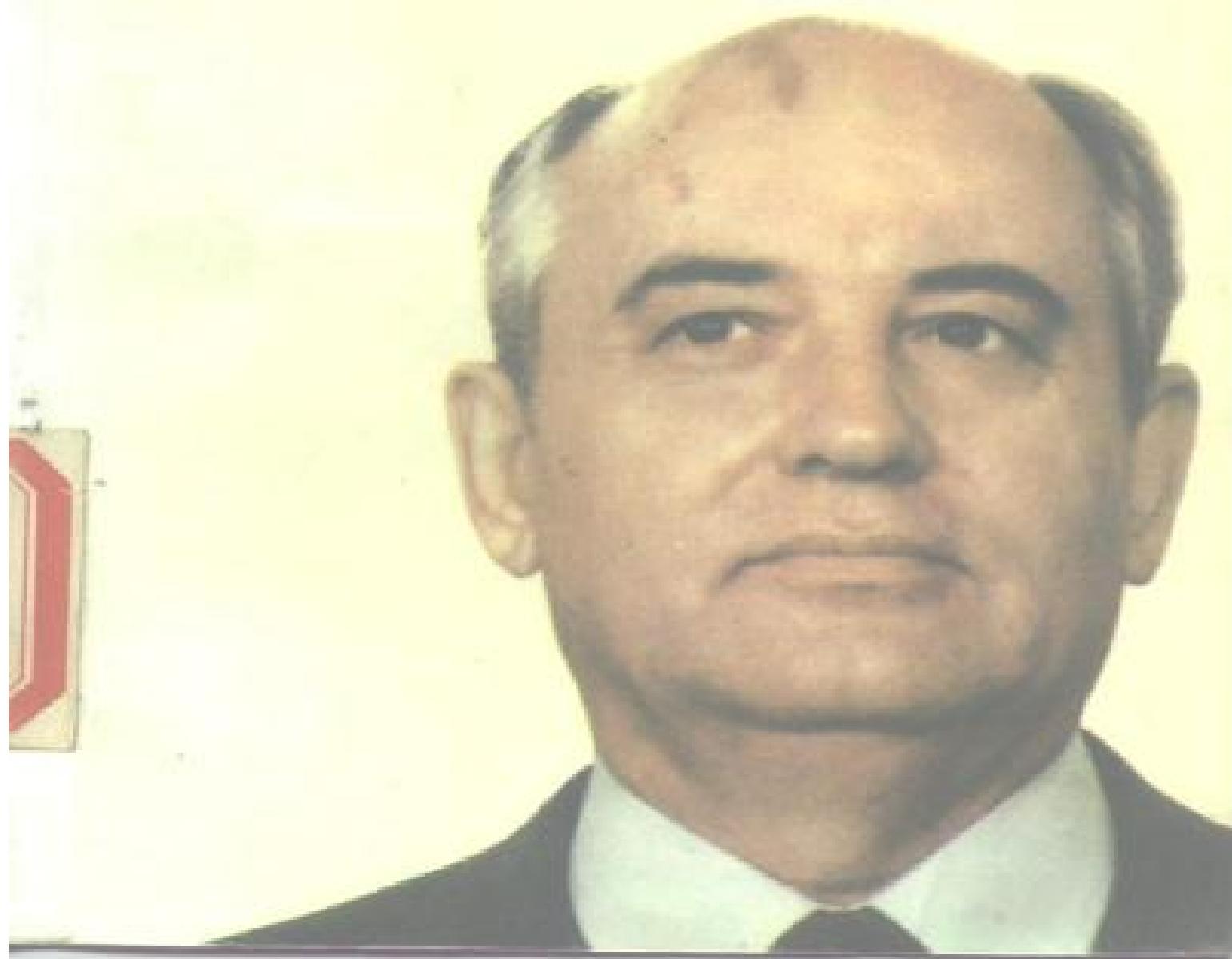


改革与新思维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 著



D 3512-1
3

69589



200045067

改革与新思维

[苏] 米·谢·戈尔巴乔夫 著
苏 群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ев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87, г.

改革与新思维

[苏] 米·谢·戈尔巴乔夫 著
苏 群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排版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插页2张 185,000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数：80,001—180,000

ISBN 7—5011—0155—8/D·28

统一书号：3203·150 定价：2.80元

DI20/14

出版前言

为解释苏联改革中的对内对外政策，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美国一出版商的请求，撰写了《改革与新思维》这部具有国际影响的新书。1987年11月，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美国哈泼—罗公司分别用俄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将这书同时出版。本社为适应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十三大精神，研究深化改革的需要以及了解当今世界的需要，特将俄文版翻译出版，献给我们敬爱的读者。

新华出版社编辑部

1987年11月

译者的话

目前，正当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读者对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表现出浓厚兴趣的时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适时地出版了他轰动国际社会的新著《改革与新思维》。

本书对斯大林30年代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政策，对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196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重新作出了评价，详细介绍了苏联当前改革的根源和实质、措施和步骤、问题和前景，还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包括苏联同中国、美国、欧洲、亚洲、中东、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因此，本书得以在我国出版是一件

有意义的事，它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苏联的内外政策，有益于我国当前的改革。本书的注解是原俄文版自注的。

由于时间仓促，译文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7年11月

目 录

致读者 (1)

上篇 改革

第一章 改革：起源、实质、革命性质 (11)

第二章 改革开始 初步结论 (69)

下篇 新思维与世界

第三章 我们怎样看待当代世界..... (169)

第四章 苏联的改革与社会主义世界..... (205)

第五章 国际社会中的“第三世界” (218)

第六章 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欧洲..... (245)

第七章 裁军问题和苏美关系..... (272)

结束语..... (333)

致 读 者

我写这本书，是想同各国人民直接对话，同苏联人民、美国人民和任何国家的人民直接对话。

我曾经会见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人士，会见过这些国家公众的代表。本书的宗旨是：不通过中间人，直接向全世界的公民谈谈我对毫无例外地涉及所有人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我写这本书，是相信全世界的公民有健全的理智。我相信，他们也和我一样，我们大家都为我们星球的命运感到耽心，而这是最主要的。

我们应当彼此交往，我们应当本着合作精神，而不是本着敌意来解决问题。我非常清楚，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我的想法。而且，老实说，我本人也不是全都同意别人就各种问题发表的看法。这就尤其要进行对话。这本书便是我对这种对话所作的贡献。

本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宣传性论著，虽然读者

在书中将看到的评价、结论和分析方法，当然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前提为依据的。这多半是对改革，对我们面临的问题，对变革的规模，对我们时代的复杂性、责任和独特性的评述和思索。我有意不在书中引用大量实际材料、数字和细节。这是一部谈我们的打算，谈我们准备如何实现这些打算的书，我再重复一句，这是一本邀请人们参加对话的书。本书的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来阐明新的政治思维和对外政策的哲理的。如果这本书能有助于增进国际信任的话，那么，我认为，它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何谓改革？为何需要改革？改革的实质和目的何在？改革摒弃什么和创造什么？改革进行得如何？它会给苏联和国际社会带来哪些后果？

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理所当然要提出的问题。许多人——政治家和商人、科学家和记者、教师和医生、神职人员、文学家和大学生、工人和农民——都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多人想知道，苏联实际上在发生什么事情，况且西方报刊和电视对我国不怀好意的报道，一浪接着一浪，从未间断过。

改革是我国社会精神生活所关注的中心。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涉及国家的命运。改革带来的变化，关系到所有的苏联人，触及最迫切的问题。人人都关心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我们自己，而且还有我们的

子孙后代将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之中？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改革抱有浓厚兴趣是十分自然的。它们也在经历自己发展中一个不简单的，但却十分重要的探索时期，并且在拟定和探索加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途径。这能否成功，与我们的互相协作、我们的共同行动和操心有很大关系。

因此，现在人们对我国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在世界事务中具有的实际分量。

有鉴于此，我才答应美国出版商要我写这本书的请求。我们希望被人理解。

苏联确实在经历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苏联共产党对直至80年代中期形成的局势作了批判性分析，制定了以改革和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革新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思想为基础的方针。苏联人理解并且接受了这一政治方针。改革使整个社会动起来了。当然，我国是个大国，积存的问题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变革业已开始，要使社会倒退已经不可能了。

西方，包括美国在内，对改革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似乎改革是由于苏联经济陷入悲惨境地而引起的，它反映出人们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最终目标发生了危机。不管这种说法的动机如何，没有什么能比它离真理更远的了。

当然，促使我们改革的重要因素是，我们对最近几

年我国的状况感到不满。然而，之所以要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现在，在我们革命7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拥有牢固的物质基础，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宽广的精神世界，能够目标明确地和不断地完善我们的社会，使我们的全部工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越来越高的效益。

我要事先说一下：改革工作比开始设想的更困难些。许多事情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但是，我们每迈出一步，就会更加相信，我们已经开始和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有人硬说，我国改革提出的重大任务，也迫使我们最近在国际舞台上必须提出一些和平倡议。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解释。众所周知，苏联早就奉行和平与合作的方针，从前也提出过许多建议，如果这些建议当时能被采纳，就会使国际形势健康化。

我们确实关心为我们国内的进步创造正常的国际条件。但是，我们主张建立没有战争、没有军备竞赛的世界，主张建立没有核武器和没有暴力的世界，并不仅仅因为这是我们国内发展的理想条件。这是根据当代现实而产生的世界范围的客观需要。

可是，我们的新思维在发展。世界不但生活在核威胁的气氛中，而且还有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新的紧张

状态没有得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和紧张状态是由于科技革命和全球问题激化而产生的。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任务，如果不能共同解决这些任务，人类的未来就成问题了。各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休戚相关。而积存的武器，尤其是导弹核武器，使得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即使这场战争不是蓄意挑起的，而是由于技术上的差错或心理失常偶然产生的。这样一来，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会成为牺牲品。

看来，大家都已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这场战争中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失败者，因为不会有谁能保全下来。这是对所有人的死亡威胁。

核死亡的前景无疑是事态发展可能导演的最可怕的“脚本”。但是，问题还在另一方面。军备竞赛的飞轮，同世界的军事和政治现实以及迄今依然存在的核时代以前的政治思维传统一起，正在妨碍各国和各国人民进行合作，而无论东方或西方都同意的一种看法是：如果没有这种合作，世界各国都无法保护大自然，不能保证自然界的财富得到合理利用并使之再生。就是说，不能按照人应有的方式生存下去。

的确，世界已今非昔比，世界上的新问题再不能按照过去世代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难道现在可以抱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这一观点不放吗？

总而言之，我们苏联领导人得出的结论——而且我们将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结论，就是必须采用新的政治思维。而且，苏联领导人正力求把它变成实际行动，首先是在裁军方面。因此，我们诚恳地向全世界提出了对外政策倡议。

具有历史意义的新思维所包含的范围有多广呢？它实际上包括了当代所有的主要问题。

尽管当代世界矛盾重重，尽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尽管各国人民在不同时期作出的选择各不相同，但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大家都是地球这条船上的乘客，不能让这条船翻沉。第二艘诺亚方舟是不会有的。

政策应以现实为基础。而当今世界最严峻的现实是，恰恰是美国和苏联集中了大量的武器，其中包括核武器。这就使我们两国对全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真诚地希望苏美关系健康化，希望彼此之间哪怕是达成起码的谅解，这种谅解是解决那些决定世界命运的问题所必需的。

我们坦率地说，美国的霸权欲望和全球野心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不喜欢美国政治和生活的某些方面。然而，我们承认美国人民和任何其他国家人民一样，有权按照自己的原则和法律、自己的风俗和兴趣生活。我们知道美国在当代世界上起着巨大作用，并且考虑到

这种作用。我们珍视美国人对世界文明所作的贡献，尊重美国合法的民族利益，并且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个国家参加，那就不可能消除核浩劫的威胁，无法保障稳固的和平。我们对美国人民不怀任何恶意。我们希望并且准备在各个方面进行合作。

但是，这种合作要在平等、互相谅解和互相促进的基础上进行。美国把我国当作侵略者、“万恶的帝国”等等，散布关于我国的种种谣言和谎言，散布对我国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情绪，策划各种各样的禁止措施，同我们打交道时很不文明，这不仅使我们感到失望，而且引起我们的深思。这种目光短浅的做法是不能容许的。

时间在流逝，不能白白失去时光。应当采取行动。形势不容人们等待理想时刻的到来，今天就必须进行建设性的和广泛的对话。从这点出发，我们在苏美城市之间、在苏美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在美国和苏联的老百姓之间架起了电视对话实况这座桥梁。我们的舆论工具详细报道西方的各种立场，包括最保守的人的立场。我们鼓励同世界观和政治信仰不同的人士接触。这表明我们方面已认识到，这种做法有助于向建立一个彼此可以接受的世界迈进。

我们绝不认为只有自己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我们并无包治百病的药方，然而，我们诚心诚意愿同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寻求所有问题，其中包括最困难的问题的答案。

上 篇
改 革



第一章

改革：起源、实质、革命性质

现在来谈谈改革。为什么和怎样产生了这一思想呢？它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意味着什么呢？改革将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呢？它会对外部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广大公众感到关切，并在积极地进行讨论。先谈第一个问题。

改革是迫切的需要

我认为，要想了解苏联进行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必须注意下面这一点：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号召、任何全会、甚至党代表大会都不可能发动人们投入这项工作，而今天这项工作却在我国全面展开，并且投身这项工作的苏联人一天比一天多。

改革是迫切的需要，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

深刻进程中产生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迫切需要进行变革，可以说，为了变革，它历尽了艰辛。而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

根据对80年代中期前社会中形成的局势的广泛而坦率分析，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近几年逐渐开始补充一些新人的国家领导所碰到的正是这种局势及其种种问题。我想谈谈这一分析的主要结果。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曾反复思考，不仅回顾了我们的不久的历史，而且也回顾了更遥远的历史。

70年前发生伟大革命的俄国是个古老的国家，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其中充满探索、成就和悲剧性事件，为人类奉献了不少新发现和杰出人物。

但苏联是个年轻的国家，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世界上，都没有类似的情况。按照人类文明的尺度来衡量，70年是个短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国家走过了相当于几百年的道路。在以前落后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拥有巨大的生产力、雄厚的智能潜力、高度发达的文化，是100多个大小民族组成的独一无二的大家庭，为世界1/6土地上的2.8亿人提供了可靠的社会保障。所有这些成就是巨大的、无可争议的。苏联人有权为此感到自豪。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使我们国家显得比过去和现在更好一点。我不想叫别人把我看作辩护士，认为只要是“自己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必然是优越的。我在这里所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情况、真正的事实、我国几代人劳动的明显成果。而且同样明显的是，只有依靠革命，国家才能有这一飞跃。这是革命的成果，是社会主义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成果，是我国人民作出的历史性选择的结果。这些成果表现了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的功勋，千百万劳动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功勋，他们在70年前承担了对自己国家命运的直接责任。

我希望读者能思考这一切，否则就难以理解我国社会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我再谈谈我国发展的历史。现在要谈的是80年代前夕国内形成的复杂局势，这一局势使改革成为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在某个阶段——这一点在70年代下半期尤为明显——发生了乍一看很难解释的现象。国家开始失去前进的速度，经济工作越来越乱，积累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问题，而且日益尖锐化，未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停滞现象和其他一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形成了某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科学技术革命开辟了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新前景的条件下出现的。

出现了颇为奇怪的景象：一部大机器的巨大飞轮在

转动，而与工作岗位相连接的传动皮带却在空转，或者转得十分无力。

在分析国内局势时，我们首先碰到的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最近3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而到80年代初，已下降到使我们几乎临近经济停顿的程度。一个以前大力追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国家，开始明显地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而且，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和开发现代化技术设备和工艺等方面，同这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追求“总产值”的做法，尤其是在重工业中，已成为“最高任务”，简直就是唯一目的了。基本建设方面也是如此，由于施工期限漫长，大量国家财富被积压。建造了一些造价高但又不能保证达到最高科学技术指标的项目。凡是花费劳动、材料、金钱越多的，就被认为是优秀工作人员或优秀企业。按说生产者“讨好”消费者才是正常的，而在我国，消费者却要由生产者摆布，恩赐给他什么他就用什么。这又是追求“总产值”的结果。

我们许多经营管理人员的典型思想是：不是关心增加国家财富，而是关心在某个产品中消耗更多的材料、劳动和工时，并且卖得贵点。结果是“总产值”有了，而商品却不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用于单位产品的

原料、能源、其他资源，过去就多出很多，现在仍然多出很多。我们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把我们惯坏了，说得粗鲁点，使我们腐化了。我国的经济在不小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能在几十年时间里一直以粗放方式向前发展。

我们是在优先增加产品数量的思想下培养出来的，因此在试图阻止速度下降时也主要是采取越来越多地增加消耗的做法——扩大燃料动力部门，加紧向生产中投入自然资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日益难以开发，而且越来越昂贵。以粗放方式扩大生产基金的做法导致劳动资源的人为缺乏。在缺乏劳动资源的压力下，为了使状况有所改变，开始发放大量毫无根据的、实际上不是挣得的奖金，实行了各式各样不应有的奖励，而后来又因此产生了为捞钱而弄虚作假的做法。滋长了寄生思想，诚实的、高质量的劳动的声誉开始下降，“平均主义”心理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劳动量和消费量之间的联系遭到破坏，这几乎成为障碍机制的关键环节，不仅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也导致社会公正原则遭到歪曲。

于是，粗放发展的惰性就把经济拉进了死胡同，使发展停滞下来。国民经济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把大量石油及其他燃料动力和原料商品投放世界市场的做法，

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使疾病内延了。卖这些东西得到的外汇主要用于解决日常任务，而不是用于经济现代化和克服经济的技术落后状况。

经济中的障碍和停滞现象不可能不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消极现象严重地触动了社会领域。形成了对发展社会文化领域拨款的所谓“剩余原则”，也就是说，对纯生产工作拨款后剩下多少，就给这个领域拨多少。出现了一种对社会问题“装聋作哑”的奇特现象。社会领域在技术装备及干部水平方面，而主要是在工作质量方面开始落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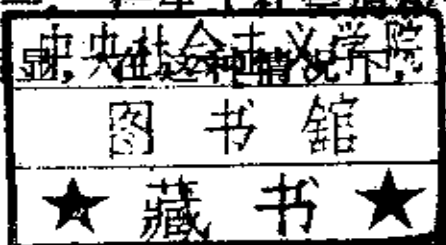
这就又出现了反常现象。我们的社会顺利地解决了居民就业问题，一些具有原则意义的社会保障有了保证，而与此同时，在满足对改善居住条件以及食品质量甚至数量的不断增长的需求方面，在应有的水平上组织运输工作、医疗服务和教育方面，在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其他一些问题方面，我们却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形成了荒谬的局面。苏联在钢、原料和燃料动力资源生产方面规模巨大，早已无可匹敌，同时却由于浪费、无效的利用而又缺少这些东西。苏联在粮食生产方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却要每年购进几百万吨谷物作饲料。按每千人平均计算的医生、医院床位最多，但同时在医疗服务中又存在严重缺点，服务质量下降。我们

的火箭以惊人的准确性找到哈雷慧星并飞上金星，而在取得这一科学和工程思想的重大胜利的同时，却在为了国民经济的需要而采用科学成就方面明显落后，我们的许多家用电器落后于现代水平。

但遗憾的是，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思想和道德价值好象在悄悄地，似乎不知不觉地开始磨损了。发展速度眼看着急剧下降，全套质量指标恶化，不愿接受新的科技成果，生活水平提高缓慢，食品、住房、消费品和生活服务方面遇到困难。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障碍机制，它有很大能量，以致对迫切问题进行建设性分析的种种尝试和新的思想都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宣扬成绩——真的和假的成绩的做法占了上风，同时又忽视普通劳动者和公众的正确要求和意见。在社会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评价和推断却成为只能加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学术的、理论的和其他的讨论遭到阉割，没有这种讨论就不可能使思想得到发展和有创造性的生活。文化、艺术、政论乃至教育、医学也未能避免消极倾向。粗制滥造、形式主义、无谓的空谈也在那里露头了。

把现实说成“没有问题”的做法起了不好的作用：造成了言行不一，产生了社会消极性和对提出的口号的不信任。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号召的东西，对



讲坛上讲的东西，对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就开始不那么相信了。社会道德开始堕落，在革命的英勇时期、头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卫国战争和战后复兴时期锻造出来的人和人彼此同心同德的伟大感情削弱了，酗酒、吸毒和犯罪开始滋长，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公式化的“大众文化”更严重地渗入苏联社会，把下流无耻、低级趣味和精神空虚强加给我们。

党的领导削弱了，某些重大社会活动中的创举被忽视了。领导方面的停滞不前已十分明显，领导人更迭的自然过程遭到破坏。在某个阶段，这导致了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整个苏共中央委员会、党和国家机关工作能力的削弱。

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奖赏、称号和滥发奖金的做法，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社会自我感觉的真正关心。形成了对一切都原谅的局面，严格要求、纪律性、责任心削弱了。所有这一切都企图用冠冕堂皇的活动和宣传声势、在中央以及地方上庆祝种种纪念日的办法来加以掩饰。日常的现实世界和被粉饰的太平世界越来越发生矛盾。

地方上的许多党组织不能坚持原则立场，不能同消极现象、为所欲为、官官相护和纪律松弛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党员平等的原则越来越遭到破坏。许多身居领导职位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这就导致工作中的失

败和严重的违法乱纪。

在某些领导环节中，出现了无视法律、容忍种种弄虚作假和贪污受贿、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现象。某些工作人员的行径引起劳动人民的应有愤慨，他们辜负了信任和重托，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某些人甚至成为犯罪行为的同谋，有的还是主谋。

为了公正起见，应该说，这些年还是解决了许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第一，这只是早就应该解决的那些问题中的一部分问题；第二，就连已作出的决定实际上也没有得到执行，或者只是部分地得到执行。而最主要的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带有不全面的性质，只触及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而不去触动业已形成的障碍机制。

不言而喻，党组织采取了行动，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真诚而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承担的义务。但还应当承认，在那些年代里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

总的说来，党和国家机关的实际行动落后于时代和生活本身的要求。问题增加的幅度比解决的大。社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我们原以为我们在进行管理，而实际上已形成了列宁早就警告过的局面：汽车不是驶向掌握方向盘的人想去的地方。

当然，我们绝不是要给这个时期抹黑。绝大多数苏联人在诚实地劳动。科学、经济、文化在继续前进。这

样，消极现象和消极过程就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和痛心。

我想，所说的情况足以使人认识到，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状况是多么严重，多么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党产生了力量和勇气，能够清醒地评价局势，承认必须进行根本变革和改造。

不抱偏见的诚实态度使我们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这一结论是在1985年4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作出的，这次全会标志着转向新的战略方针，转向改革，给改革的构想提供了依据。

我想就此强调指出，这个分析在四月全会以前很久就开始了，因此全会的结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不是即兴之作，而是考虑周到、仔细斟酌的立场。如果认为，1985年3月的中央全会刚开过一个月，就突然冒出一批人来，他们对一切都明白，对一切都认识到了，并且这些人对所有问题都一清二楚了，那是不对的。这样的奇迹是没有的。

变革的潜力不仅在物质生活领域，而且在社会意识中，都已成熟了。

具有实践经验、正义感、布尔什维克原则性的人，都批评那种根深蒂固的处理事务的做法，不安地指出了道德堕落、革命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受到侵蚀的苗头。

在工人阶级、农民中，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党的机关里，在中央和地方，逐渐开始认真思考国内发生的事

情，更明确地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人们对于在十月革命和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价值观念遭到践踏日益感到迷惑不解和愤慨。所有诚实的人都痛心和难过地看到，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精神不振和怀疑一切，他们不大尊重劳动，不择手段地想发财致富。我国人民对言行不一是很敏感的，无怪乎我国的民间故事中经常嘲笑虚张声势和大讲排场的行为，我国的文学作品无情地抨击不公正和滥用职权的现象。在我国的精神生活中，文学作品的作用历来是巨大的。作家、电影工作者和戏剧工作者在自己的优秀作品中传播对社会主义思想成果的信念和对社会精神复兴的期望，他们不顾官僚主义的呵斥甚至迫害，一步一步地从精神上培养人们作好改革的准备。

我这样讲，是想让读者明白：我国人民、我们党早已积蓄了革命变革的精力。我们产生改革的思想，不仅是受实用的利益和想法的影响，而且是出于良心不安的召唤，是由于从革命那里继承下来的永不衰竭的思想的影响，是由于理论探索的结果，这种理论探索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坚定了采取行动的愿望。

向弗·伊·列宁求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

我们伟大革命的生气勃勃的动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党和人民不能容忍那些使革命成果有丧失的危险的现象。弗·伊·列宁的著作、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对我们来讲仍然是辩证的创造思想、理论财富和政治上高瞻远瞩的取之不竭的源泉。而列宁的形象本身则是崇高的道德力量、渊博的精神文化和无限忠于人民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榜样。列宁继续活在亿万人们的心灵中。对列宁遗产的兴趣，以及想在原著中更全面、更扎实、更认真地了解他的渴望，随着社会上消极现象的日积月累而不断增长，并且冲破了烦琐哲学家和官气十足的学究所设置的重重障碍。

党内和社会上都求教于列宁，这在寻求对所产生的问题的解释和答案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列宁生前最后几年的著作特别受到重视。我以亲身体验来证实这一点。1983年4月22日，在弗·伊·列宁诞辰113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中，我就曾援引过列宁关于必须考虑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关于计划工作和经济核算、关于善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的论点。听众们对提到列宁的思想表示热烈支持。我又一次感觉到，我的思考同党内同志和许多人的心情是不谋而合的，他

们非常关心我们的苦楚，真诚渴望改变状况。的确，党内许多同志强烈地感到必须革新社会，迫切需要变革。尽管应当说，在我那次讲话之后，也感到了另一种情况：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我的报告，因为这个报告不象当时所要求的那样乐观。

今天，我们对弗·伊·列宁晚年著作的涵义和这些著作出现的原因有了更好的理解，这些著作实质上是他的政治遗嘱。在他身患重病时，他曾对社会主义的命运感到十分耽心。他看到了新制度将要遭受的危险。我们应当懂得这种耽心。他看到，社会主义遇到大量问题，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资产阶级革命所不能解决的许许多多问题。因此，要利用那些好象是社会主义本身“非固有的”、至少与公认的社会主义建设概念有某些差异的形式。

的确，列宁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时期。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力量，这个时期是有教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是根据对实际历史情况的分析来作出自己的结论的。我们之中许多人早在四月全会前很久就懂得，必须结合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文化、民主和对外政策再次周密地考虑一切情况。而主要的是要转向生活实际。

不是振振有词的宣言，而是仔细拟定的纲领

改革的构想问题也是逐渐成熟的。还在四月全会前，就有一个党和国务活动家小组在对经济状况进行综合分析。这种分析后来就成了改革的各项文件的基础。我们利用科学家和专家们的建议、现有的潜力以及社会思想界所创造的一切好东西，拟定了基本思想，形成政策，这一政策后来已开始执行。

这样，建设性的思想便积少成多。因此，在四月全会上便能提出比较周密的和系统化的纲领，制定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战略和行动策略。毋庸置疑，修修补补是不行的，需要彻底改革。等待也不行，因为时间本来已经错过许多了。

首先提出了振兴经济局面的问题，以及刹住并扭转这个领域中的不良趋势的问题。

眼前的潜力——我们当然已注意到这种潜力——在于整顿经济的起码秩序，加强纪律，提高组织性和责任心，促进落后单位赶上来。曾经进行而且现在仍在进行大量的紧张工作。正如我们所期望的，这项工作已产生初步成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已经停止，甚至有所提高。

但是，我们当然懂得，只靠这些手段，经济是不可

能蒸蒸日上的。大家知道，主要的深厚潜力在另一方面：对经济结构进行重大的改革，改建经济的物质基础，采用新的工艺，改变投资政策，建立高水平的管理体制。所有这一切归结为一个要点，即加速科学技术进步。

在四月全会后，苏联新领导人的第一个纲领性行动是在1985年6月苏共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这当然并非偶然。这次讨论完全不是多年来所习惯的那种议论，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这是痛苦的，但却是热情的批评。而所谈的主要是向集约化经济，向崭新的经济增长方面过渡的具体而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在那一年，在极短的时间内制定了关于科技进步重要方面的重大的综合纲要。纲要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要取得重大的突破，达到世界水平。

实质上制定了新的投资政策和结构政策。重点已从新建转到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资源、大大提高产品质量上。我们将依然十分重视发展采掘部门，但是，在保证节约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方面，重点则放在采用节约资源的工艺和合理利用资源上。

制定了一项特别计划，目的在于使机器制造业现代化，这个部门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使机器制造业产品彻底更新换代，目标是争取在90年代初就达到世界水平。当然，计划本身也包括对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改造，我们现在清楚地懂得，不这样做既不可

能使技术进步发生转折，也不能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出现转折。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在本书中还要多处谈到。

当然，经济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主要关心的事。但是，我们同时也着手改变社会的道德心理状况。还在70年代，许多人就懂得，如果在思维和心理方面，在工作的安排、工作作风和方法方面，在各地，既在党内，也在国家机关和领导层中不发生急剧的变化，那是不行的。而这种变化已经发生了，其中既包括在党中央，也包括在政府内。需要对各级干部进行某种重新配置。一批新人已经走上领导岗位，近几年来他们对形势很敏感，对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有自己的见解。

同无论来自何人的破坏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的现象，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宣布了公开性方针。让那些主张党、国家和经济机关及社会团体的活动要具有公开性质的人放手去干，取消了毫无根据的限制和禁令。

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调动人的因素，也就是不考虑人们、劳动集体、社会团体、各个社会集团多种多样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吸引他们进行积极的创造活动，要解决任何一项任务和改变国家的状况都是不可思议的。

列宁的下面这个出色的提法早就引起我的注意：社会主义是群众的活生生的创造。社会主义不是先验的理

论模式，按照这个模式，社会分成发布指示和执行指示两类人。我非常厌恶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简单化的和机械的理解。

正是人民、人及其多种多样的创造活动，才是历史的主角。因此，改革的初始任务、它的必备条件及其成功的保证在于唤醒人们，使他们成为真正积极的和关心改革的人，使每个人感觉到自己是国家、本企业或机关、本研究所的主人。这是主要的。

让人们参与我们生活的一切过程，这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的核心。在改革的“熔炉”里，社会，首先是人自己将重新得到熔炼。这将是焕然一新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已着手干的大事。

这项事业是非常艰巨的。但是，为了达到目标，值得不惜力量去干。要知道，对一切事情都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和评价。有一个古老的寓言：一个过路人走到建造某个建筑物的人们跟前，向工人们问道：你们在干什么？一个人气愤地答道：瞧，从早到晚，搬这些讨厌的石头……另一个人站起身来，挺直腰板，骄傲地说：看，我们在建造圣殿！

如果你看到这个崇高的目标——绿色山丘上一座金光闪闪的圣殿，那么，最沉重的石头也不觉得重，最繁重的劳动也会感到愉快。

为了把某件事做得更好，就必须在工作中加把劲。

我喜欢加把劲这个词。对我来说，它不仅是座右铭，而且是日常状态、处世态度。应当从心灵上理解和感受你所着手进行的任何一项工作，那样你就会加把劲。

精神空虚者加不了劲。相反，这种人在困难面前会低头，困难会把他压倒。如果一个人信念坚定，知识丰富，意志坚强，那么他就不会屈服，不管刮什么风，他都会巍然不动。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知道这一点。

今天，当务之急的是，使人振奋精神，尊重人的内心世界，加强他的道德观点。我们将努力把社会的全部智能和文化的一切条件用来造就对社会持积极态度、精神丰富、有正义感和诚实的人。人应当知道和体会到，需要由他来发表意见，他的尊严没有被贬低，对他抱有信任和尊重的态度。当一个人看到这一切时，他就能做出许多事。

当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每个人，并使他们摆脱许多人所习惯的平静和对现有的生活方式感到满足的状态。这里，也许不妨注意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我指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人受到社会的高度保护。一方面，这无疑是一好事，是我们极其伟大的成就。但是，在某些人的意识中，它却变成了一种坐享其成的心情。

事实上，失业是不存在的。国家关注劳动安置工作。即使对由于懒惰或违反生产纪律而被解雇的人，也应当保证他有其它的工作。况且，平均主义已经颇为牢

固地进入日常生活中：甚至工作差劲的人，也照样能得到相当多的收入，生活没有困难。如果某人简直是个游手好闲者，任何人也不会让他的子女听凭命运摆布。在我们的社会基金中集中了巨额资金，人们从社会基金中获得物质帮助。还用这笔钱拨付幼儿园、孤儿院、少年宫以及与儿童创作和体育有关的其他机构的经费补贴。卫生保健是免费的，教育也是如此。人们受到保护，生活可以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但是，我们也看到，不诚实的人似乎在利用社会主义的这些优越性，他们只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想知道义务。这些人不好好干活，经常旷工，酗酒。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利用现行法律和秩序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寥寥无几，却想方设法从社会上取得一切可能取得或不可能取得的东西，靠非劳动收入生活。

改革政策使一切各就其位。我们正在完全恢复“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项社会主义原则。我们力争做到人人都有社会公正，人人权利平等，人人只有一个法律，人人只有一种纪律，人人都有崇高的义务。改革提高了社会责任和要求的标准。但是，有人不想变革，他认为，他已经有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为什么他还要进行改革呢？然而，一个人如果有良心的话，如果他没有忘记本国人民的幸福的话，他就不可能，也不应该讲那种话。而且，公开性也揭露出，有些人享受着非法的特

权。不能再继续容忍停滞现象存在了。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工人和厂长、农机手和俱乐部主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大家都应当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应该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评价自己的立场。我们尖锐地提出克服惰性和保守思想的任务，就是要触及每个人的自尊心。这触及到一些人的痛处，这些人占多数，尽管有人是勉强接受了这一点，特别是那些知道自己是守旧的人。我们应当回顾一下自己，从我们生活和行动是否问心无愧这个角度回顾一下自己。也许，在某一方面偏离到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标准上去了，比方说，开始沾染了小市民消费心理。我们要学会更好地工作，更正直地生活，使自己更加正派，这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重要的是向前看。我们应当既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又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和足够的公民勇气来争取成功，使改革符合社会主义的高度道德标准。

我们要使一切社会团体、所有生产集体和创作协会充分地 and 生气勃勃地发挥自己的作用，需要公民采取新的活动形式并恢复那些已被遗忘的形式。简而言之，需要整个社会生活的广泛民主化。它也是业已开始的进程不可逆转的主要保证。

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民主进程得到正常发展，我们就能够避免许多困难。

我们已经很好地并永远地记取了我们的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将坚持这样一点：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民主形式，通过扩大自治这种形式，我们才能在生产、科学与技术、文化与艺术方面，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里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自觉的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能实现。既然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加强人的因素来揭示和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那么，除了民主化——包括改革经营机制和管理——之外，就不可能有其他途径，而改革经营机制和管理的主要因素是提高劳动集体的作用。

正因为我们把重点放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上，我们才非常重视精神领域、社会意识和积极的社会政策。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途径来调动人的因素。

西方常常把列宁描绘成权威管理方法的拥护者。这证明他们对列宁完全无知，而有时则是故意歪曲。实际上，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劳动人民是通过争得民主自由而执掌政权的。他们也只有在全全面发扬民主的条件下才能巩固和行使这种权力。列宁还有另一个非常正确的看法：工作的规模越大，改造越深入，就越需要提高千百万人对它的兴趣，使他们坚信改造是必要的。由此可见：既然我们进行根本而全面的改革，我们也就应当发挥民主的全部潜力。

必须善于根据群众对政策的接受情况来校正政策，

保证反馈作用，吸取来自人民的思想、意见和建议。劳动人民会提出许多有益的和有意思的东西，而这在“上面”并非总是能看清的。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无视人民所讲的话。总之，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民对改革的态度。

由此可见，不仅是理论，而且还有所发生的实际情况，使我们制定了社会生活全面民主化的纲领，在1987年一月全会上，我们便全面地提出了这一纲领。

这次全会促进了在下述方面采取广泛的行动：加强苏联社会的民主原则，发展自治，扩大我们整个体制的工作的公开性和开放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这一强大的动力使社会多么快地动起来了。在所有劳动集体中，在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中，在党内，民主进程已经全面展开。

民主进程促进了整个改革，提高了改革的目标，使社会对自己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民主进程使我们有可能以更大的规模处理经济问题，提出根本的经济改革纲领。经营机制现在已经在焕然一新的民主原则基础上顺理成章地纳入了社会管理的总体制。

众所周知，我们是在1987年中央六月全会上完成这项工作的。这次全会批准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这大概是1921年列宁颁布新经济政策以后我国经济体制的最重大和最根本的改造纲领。新的经济改革

规定，要把重心从各级以行政领导方法为主转到以经济领导方法为主上来，使管理工作广泛民主化，大力调动人的因素。

改革的基础是大大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自主权，使联合公司和企业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使劳动集体拥有这样做所必需的各种权利。现在，联合公司和企业要有效经营和最终经济结果负全部责任。劳动集体的收入水平要直接取决于其工作效果。

因此，为了企业的利益，规定对经济的集中管理实行根本改革。集中管理要放弃管理企业的业务职能，把力量放在能决定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过程上。为了使这一点成为现实，我们已开始对计划工作、价格形成、财政信贷机制、生产的物资技术供应体制、科学技术发展、劳动和社会问题管理体制进行重大的和根本的改革。这种改革的目的是，保证在今后两三年内从过分集中的指令性管理体制过渡到以集中和自治的民主结合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管理体制。

通过了经济管理进行根本改造的基本原则，这是在改革计划方面向前迈出了重大的、原则性的一步。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实际上都已经处于改革计划关注的范围了。改革的总构想和总意图，无论是从其实质这个角度，还是从其主要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清楚的。

◦ 改革，就是坚决克服停滞现象和打破障碍机制，建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使它具有更大的活力。

◦ 改革，就是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活动，更全面地发扬民主，发展社会主义自治，鼓励主动精神和自主性，加强纪律性和秩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大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 改革，就是使苏联经济全面集约化，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原则，普遍运用经济的管理方法，放弃行政命令方法，大力提倡革新和社会主义进取精神。

◦ 改革，就是实现向科学化的坚决转变，学会使任何创举都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使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

◦ 改革，就是优先发展社会领域，以便越来越充分地满足苏联人对良好的劳动条件、生活和休息条件、受教育和医疗服务条件的需求，时刻关心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和文化水平。

△ 改革，就是使社会坚决摒弃歪曲社会主义道德的做法，始终不渝地实现社会公正原则，言行一致，权利和义务一致，推崇诚实的、高质量的劳动，克服劳动报酬方面的平均主义倾向和消费观点。

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改革的理解。这就是我们对今后

一个时期自己的任务、我们工作的意义和内容的认识。这个时期会有多长，还很难说。当然不会是两三年，而是长得多。我们准备进行重大的、紧张的和耐心的工作，以便到本世纪末使我们祖国达到新的高度。

常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通过改革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取得什么结果？对这个问题未必要作出详细的、学究式的回答。随心所欲地作预言，事先决定我们在改革过程中要建造的那座公共大厦的所有建筑构造，不是我们的传统。

但是，从原则上我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我们是清楚的。这就是要深刻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其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

我再一次强调指出：改革不是某种心血来潮，不是恍然大悟，而是对革新和加速的客观必要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产生于对我国社会的深刻了解。改革的实质恰恰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这就使改革有了深度，有了真正的革命精神和无所不包的性质。

为达到这种目的，是值得作出努力的。我们相信，这将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的应有贡献。

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

如果不谈一谈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对这个方面的议论很活跃，尤其是在国外，也就是不谈一谈改革同社会主义这种制度的联系，那么，关于改革的议论就是不全面的，也不会是十分清楚的。

一些人暗地里希望，另一些人则不无耽心地提出一个问题：改革是不是意味着背离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呢？

西方有人希望把这样一种说法强加给我们：说什么社会主义正在经历深刻的危机，把社会引入死胡同。他们正是这样解释我们对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形成的局势所作的批判性分析的。说什么出路只有一条：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法和社会组织方式，向资本主义方面漂流。

有人对我们说，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改革是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并且建议我们改变现有的制度，求助于另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方法和经验。还说什么如果苏联走这样一条道路，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选择，那就能够为同西方建立密切的关系扫清障碍。事情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说什么就连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是错误的，好象这场革命使我国人民和我们国家偏离了社会进步的康

庄大道似的。

为了清除就这个问题制造的各种奇谈怪论和投机行为——我们从西方听到不少这种奇谈怪论，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是按照社会主义的选择进行各种改造的，我们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而不是在社会主义之外去寻找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的。我们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各项成就和错误的。那些希望我们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一定会大失所望。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不管是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从各个部分来说，完全是建立在多一些社会主义和多一些民主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的。

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多一些活力和创造，多一些组织性、法制和秩序，多一些经营的科学性和主动性，多一些管理工作的效率，人们生活得更好和更有保障。

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生活中多一些民主、公开性和集体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中多一些文明和人道主义，多一些人的尊严和自尊。

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多一些爱国主义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多一些公民对全国事务及其对国际事务的良好影响的关切。

换句话说，就是多一些社会主义本质所包含的内

容，就是多一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前提所包含的内容。

我们将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背离它。我们是真心实意地这样说的，既不是对自己的人民，也不是对国外说假话。期望我们会开始建立一个别的什么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会转到别的阵营去，这是没有指望的，也是不现实的。西方那些希望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的人是一定会失望的。该是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了，主要是在同苏联的实际关系中要从这点出发。

我这样说是希望能够准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们苏联人拥护社会主义——上面我已经说明这是为什么，但是，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的信念强加给任何人。让每个人都作出自己的选择，而历史会使一切都各就其位。现在我们尤其明显地感觉到，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我们才能够比在私人经营条件下更容易实现我们结构政策的转变，虽然我们也有自己的麻烦事。我在同一批美国社会活动家（赛·万斯、亨·基辛格等）交谈时曾谈过这一点。

我们希望多一些社会主义，因而也希望多一些民主。

我们认为，70—80年代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某种危机，相反，主要是由于不能始终如一地实行社会主义原则，背

离甚至歪曲这些原则造成的，是由于一成不变地沿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头几个阶段出现的社会管理方法和方式造成的。

相反，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年轻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生活行为方式，在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解决当代科技进步、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精神发展的根本问题以及发展人的个性等方面，拥有巨大的和远未挖掘出来的潜力。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我国走过的历史道路难道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吗？在这条道路上有过无数的困难、悲剧和紧张的劳动，但同时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就。

历 史 的 教 训

的确，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困难时期，这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造成的，政策本身也有过错误和出现过失误。然而苏联还是前进了，建立了人们不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的社会。如果站在真理的立场上，那么每一个客观的旁观者都应当承认，总的来说，苏联的历史是一部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进步的历史，尽管有过各种损失、退却和失败。我们走的是一条崎岖的道路——不管从直义上说还是从转义上说都是如此，我们曾经徘徊过，犯过错误，流过不少血和汗。但是，我们还是前进了，从来没有想到过

后退，也没有想放弃已经取得的东西，没有怀疑过自己作出的社会主义选择。

可以认为，很难想象不经过挫折就能走向未知的未来，就能在短期内解决宏伟的任务，也很难想象一切都会象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一样平坦。就拿工业化来说吧。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呢？国内战争和14国武装干涉给我们国家留下的是一片废墟。对我们实行了经济封锁，在我们周围设置了“防疫线”。没有任何积累，没有任何殖民地，相反，要拿出钱去发展在沙皇制度下受压迫的民族边陲地区。为了拯救革命成果，就需要靠自己的资源，靠紧缩消费和把它限制在最低水平来建设国家的工业基础，而且建设速度要快。新的建设所需要的物质负担落到了人民头上，而人民的大多数是农民。

实际上，我们需要重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动力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我们拿出勇气做了这件事。千百万苏联人参加国家工业建设的热情使全世界感到震惊，同时也体现了党所提出的计划、口号和设想的生命力，因为人民理解并接受这些计划，而这些口号和设想则包含着我们革命的思想力量。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常常是在远离家乡、缺少任何机械的情况下，在所谓的空白点上，也就是说从零开始，在半饥半饱的状况下创造了奇迹。他们参加的是伟大的历史性事业，这使他们受

到鼓舞。当时他们的文化知识并不多，可是他们懂得，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是多么宏伟和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参加者。这确实是人民群众为祖国的未来建立的功勋，显示了全民忠于1917年作出的自由选择。

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克服了他们遇到的一切困难，在那个决定我们社会今后整个命运的时期，为发展和巩固这个社会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

20—30年代的工业化确实是极其严峻的考验。让我们现在从今天的观点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工业化需不需要呢？难道象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成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在20世纪能够生存下去吗？从另外一个理由也很容易看清楚，当时不加快工业化进程是不行的。法西斯的威胁从1933年起就开始迅速增长。如果苏联不起来阻止希特勒的战车前进，世界将处于何种境地？我国人民用他们在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力量粉碎了法西斯。如果没有工业化，我们就会在法西斯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境地。

但是，我们没有被德国坦克的履带压倒。整个欧洲没有能挡住希特勒，是我们把他粉碎了。我们能粉碎法西斯，不仅是靠战士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而且还靠优良的钢，优良的坦克，优良的飞机。而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苏维埃时代制造出来的。

再拿集体化来说。我知道，仅就这一名词，就对我

们进行了多少捏造、投机和恶意的指责，更不用说对这件事本身了。但是，即使是许多想客观地分析我们这段历史时期的人，看来也未能真正意识到我国集体化的全部意义、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

只要真正是从真理和科学的立场出发来考虑当时的情况和我们苏联社会发展的特点，只要不是闭眼不看农业生产的极端落后（而只要农业生产仍然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就不可能有克服这种落后状态的前景），最后，只要是正确地评价集体化的真正结果，就不会不得出一致的结论。集体化是极其伟大的历史业绩，是1917年之后发生的十分重大的社会转折。不错，集体化是有毛病的，而且也不是没有严重的冒进以及方法和速度上的错误。但是，没有集体化，我国就不可能继续进步。集体化为农业经济部门的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使其能够采用文明的经营方法。集体化保证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最终使产量得到很大的增长。如果我们让农村仍然保持过去那种实际上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状态，我们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增长水平的。此外，集体化还为我们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首先是为工业腾出了相当多的资金和劳动力。它为建立国家可靠的粮食储备开创了前景。

集体化改变了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虽然这种改变是不容易的，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集体化为农民指

引了一条成为社会的现代文明阶级的出路。如果不是集体化，我们现在也就不可能想到生产2亿吨粮食，尤其不可能想到我们计划中提出不久的将来要达到2.5亿吨的目标。然而，我们现在就已超过了“共同市场”国家粮食产量的总和，尽管我国人口比它们还要少些。

的确，我们有些食品还不足，首先是畜产品。为了提高食品的质量，我们还要做许多工作。但是，由于实现了集体化，我们现在按人口平均计算所生产的食品基本上满足了必要的需求。特别重要的是，我国已经不存在，并且永远排除了发生饥荒和吃不饱的可能性。要知道，这在俄国是许多世纪一直存在的灾难。按食品总热量来说，苏联已稳稳地居于发达国家之列。而最主要的是，由于有了集体化，由于集体化已有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这就为我们目前在改革过程中能够大规模地把整个农业部门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创造了条件。

是的，工业化和集体化都是必要的。否则国家就不会兴旺起来。但是，进行这些改造的方式方法并非始终符合，也并非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产生不良影响的首先是外部条件，因为国家经常感到遭受军事侵略的危险。但是，也有自己冒进的地方，施加行政压力的做法盛行，人们受了苦。现实就是如此。这就是历史上遇到种种矛盾的人民的命运，既有伟大的成就，又有悲剧性的错误，还有惨痛的篇章。

就是在战争胜利后，我们的生活也并不宽松，有时还是很苦的。我记得40年代末乘火车从俄罗斯南部去莫斯科求学路上的情景。我亲眼看到被破坏的斯大林格勒、罗斯托夫、哈尔科夫、奥廖尔、库尔斯克、沃罗涅日。而这种被破坏的城市有多少啊？！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斯摩棱斯克、勃良斯克、诺夫哥罗德……全部是废墟，几百几千个城市、农村、工厂都是如此。许多文化古迹——画廊、宫殿、图书馆、大教堂被洗劫一空，破坏殆尽。

当时西方有人说，苏联经过100年也恢复不了元气，从现在起它就将长期地退出国际政治舞台，因为哪怕是稍微医治一下创伤，就将耗尽国力。而现在有人怀着惊叹的心情，又有人怀着掩盖不住的仇视心理来谈论我们：它已成了一个超级大国！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使我们的国家复兴了，兴旺起来了。

还有，不能不谈谈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是西方往往忽视或避而不谈的，但是不谈这一方面简直就不能理解我们苏联人：除了生产成就和社会成就外，还有着新的生活，有着新世界建设者的热忱，有着创造新的不寻常的事业的鼓舞力，有着对下面这点的敏锐的自豪感，即我们单枪匹马，没有别人的帮助，多少次用自己的肩膀承担起复兴国家的重任。人们渴求掌握知识和

文化。人们充满生活的喜悦，兴高采烈，培育子女，从事自己的日常工作。这一切都是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与革命前截然不同的新的气氛——纯朴、平等、劳动者可以充分施展才能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给了我们什么。一句话，在我国和平建设的各个阶段，人们都经历过来了，并发挥了创造性。在我收到的来信中，我的同胞们自豪地说：即使我们生活得比别人差一点，可是却比别人更有生气，更有意义。

现在居住在苏联的每15个人中，就有14个人是在革命后出生的。而有人仍在号召我们放弃社会主义。请问：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苏联人突然要放弃自己的制度呢？我们要大力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我认为，新制度的潜力还只是得到最低限度的发挥。

正因为如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有人竟要求——有些人甚至是真诚地要求——我们改变社会制度和采用另一种社会制度所特有的方法和方式。这些人没有料到，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有人也想使苏联回到资本主义去。请想一想，说1917年的革命是个错误，我们整整70年的生活、劳动、斗争和拼搏也完全错了，说我们走的那条路“不对头”，这我们怎么能同意呢？！不，在严谨和客观地评价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恰恰是由于选择了社会主义，才使正是“走那条路”的过去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苏联今天在人类进步中

所占有的地位。

我们在谈论十月革命，谈论社会主义时，没有理由感到为难和低声下气。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和无可争辩的。但是，我们懂得过去的全部情况和复杂性。我们最宏伟的成就并没有遮住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看不见错误和疏漏。而且，我们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其本性来说是批判性的和革命的。

而当我们寻找今天的困难和问题根源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弄清楚它们的起源，从追溯到30年代的事件中去吸取现实的教训。

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理解改革的前提。我们的历史是在一些附带因素的强大影响下形成的。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因而其中包含着改革的根源。

为什么仍然发生了必须进行改革的一切情况呢？为什么改革开始得晚了呢？为什么会长期地保持业已过时的工作方法呢？为什么会发生社会意识和理论的教条化呢？

这一切都要求作出解释。而我们在分析和弄清情况的时候发现，有许多事实证明，无论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有人看到消极现象在不断增长。不仅如此，人们还不止一次地敏锐地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但是，在过去的余毒及其种种思想和表现的压力下，这种

变革都是半途而废的和不彻底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很大贡献。会上和会后都曾作出过大力的尝试，想使国家走上正轨，想推动我国摆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

在代表大会决议的影响下，曾实行过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措施。但是，对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没有充分加以利用。这要怪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人采用了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他们随心所欲地管理经济。当时领导人的唯意志论思想和行动使党和社会犯了冷热病。一些自以为是的、没有根据的许诺和预测，再次造成了言行不一的状况。

正因为这样，在以1964年中央十月全会为标志的后来一个阶段，不得不首先去克服这些极端做法，同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作斗争。曾实行稳定局势的方针。这一方针也是有道理的。党和人民都支持这一方针，也产生了某些积极成果。在制定和采取决定时变得较慎重和有根据了。196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同一年举行的讨论农业问题的中央三月全会，都是十分重大的主动行动，其目的在于对经济进行积极的改造。这些行动虽然收到了重要的效果，但只是一时的效果，后来还是受挫了。

由于有自我安慰情绪和领导人更迭的自然过程遭到

破坏，国家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这些我上面已经说过了。而这种局势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在完善经济和社会管理机制方面采取根本的解决办法。

我们从过去的历史教训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显示了其解决复杂的社会进步问题的巨大可能性。我们相信它具有自我完善、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解决21世纪前夕提出的有关当前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的能力。

然而，我们明白，完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自发的过程，而是这样一件工作，它要求作出极大的关注，要求正确地、不抱成见地分析问题，要求坚决抛弃过时的东西。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不能只限于采取一些虎头蛇尾的措施。必须广泛地、彻底地和果断地行动，不惜采取最大胆的步骤。

还有一个结论，可以说是主要的结论。这就是依靠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所拟定的改造工作，也就是民主化，再民主化。

走改革道路的思想根源

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僵硬的、一成不变的，而把完善社会主义只看成是用一劳永逸地提出的一些思想、概念、公式来硬套复杂的现实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和有

害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在考虑到历史经验和客观条件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和丰富的。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向列宁学习创造性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方法，用他的科学方法来武装我们自己，掌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本领。

为了使改革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断地重温列宁的著作，我重复一句，特别是他晚年的著作。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本质的论述。他们没有陷入繁琐的细节，没有对社会主义的面貌作详细的描述。他们谈到的是理论上可以预见的阶段。而说明现阶段应是个什么样的阶段，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还要实际经历这个阶段，但不回避复杂的问题。经典作家教给我们的不是具体方法，而是方法学。

在新的阶段，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依靠列宁的遗产，依靠他的方法学，对积累起来的理论问题和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念进行分析。这一任务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在列宁去世后的时期里，我们并非在一切方面都遵循了他的思想。那些曾经迫于形势而采取的和反映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和方法，被奉为典范和被理想化了，并被当作普遍的不可更改的教条。结果形成了内容贫乏的、公式化的社会主义面貌，它拥有一

个臃肿庞大的集中管理体系，对人们多种多样的利益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而且明显表现出平均主义倾向。

就拿经济管理机制来说。苏联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状况，实质上也就是不同寻常的条件，不可能不对这种管理机制产生影响。军事威胁和在我们本来就不轻松的历史上发生的最严重的和破坏性最大的战争本身，以及国民经济曾两度从废墟中恢复起来，这一切自然造成了管理的极端集中，并导致管理中民主原则的缩小。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这种奇怪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在着手建设新社会时是单枪匹马地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这就必须迅速克服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必须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崭新的现代化工业。这一点在空前短的时间内做到了。

为了解决这一任务，不得不急剧增加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而且，由此调拨来的很大一部分资金要用于发展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至于这种发展的“代价”问题，当时或者根本没有考虑，或者放在次要地位。国家曾不惜任何花费，而人们为了加速自己祖国的发展，为了加强其防御能力，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及其所作的社会主义选择，也甘愿作出牺牲。

正是在这种目的下建立了这样的管理体制：极端的集中，对工作作出详细的规定，给各部门和各单位规定

指令性任务和预算拨款。这种管理体制也曾起过自己的作用。

当然，这种管理特点并非完全能用客观原因来解释。也采用过错误的方法，作出过主观主义的决定。在研究当前的问题时也应该看到和考虑到这一点。但是，不管怎样，30至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逐渐开始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要求发生矛盾。它的优点越来越不起作用了，相反，障碍作用却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障碍机制，这种机制后来则起了十分消极的作用。由于采取在非常条件下产生的工作方法，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便受到了阻碍。

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则助长了我国经济的消耗性质，这种消耗性质形成了强大的惰性力量，并一直保持到80年代中期。这就是采用声名狼藉的“总产量方法”的根子，直到不久以前，我国经济还指靠这种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便产生了偏见，而且往往把它们作为某种异己之物同社会主义直接对立起来。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对经济核算估计不足，就产生了在价格形成方面随心所欲和不重视货币流通的做法。

在新的条件下，业已形成的管理体制缺乏民主原则也开始产生极有害的影响。在这种体制中很少给列宁

提出的劳动人民自治思想留下余地。公有制也好像逐渐脱离了其真正所有者——劳动人民。它常常受到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宰割，变成“无主的”、无偿的和失去真正主人的东西。开始越来越表现出个人与全民财产的脱节，社会利益与劳动者的个人利益越来越缺乏相互联系。过去形成的经营体制在新阶段已经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素变成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障碍，其根本毛病就在这里。

如果谈到障碍机制的政治方面，那就不能不指出这样一种奇怪现象：有教养的、有才干的、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当然，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权和管理机关中一直是有代表的，但是，他们远没有经常象社会主义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那样被吸收参与制定和通过决议的工作。曾经要求群众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创造活动，但是面不够广，尽管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得到发展和加强的。

经济中的障碍机制及其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不用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列宁关于管理和自治、

经济核算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思想财富没有得到应有的运用和发展。这只是社会思想僵化和它脱离现实生活需要的例子之一。

改革给我们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思维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就是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使之具有更广阔的天地，彻底消除作为个人崇拜时期特点之一的垄断理论的后果。在个人崇拜时期，斯大林的权威把在非常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发展形式绝对化了，把它们看作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采用的形式。

必须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我们在这方面也应该向列宁学习。列宁才智过人，能够及时察觉到深刻变革、重新估量价值观念、重新修订理论观点和政治口号的成熟时机。

下面就是一个极鲜明的范例。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后，在很短的时期内准确地估计了二月革命后的国内形势、发展趋向和可能性。他不仅准确无误地确定了党和苏维埃唯一可能采取的活动策略，而且提出了战略任务——使党和群众对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否则就会失去由于推翻沙皇统治而取得的成果。即使对许多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来说，这个转折也是很突然的。在进行改革时，我们就是要学习这种政治思维的辩证法。

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都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党没有立即掌握这种新思想的情况。曾经出现过困难，就连

那些忠于革命事业的人有时也表示不理解。但是，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善于进行说服和解释，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解同一个问题，激发斗志，把那些动摇者和怀疑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列宁自己也时常感到很困难。一次，他在一封信中痛苦地写道：“您瞧，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

“这是从1893年开始的。庸人们的仇视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抛弃这个命运去同庸人们讲‘和平’。”^①

我曾引用列宁的话，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不了解全局而去抓局部问题，那么你时时都会碰到这个全局。因此，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包括在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就非常重视观念问题。当然，我们也尽量在方法上少出乱子。为了取得某些本质的东西，也不一定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东西都颠倒过来，然后再去纠正错误。

解决新问题没有现成的药方。今天也没有这种药方。社会科学家目前还未提出任何完整的東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停留在习惯的概念上，与生活的辩证法

^①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35卷第248页。

不相协调。哲学和社会学落后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历史学也面临根本改革的任务。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全会为创造性思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给这种思维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

改革就是革命

改革是一个涵义广泛，内容极为丰富的词。但是，如果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选出一个关键的、最能表达其实质的词，那就可以这样说：改革就是革命。要坚决加快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发展速度，就要在走向崭新状态的道路上实现根本改革。这无疑是一项革命性任务。

我认为，我们有一切理由在1987年一月全会上宣布：当前的方针就其深刻的实质、布尔什维克式的勇敢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目的来说，是列宁的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日子里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的直接继续，而且不是一般的继续，而是革命的基本思想的发展和深化。我们应该使自己革命的历史性动力更加强大，进一步发展革命给社会带来的一切成果。

当然，我们不能把改革与十月革命相比，十月革命

是我们祖国千年历史上的大转折，就其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力来说，是无可比拟的事件。

那么，在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我们为什么又谈新的革命呢？

可以用类似的历史情况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列宁在当时就曾发现，在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法国，在1789—1794年的大革命之后，为了把革命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又发生了三次革命（1830年、1848年和1871年）。可以说，英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在英国1649年的克伦威尔革命之后，又发生了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然后还有1832年的改革。这次改革才最终使资产阶级这个新阶级掌握了政权。德国有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48年和1918年），两次革命之间还有俾斯麦用“铁血”手段进行的大改革。

列宁写道：“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①那么，社会主义这个负有实现比资本主义更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方面的社会变革使命的社会，为什么不能发生某些革命性变化，以显示其全部潜力并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而得到定型呢？列宁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这样一个思

^①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29卷第47页。

想：社会主义将要经历多次试验。而每次试验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有正反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保险不出现和不积累停滞趋势，甚至也不能保证不发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而为了摆脱这种危机局面或危机前的局面，恰恰需要采取革命性的措施。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能够进行革命性变革，因为就其本质来说，社会主义是有活力的。

1985年春天，党把这样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所积累的新问题既迫切又严重，在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时行动迟缓，这就要求采取革命性行动，宣布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革。

改革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飞跃，是实现其本质特性的飞跃。从一开始，我们就已意识到：不容迟缓。非常重要的是，不停留在起点上，要克服落后状况，挣脱保守主义的泥潭，打破停滞的惰性。这用进化的办法，用胆小怕事的、爬行式的改良是办不到的。

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利耽误，哪怕是耽误一天。相反，需要日复一日地加紧工作，加快工作的速度和紧张程度。必须经受住这种紧张，经受住这种改革开始阶段的如宇航员所说的超负荷。

应该不断地发展革命。不能原地踏步。我们自己的过去也说明了这一点。就是现在也还能感到这种缓慢的后果。因此，现在需要双倍的胆量和勇气。我们没有权利再次停留。所以，只能前进！

当然，以革命方式行动并不意味着冒冒失失地向前冲。骑兵式的冲锋并非任何时候都是合适的。政治作为一种可能的艺术，其规律也属于革命的范畴。不能超越阶段，不能冒进。现在，主要的是要为走向全新的阶段奠定必要的基础。否则，就可能如常言所说的是做蠢事，损害伟大事业的名誉。

据我们理解，革命是立，当然也总会有破。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打破过时的、停滞的东西，打破一切妨碍迅速前进的东西。没有破就不能为新建设清除场地。那么，改革就意味着坚决果断地破除已形成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破除经济管理中的陈旧制度和思维上的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只不过是没炸的轰鸣和枪弹的呼啸声而已。然而，障碍机制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抗，而无所事事、漠不关心、懒惰散漫、不负责任和经营不善也是一种反抗。

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形势确实加剧了，因为改革在向社会的纵深发展。我们听到一种声音：所有这些难

道都应该触动吗？

一些人不同意把“革命”这个词用于改革。有些人甚至害怕“改革”这个术语。而列宁却不怕使用这个词，甚至还教导布尔什维克党人要学会“改革”，因为在新的条件下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这样做。今天，为了实行革命性改造，我们也需要进行根本改革。

革命时期的一个特征是在社会的根本利益和人们眼前的日常利益之间存在某种差距，而社会的先进部分是愿意进行重大变革的。改革首先冲击的是那些习惯于按旧方式工作的人。我们没有政治上的反对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接受改革的人的斗争。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可能所有的人都不得不牺牲些什么。但是，都必须永远放弃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不应有的种种特权，放弃为障碍机制效劳的各种权利。

利益问题对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急剧转折时期往往也是如此。我还记得，列宁是如何为布列斯特和约进行斗争的。在那令人不安的1918年，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还面临德国入侵的严重威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同德国缔结和约。德国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和约的条件，用列宁的话说，这些条件是“可耻的，卑鄙的”。条件规定要割让有5600万人口的一大片领土。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些条件。然而列宁坚持认为，必须签订和约。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也有

反对者。他们的根据是，工人们要求反击德国干涉者。而列宁再三呼吁签订和约。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从眼前利益而是从根本利益出发。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社会主义命运的利益。为了捍卫这些利益，需要得到喘息的机会，然后再前进。但是，当时绝非所有人都能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只是到后来才坚定地、毫不含糊地说：列宁是正确的。他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遵循的是根本利益，放眼未来，不因小失大。于是革命得救了。

改革也是如此。它符合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使命是把社会推向新的阶段，保证社会达到新的质量。那就得放弃一些东西，牺牲一些东西。这样做并不容易。眼看着已形成的习惯和观点瓦解了，某些已经习惯的东西丧失了，于是就提出抗议。保守主义也不甘退却。但是，为了社会和每一个人的长远利益，所有这一切都是能够克服的，也应该得到克服。

在实行国家验收制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我们对出厂产品是否符合现行标准实行了独立的监督。在开始阶段，许多工人挣钱少了。但是，提高质量是社会的需要，工人们也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抗议。相反他们却说：“拿那种不该得的钱，会感到害臊！”与此同时，工人们要求经济领导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采取同样的态度。

所以，国家验收制就变成了改革的一所好学校。它暴露了许多东西：各种人对工作采取什么态度，改革有哪些人做后盾。国家验收制就象一张石蕊试纸，它再次证明，苏联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拥护改革，把改革推向前进，真正起到其社会主义社会主导阶级的作用。

对待改革象对待一切革命一样，不能持轻率态度。要把改革进行到底，使之天天都取得成就，让群众能够体验到改革的成果，使改革的飞轮加速旋转，加快前进，即加快发展的速度，这既是从物质意义上，也是从精神意义上讲的。

在把我们所采取的措施称为革命措施的时候，我们是指这些措施的深刻性、彻底性和不妥协性，是指这些措施包括从上到下、从经济基础、所有制关系到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包括一切生活领域，并且是全盘地、完整地包括所有这些方面。这不是对我们社会机体上这种或那种小毛病和污点进行粉饰和洗刷，而是使整个社会机体得到改善和更新。

众所周知，在革命过程中占首位的无疑是政治。改革中也是如此。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政治性措施，是实际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广泛民主化任务，是同官僚主义和违法行为作无情的斗争，是积极吸收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所有这些都与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有直接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打算改变苏维埃政权，也不会背离它的根本原则。但是，必须进行变革，并且这种变革要能巩固社会主义，使之在政治上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生气勃勃。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有权在大的方面和在原则上把我们的苏联社会全面民主化的纲领看作是现有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

正因为如此，为了改革的成功，必须使我们的全部工作适应于政治任务和政治领导方法。在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的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做人的政治工作，对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社会主义”首先是群众的思想 and 政治运动这个概念的原始涵义，仍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这个运动来自下层，来自人民之中，它之所以强大，首先是由于人的觉悟和积极性。

革命是无可比拟的事业。我们的日常工作也应该是无可比拟的和革命的，象在革命时期一样。在改革条件下，关于党的真正领导人的概念特别近似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理想。官气十足、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和沽名钓誉等特征，与党领导人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而勇敢、主动、高度的思想性、纯洁的道德、与人民打成一片、善于捍卫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等品德，则受到极大尊敬。革命形势要求具有热情、自我献身和忘我精神，对领导人来说尤其如此。现在我们远没有做到这些。还有不少人处于“进化状态”，简单地说，是在等

待观望。

“来自上面的革命”？党与改革

在历史学中以及在政治生活中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来自上面的革命”。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少。只是不应该把这种事情与国家政变和宫廷政变混为一谈。这里指的是那些深刻的，实质上是革命性的改造，这种改造是根据当局本身的倡议进行的，尽管它是由于客观形势和社会情绪发生变化而不得不进行的。

似乎我们目前的改革就可以称做“来自上面的革命”。是的，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党认为自己有勇气，有力量制定新的政策，并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新进程。党首先是从自己，从纯洁自身开始的。1986年夏天同哈巴罗夫斯克党的积极分子会见时，我曾公开谈到过这个问题。应该从自己做起。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责任——无论你在政治局、在地方上，还是在基层组织。大家都要纯洁自身，谁要是不干，就帮助他。主要的是做一切事都要凭良心。要知道，在缺乏公开性的情况下，我们对某些东西已习以为常了。不仅普通人，就连一些负责人也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应该讨好人们，象某些国家在竞选时

期常常发生的那样。我们的人民不喜欢这样。应该向人民讲真话，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是，也还有这样的人，包括一些领导人，他们向所有的人推崇社会主义道德，而向自己推崇的却是某种代用品，就是那种只适合于他自己的东西。这是不行的。

一般来说，改革已经从党，从党的领导人开始了。我们好象是从金字塔的顶端走到它的基底。可是，“来自上面的革命”这个说法并不完全适合于我们的改革，至少需要作重要的保留。是的，改革的倡导者是党的领导人，改革的纲领是在党和国家最高机关制定和通过的。诚然，改革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有明确目标的过程。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

如果改革没有把上层的首创精神同来自下面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它没有反映所有劳动群众的根本的长远利益，如果群众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计划，看成是自己思考的答案，看成是对自己的迫切要求和急待解决的结论的承认，如果人民没有如此热情地、有力地支持改革，改革就不会成为真正的革命事业，就不会有目前这样的规模，也不会有这么大成功的把握。

改革的性质本身要求改革应该在每一个工作岗位，每一个劳动集体，整个管理系统，以及党和国家机关，

其中包括政治局和政府中进行。改革涉及所有的人——从普通共产党员到中央书记，从工人到部长，从工程师到院士。只有当改革成为全民的事业的时候，它才能够进行到底。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应该诚实地、认真负责地、全力以赴地做好本职工作。在这个运动中，越来越广大的人民阶层逐渐被触动，并投身于改革之中。

如果你提出的办法是严肃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那就一定会得到劳动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近几年来，我们正是竭力这样做的。也许，我们还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彻底地搞清楚并向人民指出国家所处的整个形势的复杂性，也没有指出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讲了主要的，并得到了赞同和支持。

一切已知的“来自上面的革命”之所以存在弱点和不彻底性，正是由于缺少来自下面的支持，缺少与群众协调一致的行动。既然缺少这些，那就必然需要自上而下的、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的措施。结果就出现了改造过程中的不正常现象，因而也就付出了高度的社会政治和道德“代价”。

这次改革的特点和力量在于，它既是“来自上面”，也是“来自下面”的革命。这是它成功和不可逆转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我们将坚决做到，使群众和“基层”享有其全部的民主权利，并学会习惯地、内行

地和负责地行使这些权利。现实生活明显地证明，在历史的急剧转折关头，在革命环境中，人民往往表现出听从、理解和响应的非凡能力，如果向他们讲真话的话。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最困难的时刻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也正是这样做的，他走到劳动人民跟前，同他们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所以，对改革来说，使群众保持高昂的政治和劳动热情非常重要。

西方常说，改革将遇到困难，说什么会引起劳动人民的不满。对此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困难当然是会有的。如果我们遇到事出有因的不满和反对的话，我们将首先认真地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行政手段是无济于事的。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和经济组织必须学会这样工作，即消除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事先并及时地解决可能引起这类反应的问题。大家知道，如果当局不能解决某些令人不安的问题，那么人民就会自己去解决。如果人们在发表意见，在会上谈自己的看法、投书报刊和向各级领导发出呼吁，而这一切都被当做耳旁风的话，那么下面就会采取我们所不习惯的行动。这就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

这里只有一个标准：对一切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意见，我们都要听，都要考虑。而对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倾向要进行斗争，但是，我重复一句，要在民主进程的范围內。

不要假装革命，不要迷恋和滥用行政命令方法，这是列宁的真正革命性的原则之一。

如果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弯子转得太急了，我们的回答是：不。除了进行革命性的、生气勃勃的改革之外，没有其他明智的选择了。不是改革，就是停滞。改革成功与否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寄予改革的希望太大了。时代要求我们作出革命的选择，我们也这样做了。我们决不从改革后退，一定要把改革进行到底。

1987年夏天，我同詹·卡特会见时，他问我：“您是否相信，您为苏联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所作的努力会取得成功呢？”

我对他作了直截了当的回答：“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开始的是一项伟大而艰难的事业。改革触及所有的社会阶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已经走过了改革的某些阶段，也许是改革开始的一些最重要阶段。我们提出了改革的政策并且看到，社会是赞成这一政策的。这一政策正在实施中。当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

“西方马上就谈论起什么反对派来了。但这是不严肃的。我们已着手进行一切重大的改革，我们正在改变立场，改变思维，改变整个形象，改变生活方式和陈规旧习。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前进了。我们得

到了很大支持，依靠这种支持，我们在把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政策的正确性，我和我的同志们就不会提出这个政策。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年实际执行这一政策的经验，更加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管困难有多大。当然，这条道路将分为几个阶段。不久我们就会实现一部分目标。另外一些任务还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还有一些更远的目标。我们将永往直前。”

苏联人民相信：由于改革和民主化，国家将变得更加富强。生活将更加美好。我重复一遍，在改革的道路上，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困难，并且有时是不小的困难，我们并不隐瞒这一点。但是，我们定能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第二章

改革开始 初步结论

从推行改革方针起，已过去两年半了。改革的理论概念和具体计划已经有了，并在不断发展，修订，用新的观点和思想加以充实。这就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作出紧张的创造性努力和进行深入的讨论。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已经开过，并且举行了几次中央全会。苏联社会各阶层正在热烈讨论改革的问题和进程。改革的计划已经体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一系列国家法令中。

同时，实现改革战略的日常实际工作正在进行。我们已有了一定的经验，尽管还是有限的。有了给人以希望的初步成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疏漏和失误。现在，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可能性和弱点。我们现在也认为我们正处在开始阶段。然而，改革已进入我们的生活，并把广大的人民群众纳入自己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已经是现实。

一、社会已经动起来了

一切是怎样开始的

当我们谈到两年半期间所做过的事情时，通常指的是代表大会之前和代表大会之后的这一段时间。

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就象是我们道路上的里程碑。由于许多原因，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负有回答苏联社会生活中最令人关注的迫切问题的使命。会期是党章事先确定的，会前起草了党纲新修订本，准备了党章修改意见，还制订了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和到2000年这段时期的计划。麻烦在于，拟提交代表大会的政治方针在原先的条件下就已开始形成，而在1985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和四月全会以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论是党本身，还是整个社会都开始了新的过程。

我要直截了当地说，认识和掌握四月全会的思想并非轻而易举的。新思维是在各级，既在政治局、中央，也在基层党组织、学术界和劳动集体所进行的讨论中产生的。讨论得很活跃，舆论工具也经常展开辩论。对国家的过去也开始以批判态度进行认识。千百万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其中包括

在集体的会议上，在报刊上，在写给党和国家最高机关的批评和建议的信件中，兴致勃勃地参与这件事。对很多具体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有时是对立的观点。生气勃勃地展开了探索摆脱目前处境的途径的活动。我们认为产生不同意见是自然的和有益的。很清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应当以新的态度来筹备，虽然离规定的代表大会举行日期还不到一年时间了。

当然，可以推迟举行代表大会。有人坚持这种意见，并举出了有说服力的理由。但是从这种意见中，我们感觉到了停滞时期的观点，这些观点使我们大家很惊讶。我认为，最终占上风的是最符合形势的观点：按党章规定的日期举行代表大会，并且吸收社会上所有健康力量来参加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对国家命运有巨大意义的重要决议。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实现中央四月全会提出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构想的基本工作方针。是的，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很好，代表们不仅带来了自己的耽心和实话，而且也带来了想法、计划和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新的强大动力的决心。

这是一次充满勇敢精神的代表大会。我们坦率地谈了缺点、错误和困难，尤其注意到社会主义所拥有的尚未加以利用的潜力。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长远的大规模的行动计划。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是战略决策的代表大

会。

但是，那时我们还不能或者不会充分地理解所发生的过程和已经成熟的问题的尖锐性和规模。现在，我们对此看得比较清楚了。很清楚，应当坚决把代表大会之前那一时期所开始的工作和代表大会上进行的工作继续下去，同时要深入研究我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为此，要溯本求源，更加明确地评价过去，确定首先需要做什么和怎样做。不懂得这一点，就可能迷失方向。

甚至在代表大会以后过了一年，在社会各阶层乃至党内，有些人仍然认为，改革的方针不是长期政策，而是一次运动。地方各级机关的许多领导人要积极拥护改革的人进行所谓的整肃，并以警告的口吻劝告“过分”迫切的热心者：同志们，等一等，不要徒劳无益地瞎忙，过一两年一切都会平静下来的。他们确实相信，一切都会恢复原状，就象从前不止一次出现过的一样。也有一些怀疑论者不大高明。他们在办公室走廊里嘲笑说：曾经出现过各种时期，目前这个时期也能熬过去。社会上对改革命运更加担心了：一切是否又要回到老路上去？

在一月全会上，我们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分析了造成复杂而矛盾的局面的原因。我们并不想只批评过去和点名批评哪个人。难道全部问题都在于一定要点某个人的名吗？应当评价现象，分析过程，弄清趋势。我们也努

力这样做了。我确信：如果一月全会仅局限于批评过去和个人，那它就不会起到自己的作用。

我们需要教训和批评并不是为了算帐，而是为了今天和明天。

如果在一月全会上我们不提出建设性的行动纲领，不谈主要的东西——应当做什么，应当补充哪些力量来消除障碍机制，如何建立有效的加速机制，那就会原地踏步。如果全会不指明，应当走向何方，如果不把民主化作为改革的主要动力提出来，那么这种全会实在不需要。

无论是从怎样解决改革任务这一角度来看，还是从如何使社会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的角度来看，一月全会的主要意图都是发扬民主。这是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的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这就是我们的坚定信念，我们坚持这种观点。

我们还将在经济、政治和党内发扬民主。群众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是改革的决定性力量。没有别的更加强大的力量了。

过去的几个月证明：在一月全会上我们做得对。我们这一代的重大任务是改造国家。也许我们不能把一切工作都做完，但是我们却来得及把加速进程推向前进。我们将奠定基础。我相信，整个社会将沿着改革的道路前进。

然而，即使到了最新的民主机制能充分建立起来和道德杠杆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任务也不会变得简单些。而且，我认为工作会增加，会变得更加复杂。显然，还需要不止一次地改变方式方法，因为要在新的条件下，即新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精神条件下工作。

改革的飞轮在加速旋转

我想我已讲清楚了，苏联社会已动起来了，不能让它停下来。但是，我们反对不现实的等待。有人希望，不用作特别努力，一切就会马上自行发生变化。有不少人这样认为：新领导人来了，坐到了位子上，现在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并且一切都会好起来。或许有人以为工作已经象马车下坡那样进行得顺顺当当了。不是的！我们还要把马车往山上拉。还应当不断地拉这辆车，不断地使改革的飞轮转得更快。

改革还刚刚开始……这是事实。我们刚刚建立加速机制。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是在了解情况，寻找解决办法，收集各种主张和建议。大家应当共同前进。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的人对改革本身和自己在改革中的作用的理解程度不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直接和公开反对改革的人并不那么多。

但是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支持新办法，但却认为，搞改革的不应该是他们，而是上面的某个地方，是另一

些人，即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其他部门，协作企业，相邻的车间、畜牧场或者建筑工地。简而言之，是所有的人，唯独没有他们自己。在访问拉脱维亚共和国期间，同里加的一个大型电工器材厂的工人交谈时，我认为需要这样讲：是很困难啊，但是如果你们感兴趣的只是“上边”在干什么，而不把自己的潜力包括进去，改革的车轮就会空转，就会刹车，就会半途而废。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不知道如何按新方式工作，不善于在改革条件下工作。应当引导他们。应当帮助他们。

有动作迟缓现象，有惰性。还没有消除事事都等待上级指示，指望最高机关作出决定的习惯。这用不着奇怪：制度就是这样，从车间到政府各部都是这样。现在情况也是如此。甚至最高层管理机关也是这样。问题是，人们已经多年不习惯于动脑筋和负责任地、独立地去思考和行动了。这也是个很大的困难。

主要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都投入改革。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是在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不会这样提出问题，似乎应当同别国人民、别国党、别国科学界、别国文学界等等一起来搞改革。不，我们大家都在搞改革，全世界都在搞改革。应当让全部智能潜力都发挥作用。我自己就感到，我们大家在改革过程中怎样在变

化。否认任何人有权进行改革，有权使今天的工作不同于昨天，今天有权认识时代提出的那种形势和那些目标，那是不对的。

我们没有“现成的药方”

政策是有限度的艺术。超出许可范围就是冒险。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细心而冷静地估计可能性，并据此来拟定自己的任务。我们是有过沉痛教训的，考虑到本国明显的现实，我们没有在所选择的道路上冒进。

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以前的年代里形成的思维。我们大家，从总书记到工人都应当改变这种思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在旧制度条件下生活和成长起来的。必须克服我们自身的保守思想。是的，大多数人都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原则。但是从正确的立场到实现这一立场，还有不小的距离。

有时甚至也有这种情况：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我们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根据充足的，通过的决议是革新的，但只要一谈到贯彻这些决议的方法，就发现，我们打算用来解决新任务的却是老办法。

我们正努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恢复活生生的列宁主义精神。过去几十年都是按死板的书本教条行事的。现在，我们想把真正的创造精神贯彻在我们的理论工作中。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必须做。而且，看来创

造性的思维将不断加强。

我们是否能保证不犯错误呢？不，不能保证。那么，最严重的错误可能是什么呢？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怕犯错误，止步不前，无所事事。根据自身的经验，我们知道这种“无所事事”的错误。我们的许多不幸都是由于这一错误而产生的。在70年代和80年代交替时期，这种病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的西方敌人看出了这种病，并且已经开始准备把苏联送进“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安魂曲显然奏得太急了。

我感到高兴的是，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整个社会上都在形成一种观点：我们已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事业——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业。但是，如果我们想使所有的打算都付诸实现的话，我们就应当既在对内方面，也在对外方面进行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工作。我们首先要承担起前所未有的责任。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和大胆的工作，尤其是在第一阶段。

目前在我国，人们对许多东西还不习惯，如选举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苏维埃的差额选举，同外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实行自筹资金，取消对于为本企业生产食品的副业的限制，扩大合作社的活动，鼓励小生产和小商业中的个体劳动，关闭不赢利的工厂以及不能有效工作的科学研究所和高等院

校。报刊的言论更尖锐了，它们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以前“受禁的”题材，公开阐明的观点变得更加丰富多采，对我们的发展和我们改革的所有迫切问题公开进行辩论。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和必不可少的。虽然发表和接受这一切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在党内都如此。

我并不认为，过去的两年半是苏共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但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这一时刻要求有高度的责任感、成熟性和忠实于理想与纲领性目标。要看到某种倾向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力求仔细斟酌地和现实地看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出群众所理解的政策和目标，使他们深信不移，并引导他们前进。

当然，在我们领导人中间，对于如何消除停滞现象和今后如何工作，在看法上也略有不同。这并不奇怪。相反，如果没有这些细微的不同，一切想法都绝对一致，那就至少是令人奇怪的。意见分歧是思考的好养料。但是，在主要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即改革是必要的，是必然的，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全体苏联人民，全党，其中包括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政府都处于改革过程中。在革命工作中，我们政治局的委员们在解决社会上出现的问题当中积累经验。正在参加改革的各共和国、州和劳动集体也在进行同样的工作。全国正在解决新任务，同时也在经受改革的考

验。主要的一点是社会气氛发生了变化。苏联人社会和政治积极性的解放过程正在进行之中。人们变得更加勇敢。他们的公民立场开始更加坚决地表现出来。他们想毫无保留地把过去的年代里积累的许多话都说出来。

在不太习惯的形势下，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如果在1985年4月有人对我们说：再过两年你们那里将会发生哪些哪些事情，也就是说今天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多半不会相信，甚至会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而结果又怎么样呢？一年前我们无疑会对其持否定态度或者作出模棱两可的回答的事情，今天不仅已成为习以为常的讨论对象，而且也成为日常现实的十分自然的组成部分。社会在变化之中，整个社会都动起来了。

现在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不寻常的时期，老一代人把国内当前的革命气氛比喻为十月革命后最初岁月的形势，比喻为伟大卫国战争时代。而我们这一代可能把现在比作国家战后从废墟上复兴的时期。现在我们清醒和现实得多了。苏联人政治上所特有的热情和革命的忘我精神就更有价值和更富有成果了。

在1987年中央六月全会上，我谈到了政权机构、管理机关以及党组织还十分盛行的旧的工作方式和作风同群众日益增长的积极性不相适应所具有的危险性。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克服这一矛盾。

但是，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种情况。如果

群众的消极情绪和群众落后于改革要求的现象成了改革产生困难的主要根源，那么情况会糟得多。幸好情况不是这样。劳动人民的要求和迫切感有增无减，甚至超过了改革的实际速度。

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与公民的直接交往和公民的来信已成为同群众建立“反馈联系”的极为重要的手段，这些来信是寄往报刊（已经刊登很多）、政府和最高苏维埃的。最多的是寄往党的中央委员会。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过去也有许多来信是寄给各级组织的。但是，现在来信本身的特点已经改变。来信中很少申诉所谓“个人问题”：请求帮助解决住房、发给退休金、平反冤案，恢复工作等等。尽管这种来信还是有的，但现在已不是主要内容。来信中主要是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与关切。好象在多年的缄默与疏远之后，心中的苦闷突然爆发了。新的形势使人们坦诚相见。他们不想向别的什么人，只想向国家领导人诉说自己的想法、主张和忧虑。一些来信简直是心灵的呼唤。出版商在看了我这本书的手稿后，请求我引用其中最典型的话。我这样做了。下面是摘自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工人焦尔诺夫（33岁）来信中的话。

“我不是苏共党员，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给您写信，对您唤醒我们普通工人的公民感表示真挚的感谢。人民期待着改革……”

“坦率地说，一开始许多人不相信改革的大方向。这并不是因为它违反我们的意愿。绝对不是。人们在轻信漂亮话与现实脱节方面吃够了苦头。但是很快我们看到，改革不是一场短暂的运动，而是历史的必然进程。而最主要的是发现它涉及我们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人们开始真诚地关心国家的状况，开始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提出批评意见。在本单位已经自发地对生产上的‘棘手’问题展开讨论，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我们产品的质量感到羞愧！要知道，我们是在盗窃自己的东西……”

“谢谢您！一位您所不相识的人写信表达深切谢意是很难为情的，但是我们向一位医治好我们的重病的医生表示感激是用不着害羞的。你医治好我们公民的消极情绪和麻木不仁情绪，使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公正、民主……要知道，过去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认真对待苏共中央全会，甚至党的代表大会。而现在就连我7岁的儿子老是叫我去看电视：‘爸爸，快来看，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讲话！’”

“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至于错误，谁都不能保险不犯。我们这些开路先锋没有什么榜样可学，因此我们只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下面这封信来自立陶宛。是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布里科夫斯基斯写来的，信中说：“心中感触万分，

简直不能再沉默了。多少年来，我们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第一次看到了正气凛然的人们。仅这一点就已经是个伟大的成就了。

“人们对您的政策有什么想法？怎么对待它的呢？”

“我不会对您撒谎，敬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因为这对共同的事业有害。我要讲真话。

“我不打算谈居民中的特权阶层。这都很清楚。许多人还想醉生梦死，继续逍遥自在，过天堂般的生活。

“我想讲的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是这场改革所考虑到的那些人。很遗憾，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深刻理解和相信您的政策。但是，不应感到意外。在这样可怕而漫长的‘冬天’之后，很难期待头脑里能立即解冻。这将是一个长期的令人痛苦的过程。

“但是，一切都会好的。

“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我都去教堂祈祷，祈求上帝不要由于我们的罪孽而惩罚世界。当然，您是无神论者，尽管这样，您的事业与行为证明，某些信徒应该向您学习。因此，您知道吗，我每个星期天在教堂从9点到13点为您和您的家庭向上帝祈祷。”

基什尼奥夫市教师多布罗沃利斯基在信中写道：

“我们是今天的青年人。我们应继承列宁的事业，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您的劳动是宏伟的。让我们努力使这项工作不致徒劳无益！对我这封信的语调请勿见怪，它

只是由于对某些人不理解党最近作出的决定和您本人与人民的交往而感到十分痛心。我要声明，我‘赞成’！赞成您与劳动群众会面，赞成坦诚而公开地谈论迫切的问题和困难等等，但希望这些谈论最后能成为实际行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您那列宁式的工作作风：在人们当中开展工作，为人们工作，代表人民工作！正是由于这样才常常争吵得嗓子都哑了。

“很多人（我指的是30至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十分僵化。我敢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已经僵化了！也就是说，在言谈中和在大会上，他们（现在已是大大小小的首长了）都表示‘赞成’。他们都说‘赞成’！赞成什么？全都赞成。赞成革新，赞成改革，赞成，赞成，赞成……下命令吧！差一点要敞开衬衣拍胸脯了。而实际上呢？是在说谎。我曾想要弄清楚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相信一个为了我们大家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健康和精力的人呢？你们以为唤醒一个沉睡了几十年的有亿万人口的国家容易吗？你们以为当许多人还在详解辞典中寻找主动性这个词的词义时要提高人们的主动性容易吗？使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振作起来是件简单的事吗？！……”

“我同您在进行一次非常诚实而又十分原则性的谈话。我表达了苏联受过高等教育的整整一代青年人的想法和期望。”

格鲁吉亚的瓦尔达尼扬来信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可能您还记得我。那是您还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作的时候，您曾召集最先开始实行工资奖金承包制和农机手作业队承包制的人开会。我当时在亚历山德罗区的‘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任总经济师。您与我谈了很长时间，询问了所有情况——生活、情绪、工作……”

“现在您在对内对外政策中提出的每项倡议都鼓舞着我，鼓舞着所有正直的人，因为这些倡议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和我们关心的问题。但痛心的是，应该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您的主张。”

“很难说是他们的过错。我说得十分坦率，这种坦率是您所喜欢的。糟糕的是，地方上的领导和以前的领导一模一样。现在要改造他们非常不容易。”

“我们感到您的工作很困难。但我们恳求您：一步也不要后退！丝毫不要改变主意，不要有半点退却。让那些不赞成您的人见鬼去吧。然而，人民乐意为达到您提出的目标作出自我牺牲。这就是我想写的。”

最后是列宁格勒人拉斯塔的来信，她在信中说：

“我们大家都在帮助您，我们大家都应该同一切可恶的旧现象——官僚主义、贪污盗窃、调和主义、溜须拍马等作斗争，包括同对当权者的恐惧心理作斗争。现在，这是每一个不想复旧的人的义务。这也是每个在自己的

岗位上象您那样不遗余力地工作的人的义务。要知道，任何人都清楚：您肩负着巨大的非人力所及的重担，它耗费了您多少力量、时间、精力和体力。建设总是困难的，而在事先还需要清除污泥的地方进行建设则加倍困难。如果您知道广大的普通群众完全支持您，他们热爱您并为您担忧，您大概会感到轻松些。”

这样的来信不胜枚举。这本书也容纳不下。许多写信者谈到，他们那里——工厂、农庄、工地、机关——如何开始或还没有开始改革，他们为投身于改革做了哪些事，分析了改革道路上产生困难的具体原因和普遍原因。

这些来信（它们有成千上万封）证明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巨大信任。恢复了信任！这是伟大的力量，无价的资本。来信中表现出的思想解放、高度的政治素养、凭良心生活和工作的愿望是令人惊喜的。

我们把来信收集在一起，定期在政治局讨论。这有助于国家领导人掌握各种事件的脉搏，正确地评价和修正自己的政策，制定当前实际活动的方法。

来信内容的总基调是无条件地、热情地支持改革。即使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也是希望有助于改革。同时，读者大概已从我引用的来信中发现，信中也流露出不安心情：改革可别遭到50—60年代改革那样的命运，可别刚开始就被扼杀了。人们要求我们：不要退却！一

步也不要后退！更大胆、更坚定地勇往直前！

总之，不仅需要善于根据群众接受政策的程度和社会意识对它的反应情况来修正政策，而且要保证获得反馈，即从人民的思想、建议和劝告中，包括通过与人们的直接接触中吸取养分。

人们现在开始习惯这样做了，而最初曾有一些“好心人”警告说，与人们在露天会面时，可别让戈尔巴乔夫“氧中毒”，可别对他讲得太多，不要讲那些克里姆林宫里不该知道的事。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大概现在也有），说什么直接的非正式会见，无非是向人民谄媚。对此我有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没有比从人们那里直接得到的劝告、建议和警告更宝贵的东西了。

总的来说，人们在这样的会面中变得“坦率”了。过去怎样呢？你提出问题，他站在那不吭声；也许是害怕你，也许是对你不信任。的确，有时也免不了说几句恶意中伤的话，说莫斯科都在管些什么呀？这不好，那也不好，可又提不出任何建议。现在每次都展开有意思的负责任的谈话。工人和农民昂起了头，知识分子发出了自己有影响的要求严格的声音，而空谈家们却安静下来了，回避加入严肃而求实的谈话。在进行这样的谈话的地方，人民自己就会阻止他们。

1986年秋天，我曾在克拉斯诺达尔的十月革命广场与居民们会面。谈话的内容多么充实，人们提出了多么

好的问题啊！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们如此尽心尽力地支持中央的路线。于是我明白了，人民有多少苦衷，他们想向领导提出多少建议和忠告。

在库班我原不打算讲话，只是去看看那里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亲眼看看对于我国十分重要的经济试验搞得怎么样。那里整个地区的生产单位已开始在自筹资金和自我补偿的条件下工作。然而经过多次交谈后，我认为有必要讲话。我想，由于所讲的东西是来自生活本身，它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也是有益处的。与人民商谈和会面是完全必要的，许多事情靠指令性指示是办不好的。

业已取得的改革经验再次证实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即革命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最有效的大学校。

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是最和平、最民主的革命。我们将在民主化进程的范围内，去克服那些在社会革新过程中遇到的和将会遇到的错误立场乃至直接的对抗。在我国的居民中，不存在任何在其长远利益上同改革不可调和地相对立的大集团。

在民主化进程中我们所经受的困难，有许多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大家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某些秩序和习惯的产儿。因此，可以说所有的人都需要改革，包括政治局、政府和最高领导层。一些人能比较轻松、比较快地做到这一点，另一些人感到困难，第三种人则自己要求退休或去做其他工作。

人民正从往日的冷漠中摆脱出来，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社会生活。在这方面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人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有的地方召开大会或组织游行。总之，民主化进程不排斥这种社会活动的自发表现。我们已经告别了那种时代，那时这种自发活动会引起官僚们的恐惧并遭到行政当局的禁止。尽管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辩论素养，有时发言的人还会遭到主席团的制止，而在某些文章中，作者还在清算个人恩怨或者盛气凌人地扣帽子。但现在大家已逐渐认识到，民主是与官僚主义对社会生活过分的限制不相容的。当然，任何一个自尊的社会都不会容忍无政府状态、姿意妄为和混乱。而我们自然也是如此。民主也是法制，它要求不论是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或是全体公民，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

让公开性大放光明!

最明显的新气氛也许表现为广泛的公开性。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人们既应知道好事，也应知道坏事，以便扬善除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应该如此。

重要的是要看到所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东西，在改革的条件下要用这些东西武装起来，使之成为全民和全党的财富，要利用那些在改革的条件下萌芽的新方法。

但主要的是要讲真话。列宁说过这样一句话：光明、再光明，让党知道一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消除阴暗角落，因为那里会重新发霉，我们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东西又会逐渐繁衍。因此，需要大放光明！

目前，公开性是社会正常精神道德气氛不可分离的特征，这种气氛可以使人更深刻地了解我们过去如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努力干什么，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因而能够自觉地参加改革。

社会气氛的民主化和沿着社会经济改革道路加快前进步伐，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发展了公开性。当然，这一进程的基础是党的政策。但是，如果政治方针的实施不被群众所理解，事业就会停滞不前。群众应该了解生活的所有矛盾和复杂性。取得了哪些成绩，是什么在阻碍发展，在于挠我们，使我们迷失方向，有关这一切的全面而真实的情况，劳动群众都应该知道。

人们确实对公开性感兴趣了。而且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想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想知道谁在工作 and 干得怎样，而且也因为日益确信公开性是对毫无例外的一切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全民监督的有效形式，是纠正缺点的强有力杠杆。

因此，社会的精神力量调动起来了。理智和良心和谐地迸发出来，开始夺取腐蚀心灵的消极和冷漠态度的阵地。当然，仅仅是认识和讲出实情，这还是不够的。

主要的是在这种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行动起来。

我们开始认识到：迫切需要学会克服实际情况与所宣布的政策之间根深蒂固的脱节现象。正是精神领域里的这种重大变化，构成了我国社会中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和实质。

已经开始制定保障公开性的法律文件。这些文件应该保证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活动的最大限度的开放性，使劳动人民有实际可能就社会生活和国家活动中的任何问题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苏共中央在开始改革时依靠两种强大的实际力量——党的委员会和舆论工具。我甚至要说，假如舆论工具在中央四月全会以后并未立即积极地认真地参与这一过程，那么，党就可能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就改革的全部问题进行讨论的水平，而问题是广泛的，各不相同的和互相矛盾的。

中央委员会高度评价舆论工具对改革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都要通过人来进行。人站在斗争的前列，全部改革都要通过人来实现。这就是说，人的思维、人的社会认识水平和公民立场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坚定地沿着民主革新的道路前进，它极为关心使每个人，无论是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都积极参加讨论计划和实现计划的工作。舆论工具现在和将来都会在这方面起巨大的作用。当然，

舆论工具并不是表达人民的意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情绪的唯一渠道。但是，这是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和群众性的论坛。党关心使这个论坛能发出公民的自信的声音，使它不仅仅报道全国进行的讨论，而且能保证决定的正确性，决定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和需求，然后是对这些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民主监督。

国内开展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反映在各种报道中，而且越来越涉及到舆论工具的工作本身。我们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逐渐地好象解冻了，触及到一切新的题目。报刊普遍活跃的一个迹象是搞群言堂，而不是一言堂。总结和自我总结越来越让位于各种各样的采访谈话、“圆桌”座谈和刊登读者来信。

是的，往往会遇到舆论工具的这样一种嗜好：将作者的积极性限制在三五个撰稿人身上。这完全是职业上的傲慢。为了使整个社会参与讨论，广开言路是非常有益的，这也可以说是要使每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

职业作者谈自己的立场，这很好。但是，读者也饶有兴趣地阅读记者同工人、区委书记、集体农庄主席、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的座谈和谈话。在这些座谈和谈话中充满富有生气的思想。或者拿读者来信来说吧……这是多么美好的富有人情味的材料呀！多么扣人心弦啊！

同时也发现，这样的作风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合乎

口味。特别是不合这样一些人的口味：他们不习惯、不善于、甚至也不想在公开性和开展批评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正是这些人对舆论工具表示不满，而在许多情况下则公开要求压制公开性、要求遏制它。

我们并不认为，关于批评是否太多了，是否需要如此广泛的公开性，民主化会不会产生不合心意的现象等问题的争论，是什么消极现象。这些争论本身就贯穿着对我们社会稳定性的关心。要知道，可能有高谈民主，高谈公开性，并加以歪曲的情况。也会有人似乎是赞成新事物，而一旦要采取行动，就对发扬民主、批评、公开性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和保留。

苏共中央是否将通过报刊和舆论工具在公民积极参加下继续实行公开性方针——这样的问题已不复存在。我们需要公开性就象需要空气一样。

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并不是玩弄民主的把戏，而是党的原则立场。

我们认为，发展公开性是集中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观点的方法，这些意见和观点反映了苏联社会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的利益。如果不通过批评，特别是通过来自“下面”的批评来检验自己的政策，同消极现象作斗争，防止产生消极现象，我们就不可能前进。我不能设想，没有这些，还有什么民主可言。

在改革和民主化的条件下，批评的标准和性质也在变化，这是另一回事。批评首先是一种责任，批评越尖锐，就越应当负责。就社会问题发表这样或那样的文章，这不仅是个人的自我表现，不单是个人意见的反映，而且也是总体或者自尊心的反映。这是全社会的事。民主化的过程对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相互关系作出了实质性修正。这种关系应该成为伙伴关系，应该建立在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在这方面，对话更为合适，任何傲慢的教训和训斥，尤其是检察官的语调，都是绝对不合适的。但是，即使在职业水平很高、受人尊敬的作者当中，也能遇见这种情况。任何人都没有对真理作最后评判的权利。

有一点是无疑的，即批评始终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而这就取决于作者和编辑的良心，取决于他们对人民的责任感。

报刊宣传还应该更为有效，决不给懒汉、自私自利者、看风转舵者、压制批评者和恶意煽动者以安宁，应该更积极地帮助那些为改革而忘我斗争的人。在这方面，许多工作取决于地方党委。党委有了改变，报刊宣传也就会改变。

我特别想强调指出下面一点：报刊应该联合和动员人们，而不是使他们涣散，不要使人感到委屈和对自己没有信心。革新社会，这也是为人的尊严、为推崇人、

为人的荣誉而斗争。只有当全是实情和对公正的细致关心成为批评的基础时，批评才能成为改革的极其有效的手段。

捍卫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我们报刊的传统。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纸分析的对象。但是，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是你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你是否与人民的命运、前途休戚与共。这是主要的。要知道，有的作者有时把引人注目的事实——尖锐和痛心的事实搬到报上来，让人们围着它转，把他的想法和爱好强加于人。

我这样认为：对诚实的、坦率的、直截了当的谈论，即使带有怀疑，也要欢迎！如果你指桑骂槐，那就对不起……公开性应该巩固我们的社会。需要树立的东西是有的。只有那些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我们希望加强责任心的要求会妨碍满足他们的野心的人才会怀疑这一点，而他们的野心是完全背离人民利益的。

当然，所有这一切绝不是号召给批评园地围上禁止入内的栅栏，转向似是而非的做法，拒绝批评性的分析。

为了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和提高人民的政治修养，需要更充分地利用舆论工具，以便讨论社会和国家的问题，扩大社会监督，积极开展争取加强责任心和劳动纪律、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和秩序、反对违反社会行为准则和苏联

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的斗争。我们力求组织好宣传工作，使舆论工具作为一支自由、完整和灵活的力量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起作用，能够及时报道最紧迫的事件和问题。

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不是一时的运动。这些东西一经宣布，就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没有这些东西，任何根本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

我们这里还有不少工作人员，他们对舆论工具的批评继续作出极为病态的反应，在评价这样或那样的文章和广播电视节目时，夹杂进个人的嗜好、陈旧的经验和社会利益的错误理解，他们有时简直是不理解报刊在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往往用西方宣传工具对这篇或那篇批评文章的反应来吓唬人。他们说，看呀，西方正等着我们的自我批评，并用这种批评转过来反对我们的国家，使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威信扫地。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反正我不害怕这一点。以批评的态度重新认识自己的经验，这是有力量的表现，而不是软弱的表现。正是这种态度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

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说是“悄悄地”压制批评或者逃避批评的办法。这就是有些工作人员口头上同意公开批评，甚至感谢公开批评，并许诺要采取有效措施，而实际上却不忙于作实际结论。显然，他们指望一切都只是

说说而已，全都会“烟消云散”，不会再提到他们的错误。对于他们来说，主要的是要及时醒悟。

在这方面我想重复我在一月全会上说过的话：对待批评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对改革、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新现象的态度的重要标准。

我们将尽一切所能，使任何人既不能压制批评，也不能借故推脱批评。

批评是一副苦药。但是有病就必须吃药。虽然皱眉头，但也要吃。而那些认为可以象吃药一样把批评按时间分成几份来进行的同志们也是不对的。那些认为停滞现象已经完全克服、现在该停一停的人也是不对的。在批评问题上刹车，就是损害改革。

改革与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改革。在这里我要说几句离题的话。忠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是苏联社会的一个有机部分，就其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态度而言，他们是非常爱国的，这是我们伟大的、也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成果，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资本。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不简单的。他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包括咒骂沙皇制度、甚至为反对沙皇而斗争过的民主知识分子，被革命吓倒了，卷进了白俄流亡国外的浪潮，逃到了国外，将自己的才干和知识贡献给了别国人民。这是年轻的苏

维埃社会的一大损失。

由于30年代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和镇压知识分子,包括党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在内,遭受到很大的、而有时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也是对国家的智能潜力的沉重打击。

但是,造就苏维埃知识分子的过程在继续,并且得到了加强,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迫切需要。列宁的文化革命把一个半文盲和简直是文盲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但在停滞时期形成了反常的局面:我们的社会不能够以应有的方式利用这种巨大的文化潜力和创造能力。原因就在于发扬民主受到人为的阻挠。各种各样的禁锢、对工作中的新的创造性态度感到害怕等,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我回想起1986年6月会见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情景。会见的主题是改革。我不得不请同志们学会以新的作风对待知识分子工作。是停止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时候了。这种作法是有害的,而且也不允许。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的民主革新纲领。

已经举行了一些创作协会的代表大会——电影工作者、作家、艺术家、作曲家、建筑学家、戏剧活动家、新闻工作者等协会的代表大会。会议开得很活跃,群情沸腾。所有这些代表大会都真诚地支持改革。与会者也

尖锐地批评了本协会的工作。批评是很激烈的，结果这些协会的许多前领导人没有被选进领导机构。但与此同时，夸夸其谈的人也没进入领导机构。被选为协会领导人的是一些著名的、有威望的人。

我对那些认为辩论过分激烈的人说，既不应当惊奇，也不应当愤慨，应当认为，这些代表大会是一种新现象，属于正常的现象。因为民主化到处展开，有时具有尖锐的形式。有人反驳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哲学家，自己最有权威，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正确，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工作。我的回答是：同消极的知识分子、同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的人打交道会更难。

象任何复杂的工作一样，没有情绪激昂的浪涛声当然是不可能的：在大转折时期，在革命时期，历来如此。现在我们大家就好象重新上一堂民主课。我们都在学习。我们现在还缺乏政治修养。哪怕是听取自己朋友、自己同志的意见，有时也不够耐心。大概，这一切都将过去。我们将掌握这门科学。最尖锐的问题都应当讨论，但要互相尊重。甚至在最极端的观点中也会有某种宝贵的、合理的东西，因为一个诚实地捍卫自己的观点并按照自己的方式为共同的事业操心的人，是会反映出生活的某些实际情况的。在我们这里，这不是对抗性斗争，而是探索，是辩论：我们应该如何走上改革的康庄大道，如何加快步伐并使步伐变得坚定，使变化不可逆转。因

此，我不认为辩论、对各种观点加以比较是什么悲剧。这是正常的。

在公开性条件下，确实在文艺工作者中出现了派性和不容异见的现象。在作家中间也有情绪偏激的时刻。我们已把中央的下述观点传达给他们：如果不去团结文艺创作知识分子，而是使对骂愈演愈烈，而且其参与者开始利用公开性、开放、民主来算账，为过去所受的委屈复仇，对批评进行报复，那是很可悲的。如果在革命时刻创作知识分子陷入琐碎的事情，任意利用自己的自负心，不是把精力放在创作上，而是用在毫无意义的吵架上，那是最糟糕的。中央号召文艺工作者：摆脱自己的情绪和陈规陋习，站得更高一些，振奋精神，关心人民，关心社会。愿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也表现在下面一点：他们的创作协会首先关心的是社会的精神发展。

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他们乐意挑改革的重担。我们的创作知识分子同党一起开始进行变革。他们的公民立场越来越坚定。我们关心这种积极性，并珍视他们在1985年4月以后参加改革、帮助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愿望。我们希望，知识分子的贡献会更大。知识分子正在进入思维和责任心的新境界。其方向符合苏共的政治路线和人民的利益。

二、新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执行中

经济改革又是怎样出现的呢？

必须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在改变国民经济结构、使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发展轨道、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方面所作的努力，越来越同根本改革经营机制、改革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性联系起来。

社会主义和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制，实质上包含着促进经济不断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但是，为此每次都必须探索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经营的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同时，最主要的是，使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成为生产的主人。不这样，工作人员、集体就不会，也不可能关心他们的劳动成果。

列宁有关寻找将公有制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的当前最有效的形式的思想，也是我们进行一切探索和我们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全部构想的基础。

经济改革 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

在实现根本性的经济改革的工作中，重要的是不许重犯过去的错误，这种错误使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改变经营管理体制的尝试遭到失败。同时，那些尝试是不全面的和不彻底的，因为它们把重点放在一些问 题

上，而又忽略了另一些问题。是的，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过去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治标性的、虎头蛇尾的，有时并没有触动问题的实质。

我要说，我们制定并已提交六月全会讨论的经济改革构想具有全面的和综合的性质，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必须发生深刻的、根本的变化。这就是企业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这就是根本改革经济的集中领导。这就是根本改变计划工作，改革价格形成、财政信贷机制，改革对外经济联系。这就是建立新的管理组织结构。这就是大力发展管理的民主原则，广泛采用自治原则。

然而，任何一个复杂过程都有它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反映出某些措施之间、某些具体步骤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我们也必然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从何做起？改革管理的起点是什么？

乍看起来，在我们的计划经济中，从中央开始改革，确定中央经济机关的职能和结构，然后是确定中间管理环节的职能和结构，最后一直进行到基层单位——企业和联合公司，这好象是合乎逻辑的。从抽象逻辑的观点来看，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现实生活和现有的经验迫使我们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另一种行动逻辑：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和联合公司开始。首先为它确定最有效的经营模式，为它创造最良好的经济环境，扩大和加强它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根本改变一切上级经营

管理环节的活动。

我们在确定改革的这样一种顺序时，所遵循的是：主要经济活动恰恰是在这里展开的，物质财富是在这里创造的，科学技术构想是在这里变成物质的。恰恰是在劳动集体里实际地逐渐形成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人们的各种利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交织在一起。是的，其实全国的社会政治气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集体里形成的气氛所决定的。

同时也考虑了过去的经验，过去曾多次试图改组最上层管理机构而不以“来自下层”的运动为后盾，结果均告失败。这是因为受到了不愿与许多特权和权利决裂的管理机构的顽强抵制。最近我们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现在也不得不应付这种情况。这里也同整个改革工作一样，必须把来自上面的动力与“来自下面”的运动结合起来，即使改革本身具有深刻的民主性。

以前企业经营机制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呢？

首先是内部刺激自身发展的力量薄弱。实际上，企业是通过一系列计划指标接受任务和取得资源的，实际上任何费用都得到了补偿，产品的销售实质上是有保障的，而最主要的是工作人员的收入与本单位工作的最终结果——合同的履行情况、产品的质量、利润等没有多大关系。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这种机制指望的是中等工作，甚至是劣等工作。如果经济为落后企业创造温暖的

条件并使先进企业受到打击，这种经济又怎能前进呢？

当然，我们再不能这样干了，而新的经营机制应当使一切因素各就各位。新的经营机制应成为强有力的杠杆，成为出色的、进取的和主动的工作的推动力。企业本身应当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确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计划。企业的基础将不是上级机关确定的许许多多详尽的计划任务，而是国营单位、实行经济核算的企业、商业单位直接订购相应数量和质量的具体产品。应当使企业处于这样的条件下：企业之间为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要而开展经济竞赛，工作人员的收入则同生产的最终结果、同利润密切挂钩。

所有这些经营原则及其具体形式，我们均已列入提交全民讨论的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全民讨论已在各劳动集体、工人会议、工会会议和通过舆论工具广泛展开。这个文件实质上涉及全体人民。人们感到需要他们发表意见。由政府、科学界和各主管部门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小组研究了已经提出的建议、修正和补充意见。根据全民讨论的结果，一切好的意见均已写进这项法律，这有助于大大改进这项法律。

这些修正绝大多数涉及了扩大集体的权利。在讨论过程中，人们普遍要求：在习惯势力的压力下别后退，坚定地向前进。他们说，要使新法律不受许许多多指令的限制，因为名目繁多的指令可能阉割新法律的实质，

阻碍改革。苏联最高苏维埃已通过新企业法并从1988年1月1日起生效。

的确，报刊上也曾经出现过超出我国制度的建议，比如有人认为，压根儿就该放弃计划经济，允许失业。但是，我们不能允许这样做，因为我们打算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以另一种制度取而代之。从西方另一种经济中塞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相信，如果真正发挥出社会主义的潜力、遵守社会主义的各项基本原则、充分考虑人的利益、利用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能力就比资本主义大得多。

在经济改革中，我们认为企业法具有基本意义。我们把一切其他措施和步骤都同这项法律联系起来，并从这些措施和步骤在多大程度上完全符合这项法律，能否有助于在实践中运用这项法律这一角度来看待它们。

政治局几个月来在筹备全体会议时，不断地研究对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财政部、国家银行、国家其他经济部和主管部门、各部门管理机关活动进行全面而严格的客观分析所得出的结果。草拟了有关各中央机关工作方针的决定草案，其出发点是要使这些机关的活动（和它们的正式职能本身）严格符合国营企业法，丝毫不与这项法律相抵触。全会讨论了这些决定草案，对它们作了补充，这些决定已经通过并开始生效。

实质上，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及其各项决议完成了建立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工作，这个模式符合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

全会和全会后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发展并加强了下述方针：使人积极投身于经济与生产活动，把国家利益同个人利益、劳动集体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苏联劳动者变成经济的真正积极的主人。

当然，我们还要再做些工作，也许还要重新做。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从来也不会发生完全取消一种经营管理体制并立即代之以另一种体制的事情，哪怕它是一种更完善的体制，就好象改变某种机械结构似的。要安排一种有活力的灵活机制，能够敏锐地调整生产中的变化，不断革新，接受先进的东西和排除过时的东西。现实生活将校正这个进程，修正这一进程。这方面的主要危险是：停滞不前，认为既然决定了，通过了决定，这些决定就该一成不变地永远适用。

在制定根本经济改革计划之后，我们也就给现在对加速和深入改革的各个方面发动进攻开辟了一条全面展开的战线。已经通过的各项决定，为完成本五年计划和至2000年的长远计划的各项任务奠定了必要的组织经济前提。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毫不拖延地熟练掌握新的经营机制。

也许，在经济和管理的改革中，最重要的关头即将

到来。建设性工作的阶段已经开始。现在需要的是把一切付诸实施。努力的重心——当前的特点也就在于此——已向采取实际行动领域转移。

转向完全经济核算!

正如我已说过的，要普遍付诸实施的事情的实质在于，用以经济为主的方法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方法。对于苏联领导来说，不存在是否改行完全经济核算的问题。

是的，存在着客观障碍，至少有两大障碍。其一：必须在已经批准的五年计划条件下，因而也就是要紧密结合五年计划来做这件事。这个特点十分严重地影响了过渡的进程。那么究竟该怎样做呢？是继续以完成五年计划为目标，还是取消五年计划？答案可能是一个：解决五年计划任务！而这个五年计划是个最困难的计划。在科学技术进步领域存在一些重大的遗留问题。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许多社会问题在解决之中。同时，正是在这五年中应当采用许多新技术。企业领导人经历着一个困难时刻：积累了一大堆问题，同时还必须向自筹资金过渡。

另一个障碍与下述情况有关：新的管理机制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尚未准备好并且也不会立即付诸实施。做好改革价格形成和财政信贷机制的准备工作需要两三

年，向生产资料批发贸易过渡的工作需要五六年。在确定各部的职能、改革地区管理、精减机构方面也须解决许多问题。

由此可见，过渡时期是很复杂的，在这个时期里，旧机制和所要掌握的新机制将共存下去。但是，我们将不拖延地采用完全经济核算制。我们在积累经验的同时，以全副精力走这条道路。我们将对一切进行试验和研究。

在会见生产工作者，还有各部部长时，我说：不要怕，要探索，要试验。人民充满了智慧、责任感，可以并且应当大胆地、满怀信心地工作。我们若是犯错误，那又怎样办呢？及时纠正比望洋兴叹要好。

对集中制的新认识

在改革过程中，对民主集中制逐渐有了新的认识。重要的是遵守民主与集中两者之间正确的关系，这指的是在不同的阶段，着重点应移向需要的方面。

目前，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不少人要求加强集中制。平衡、比例、居民的货币收入与商品总量和服务量相适应、结构政策、国家财政、国防，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一个牢固的集中原则。所有的共和国、我国各族人民都应当感到他们的实际条件不同，发展的潜力各异。这就是苏联社会稳定的保证。因此，我们不想削弱

中央的作用，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同时不能不看到，中央忙于处理各种琐碎的小事。我们将使中央摆脱业务工作，因为要是处理业务工作，中央就会忽略战略性问题。

在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上受到公正批评的事情，有许多首先与中央的疏漏有关：中央未能及时察觉危险的趋势，没有找到解决新问题的办法等等。我再说一遍，改组中央机关及其职能的全部工作将严格按照国营企业法进行。改革条件下的集中制，与官僚主义为各个生产、科研和设计单位多方面的活动作出详细规定的做法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还要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开，改变各部工作的实质，改变各部的任务本身。

我们将拟定计划工作民主化的方针。这意味着将不是形式地，而是实际地从企业，从劳动集体开始制定计划。正是这些企业和劳动集体将要自主地从社会需要出发对其产品生产作出计划，社会的需要则体现在控制数字、国家订货和同用户的直接经济合同联系之中。

国家计委要坚决放弃为各部和主管部门制定工作细则和安排它们的日常工作的做法，后者也不要对企业这样做。企业活动（工资基金、利润分配、预算缴款等等）将通过长期经济定额加以调节，实质上这就是自我调节。

规定扩大各级计划工作的公开性，对全国性和地区

性的社会经济问题、科学技术问题和生态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为了找到最佳解决办法，将把多方案原则纳入计划工作体系。

与先前的做法不同，中央机构将只在数量有限的指标方面，即在完成国家订货、利润、劳动生产率，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领域的综合指标方面对企业实行监督。企业完成合同义务和重要种类产品、工程和劳务的国家订货，将成为企业活动的极其重要标准。随着市场的饱和，国家订货的组成和数量将逐步减少，以利于厂家与用户之间的直接联系。当我们取得相应的经验时，国家订货就会在招标的基础上运用竞赛，即社会主义竞争原则加以分配。

物资技术供应系统将发生根本变化。变化的主要方向是从所谓的调拨，即集中分配物资向批发贸易过渡。

简言之，计划工作的优越性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的刺激因素相结合。但是，所有这一切将纳入社会主义经营目的和原则的轨道。

企业权利与经营自主权的扩大、中央各经济主管部门和各专业主管部门职能的变化，要求根本改变管理机关的结构。

从前，要解决某项加强管理的任务，往往就要建立一些新的组织环节，这导致机关膨胀，机构臃肿，运转不灵，官僚主义化。

我们看到，经济改革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管理机关的臃肿和效率不高而快不起来。因此，我们将大力缩减管理机关，必要时我们将精简它的机构、合并各专业部。我们已经有了—定的经验。例如，我国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是由七个全联盟部和主管部门领导的。我们已将所有这些主管部门合并成国家农工委员会，同时将管理工作人员的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种情况是，合并一些部，将它们融合起来。我们还将这样做，并采取具体的办法。

现在我们大家已经清楚：在目前的经济规模下，一个部或主管部门的任何一个机构，哪怕是业务水平最高的机构，也无法承担绝对解决全部问题的责任，无法代替劳动集体的设想和倡议。然而，中央主管部门和企业之间权利的再分配做起来并不容易。各部的机关和部长们都不愿丢掉不分巨细、事必躬亲解决问题的习惯。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这样做要容易得多，也简单得多。把中央的一部分权利让给地方，一般来说是很难受的，我再重复一遍，尽管大家——部长们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对这样做的必要性都十分清楚。他们在理智上懂得，这样做对事业有利，但在行动上往往把狭隘的本位主义利益，或者干脆把小集体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

再谈—谈完善经济管理的另一个方面。经验表明，

在各部门的结合部可以挖掘出取得最高效益的很多潜力。但是，希望国家计委理顺部门间相互关系的各个环节，找出一个最佳方案，这等于是幻想。何况，各部也无力做到这一点。这一切把建立大型国民经济综合体管理机构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大家知道，管理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要坚决地行动起来，但同时又要谨慎从事，不要大轰大嗡。

把技术装备程度提高到世界水平

在改革计划工作和经济活动以及扩大企业权利的同时，我们认真研究了科学技术进步问题。我们将给处在科学技术进步关键地位的那些部门追加财政和物资支持。为此，已经制定出全国专项纲要，资金也已落实。

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机器制造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将得到更新。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几乎比上一个五年多1倍。

对工业工作的分析搞清楚了投资政策出的错误。多年以来一直执行一条不断建设新厂的方针。建车间，盖办公楼用去了大笔资金。而现有的企业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技术水平上。当然，倘若能开两班或三班，充分利用现有的全部生产能力，那么用现有的设备也能完成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務。但是，日益陈旧的资产无论如何也要拖我们的后腿，这些日益陈旧的资产不能保证生产

出现代产品。必须淘汰旧机器。因此，要根本改变结构政策和投资政策。

1983年，我去过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当时这家工厂——苏联汽车制造业的先驱之一，正积极准备进行改造。1985年我再次去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了解改造的情况。了解到这家工厂的改造是以中等技术水平为目标，重点采用5—7年前生产的设备。因此，在工艺上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而且还需要额外增加工人。以落后的技术为目标，不可能做到生产的根本集约化，而只能继续落后。原来这家工厂有另外一个比较先进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没得到支持，而被扔到一边去了。我们支持工厂职工重新制定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改造计划。编制了新的改造计划，这个计划正在顺利执行。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将成为真正的现代化企业。

十分清楚，一般来说，为了在工艺和技术方面取得重大变化，需要一个临时的跳板。正如我们大家常说的：“莫斯科不是一天建成的。”倘若我们提出一个任务，要一下子把一切都解决，我们就只能用过时的、无形陈旧的技术设备实现生产现代化。就其实质来说，这只是原地跑步而已。

我们分析了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技术设备，这种技术设备是否符合世界水平。原来，我们制造的技术设备只有一小部分达到了世界水平。结论很清楚：与其长期处于

技术落后状态，不如现在痛下决心，努力掌握新技术，而后通过发展机器制造业，实现向最新工艺的突破。但是，这个“而后”绝不是一个遥远的时期。不是，在我国机器制造业实行现代化的同时，我们还要花大气力发掘科学潜力，这是我们最迫切、最刻不容缓的任务，我要说，这是一项应予优先完成的任务。我们目前这种科学技术进步状况，首先是由于过分地把希望寄托在对外联系上，而对本国的科学和技术估计不足造成的。

我觉得，我们过分乐观地，我想说，是过分相信地看待缓和政策了。许多人相信缓和是不可逆转的，能开辟无限的可能性，特别是能为同西方扩大贸易经济关系开辟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甚至压缩了某些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制工作，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分工上，认为购买某些新技术比自己重复研究更有利。然而，事实上又怎么样呢？我们由于天真而受到了严重惩罚。出现了禁运、封锁、禁止、限制、恫吓同我们做生意的人等这样一个时期。一些西方政治家甚至得意地公开宣称，苏联经济的崩溃已近在眼前。不过，这一次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我们吸取了必要的教训，自己开展了必要的研究，制造了原先打算买的东西，这样，西方公司到头来也遭受到损失。顺便提一下，我还认为，禁止和限制这一套做法不仅仅是针对苏联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其他国家有竞争能力的公司的。

总之，美国通过自己的种种“制裁”、“禁运”和其他限制帮助我们明白了许多东西。正如俗话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们从美国和其他一些不向苏联出售先进技术的西方国家的态度中吸取了教训。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现在在信息科学、计算技术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其他一些方面出现了一派真正繁荣景象。

我们毅然决定消除我们的经济工作者所说的“进口瘟疫”。为此，我们在调动本国科学和机器制造业的巨大潜力。

苏联科学家的许多成果在西方要比在我们自己国家推广得更快，这岂非咄咄怪事。比如说，转子传送作业线就是一例。我们在其他方面也是慢吞吞的。我们最先发明了连续铸钢法。然而，结果如何呢？现在，一些国家用我们的方法生产的钢已占钢产量的80%，而我们自己则要少得多。我们从科学发明到在生产中推广，这段路程太长了。外国一些善于钻营的工业家正在利用我们的发明创造发财。当然，我们不喜欢这种情况。显然，情况将会改变。是的，这种情况最近已经开始改变。交流应当是相互的。

为了积极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正在进行大量的工作。正在实施专项纲要，正在发动广大职工、部门科研机构、经济研究机构进行创造性探索，以著名科学家为首的20多个跨部门科学技术综合体已经行动起来。我已经

说过，优先发展我国的机器制造业，是时代的迫切要求。1986年6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已经制定出机器制造业根本改造计划，并提出一项在我国工业史上前所未有的任务：在今后六七年内，在最重要的机器、设备和仪表的参数方面达到世界水平。决定把重点放在机床制造业、仪表制造业、电子和电机工业的改造上。正在广泛地使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实现现代化。

最危险的一种做法是，把愿望当作现实。已经取得的进展才是最有希望的。不久前我到了莫斯科近郊的泽列诺格勒，那里集中了一批电子工业科研机构和企业。科学家和专家们谈到的一些消息使我非常高兴：在一些决定性的方面我们不仅不落后，不仅同美国并驾齐驱，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如此看来，西方在技术上的那种高傲态度反倒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今后的生产试制同样是一件艰巨的任务。

改革的生动内容

今天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任务，有些是过去留给我们的，有些是现在必须立即解决的，有些是刚刚出现的。我贸然重复一遍过去讲过的东西，我仍然想建议读者看一看五彩缤纷的改革情景，看一看日常涌现的各种各样的新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正在形成我们未来的生动内容。我们在发动群众进行根本改

革。这里既需要经济保证，也需要心理保证。因为改正因循守旧的习惯，纠正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社会生活方式的看法，并不那么容易。

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听到和读到我们的某些正人君子的严厉指责。有这样一个迂腐的“正人君子”，一边走一边用手指点着两旁说，这里乱七八糟，那里不成体统，这里不足，那里不够。当有人开始做一件有益的，但不寻常的事时，这位假社会主义者就大喊大叫：你们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也是改革中的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不得不同这些为“纯洁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斗士进行耐心的争论，他们把社会主义抽象地理想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尘不染的”，我们不得不证明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

列宁从不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笔直的。当实际情况需要的时候，他善于改变口号。也从来没有认为一旦通过决议就不可更改。举例来说，当国家和国营成分都还很弱时，列宁就不怕扩大私人劳动。如今，在我们这样强大的情况下，在改革过程中提出发展合作制、个体劳动、承包、自筹资金等措施，竟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会不会破坏“基础”？会不会使私有者大量出现？我们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他们又担心会不会破坏集体农庄。那么商店里很多东西匮乏，又怎么办呢？对这种匮乏状况才应当敲起警钟，而不应庸人自扰：“不

好啦，社会主义面临威胁啦！”

我们认为，个人利益同社会主义相结合，今天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当然，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个人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我们不需要“纯洁的”、教条主义的、臆想出来的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现实的、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列宁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既然大工业和政权在我们手里，什么也不必害怕。我们就是依靠这种力量有计划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作。这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我们的社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更强大，这就更加正确了。列宁以劳动者的利益为重，“一直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我深信，以全面经济核算为基础的最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很快就会在农工综合体中推广起来。第一，在这里我们的集体农庄有着优良的传统；第二，农村的人民富有进取精神，并且善于经营。这一切使我们能更机动灵活地解决经济核算、自我补偿、自筹资金的问题。

从农业的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角度来看，集体承包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家庭承包正在推行。可望取得第一批成果。

1987年8月初，我在莫斯科近郊拉姆斯克耶区同一个已经承包5年、用集约化技术从事生产的小组的成员谈过话。他们栽培作种子用的马铃薯，去年这5个人给国营农场带来大笔利润。当人们自己对一切负责的时候，

奇迹就会不断涌现，就会取得完全不同的成果，你往往会认不出这个人。工作变了，对工作的态度也变了。

在我国社会中，人们愿意参加一切事业，这很好。他们不能容忍的是：对他们的意见和态度不理睬，把他们只当作一个简单的劳动力，而不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和公民。但是，集体承包和由此产生的民主恰恰是把人尊为公民和主人。

现在，在我们许多农业地区都有不少大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些大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有很多大型作业队、分场和综合作业队。它们的技术装备都不错，越来越广泛地采用工业化方法进行农业生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与土地的关系并不密切。这对最终成果产生了影响。现在，在这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我们应当通过集体承包、家庭承包、租赁承包保证同个人利益建立更牢固、更直接的联系。这样，我们就能把大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工业化方法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而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做在两三年内就能使食品问题得到很大改善。

要知道，假如个人利益遭到侵害，就将一事无成，社会也将受到损失。因此，应当寻求利益平衡，我们通过新的经济机制，通过民主形式，通过公开性的环境，通过吸收人们参加改革的各种过程，找到了解决利益平衡的办法。

首先应当保证的是，要创造一个利于进行改革的气氛和使人成为社会积极的、负责任的人的气氛。

这是一种坦诚相见，同人民讨论一切问题，甚至最困难的问题，以便同他们一道解决这些问题的气氛。为此，需要让群众真正参加管理。因此，我们说改革的基础是民主化。在作业队一级、车间一级、企业一级诸如采用了选举领导人和劳动集体委员会这样的形式，已经合法化。从承包集体和家庭牧场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人是多么渴望成为主人。他们不单纯是想多挣点钱，这种愿望是有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钱要挣得诚实。不要去占国家的便宜，而要自己去挣。难道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愿望？完全是一种社会主义愿望，因此，不应当有任何限制，一个人挣多少，都应当归他自己。同时也不允许任何人不劳动而得到厚赏。

改革的社会政策

我们的出发点是，只有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宣布的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才能保证整个改革事业的成功。要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解决住房紧张问题，多生产食品，提高商品质量，发展服务行业和医疗保健，实行高等和中等教育改革，解决许多其他社会问题。

1987年中央六月全会在解决当前任务和长远任务方面，特别重视增加食品生产，增加消费品产量，扩大住

房建设的问题。

正在采取一些重大措施。住房建设规模在不断扩大。这是我们的一项全民性任务。给住房建设增拨了投资。要在城乡帮助人们建房和改善公用设施。

要让人有住的地方，而且住得好。倘若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劳动集体也就稳定了。人们高度评价的，不是工资长得多么快，而是城市或乡村、生活条件、生产、劳动性质本身有什么变化。

在当前情况下，特别不能容忍一些领导人的消极态度，这些领导人不运用现有的条件来解决社会任务。这种情况仍然告诉我们，一方面，以所谓的剩余原则为基础来对待这类问题，即满足生产需要之后剩下的钱才用于社会需要，是一种年深日久的积习；另一方面说明依赖心理根深蒂固。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将打破这一切。经济机制本身迫使你坚决地、明智地、富有进取心地，总之，按主人翁的态度去行动。

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¹⁰ 这些成就也是极为巨大的。然而，我们还在进行高等和中等教育改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看，这首先是当今社会对人的新要求决定的。此外，社会上的停滞现象也影响到我们的教育系统；这里也出现了固步自封和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的现象，而这立即影响到各个方面。

高等和中等教育根本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根据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培养青年迎接未来的工作，摆脱使学生所得甚少，但却负担过重的次要的东西。要从根本上完善学生的人文科学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文化成果。大学和中学的重点应放在鼓励创造性的教学方法上，发挥大学和中学师生的主动性和独立自主精神。新任务要求改变教育的物质基础，主要是教师的工作要达到新水平。将用物质手段鼓励提高业务水平。

现在，我国正在对完善卫生保健基本方针进行全民讨论。全民讨论结束后，这个文件将由苏共中央和政府讨论，而后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这个综合纲要需要大量资金和进行大规模的工作。第一阶段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剩下的几年和第十三个五年计划，财力和物力已经落实。

社会生产集约化促使我们以新的态度看待有效就业的问题，重新配置劳动力。

我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应当更深入地研究如何实现社会公正原则。最近几十年一个最严重的不正常现象是，平均主义观点盛行。在这个基础上，依赖思想、消费观点、小市民心理得以滋长，认为这不关我们的事，让当官的去考虑一切吧。

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社会公正的问题是这么提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公正的基础是

劳动。只有一个人的劳动才能决定他在社会中的真正位置和他的社会地位，既然是这样，就排除了任何平均主义。

即使是现在，平均主义思潮也还常常表现出来。有些公民认为提出社会公正就是“大家拉平”。但是，社会上却坚决提出了一项要求——严格实行社会主义原则。

换句话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对国家事业的贡献。我们应当鼓励高效率的生产劳动，鼓励作家、科学家、任何其他正直的勤劳的人发挥才能。这里我们要讲明：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不能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保证生活条件和消费条件。这种分配原则是共产主义的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福利的分配按另一种标准进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没有贫富之分，没有乞丐和百万富翁之分，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有工作，都能享受免费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以及免费医疗，老人生活都有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公正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现在，当社会尖锐地提出社会公正问题时，许多人都在谈论对某些人和某几类人的优惠和奖励问题。我们有国家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优惠。这些优惠是按对社会有益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提供的。生产领域有优惠，科学与文化领域有优惠。例如，我们特别关怀大科学家、著名

院士和大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人还会获得荣誉称号。比如，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功勋科学家、功勋文化工作者、功勋艺术家都享有比别人多的某些福利。各行各业、各个地区（首先是北方和边远地区）的职工、军人、外交人员等等都享有优惠。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公正的，因为它对整个社会有利。但是，要知道，这里的根据是，一个人所做的贡献的价值和大小。如果出现了不是国家规定的特权，而是个别人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规定”的特权，那么这种特权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就要加以制止。

问题还有一个方面。在我们许多单位、机关和企业里，都有提供服务的部门。在大企业里，实际上到处都有公共饮食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都承担公共饮食部门的部分经费支出；行政管理部門和工会委员会一道做这件事，这样做会降低饮食价格。

我国有一个广泛的医疗机构网，在职工劳动地点就地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不仅有门诊所，还有位于工厂附近的或休养和疗养区内的休养所和防治所。在许多企业里还设有商店、订购处、服装店等等。就是说，有自己的一套服务系统。

不仅在企业里有一套服务系统。比如说，科学院、作家协会和其他一些单位都有自己的疗养院、膳宿旅馆、别墅村。工会也有这类服务部门（顺便说一句，工

会是我国最富有的组织)，党政机关也都有的一套服务部门。这是历史上形成的。

当然，这类服务形式的存在可能产生问题，也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在该地区对全体居民的服务大大逊色于上述单位和机关的服务质量时，问题就更严重了。这种现象自然要受到劳动人民的公正批评。在实行已通过的各种计划过程中，这些问题就要得到解决。

我们将坚定地同酗酒继续进行斗争。这种社会恶习根深蒂固已经有几个世纪了，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同它进行斗争谈何容易。但是，社会已经成熟了，可以来个大转变。最近20年酗酒特别严重，已经增加几倍，对国家的未来已经构成危险。劳动人民不断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同这种祸害的斗争。一些人甚至要求实行全苏禁酒法。但是，我们明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种法令是不合适的。我们这样回答：愿意的话，就在自己家里，在居民点里，顶多是在区里实行禁酒法吧。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劳动者在自己的大会上决定不出售和不饮用酒精饮料。斗争在继续。最近两年来，人均酒精消费量减少了一半。但是，私下酿酒却增加了。光靠行政措施解决不了问题。消除酗酒这种祸害的最可靠途径，是发展业余活动、体育运动、群众性文化活动，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三、走民主化道路

我们的主要潜力

恢复和加强苏联人对国家命运负责的主人翁感和亲身参与并关心公益事业的感情，这是改革条件下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甚至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由于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同集体和普通劳动者的联系削弱以及对集体和普通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估计不足而造成的某种隔阂仍然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不安。

人的因素，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我们的主要潜力，而把这种潜力变成现实的途径则是民主化。

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一切条件来使人的因素发挥作用，首先是要加强我们全部计划的社会目的性。我只想补充一点：我们正在使经济和社会领域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保持平衡。如果仅仅为了经济速度而轻视社会领域的利益，那么对劳动结果的兴趣就会消失。这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并会破坏经济。另一方面，社会领域的建设不应当把经济基础吃光，如果那样，社会蓬勃发展的可能性本身将遭到破坏。这就是说，要找到一个符合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要求的最佳尺度。看来这两方面的相互关系不是处于一种永久和静止的状态，它是不断变化

的。今天，社会政策已经提到首要地位。

道德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劳动集体和整个社会中，如果不能真正恢复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气氛，我们就无法进行改革。如果社会没有在确立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上得到健全，那么虽然可以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政策机制，但仍将一事无成。首先要确立的是社会公正，按劳分配，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纪律、统一法律、统一制度和要求。

我们还通过完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来调动人的因素。这方面的经济核算是什么呢？这不仅是集体的权利，而且也是集体的责任。如果我们说你干得怎样就会生活得怎样，这就意味着让人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集体自然就相对地希望有权实际管理企业和劳动过程，因为其结果决定着集体的收入与生活。这里又是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换句话说，经济核算与劳动集体的自治和自主权有关。

我们正以新的态度看待一长制与劳动集体参加解决生产任务的相互关系。这在今天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作业队、车间、工厂、联合企业一级，没有劳动者通过有关机构参与管理是不行的。此外，集体应当有权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而领导人就能以集体的名义得到实行一长制的权利，以统一的意志团结全体人员。

选举经济工作领导人是生产部门的直接民主。起初

有人吓坏了，开始议论这样的问题：我们把人们引到哪儿去了？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但是，那些如此议论的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人总是有健全的理智的。某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集团利益和互相包庇的现象，但是原则上大家都希望领导作业队、车间、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是可靠的领导人，他们聪明，善于领导，能为生产和改善生活开辟前景。我们的人民了解这一点，他们也根本不需要老好人式的领导人。是的，他们需要的是有才干的、关心人的，但又是严格要求的、公正地严格要求的人。

人们希望厂长、车间主任、工长改变对他们的态度。人们期待着在道德方面作出榜样，首先期待领导人作出榜样。这种榜样是有的，而且还不少。哪里有好领导，哪里就会取得成就。好的领导会关心人，大家都想同他结识。他在下达指示的时候也用不着提高自己的嗓门。有时看上去他似乎很普通，可是他能理解一切，善于解释一切。而解释工作在今天太重要了！如果人们了解为什么不能马上和充分满足这样或那样的需求，他们也会愿意忍耐一下。

我们还力求通过民主化，完善意识形态工作和改善社会中的道德气氛来调动人的因素。还远非每个人都已深刻理解到正在经历的这个关头的尖锐性及其转折性质。要付出不少努力来使那些还在观望或满足于现状的

人转到改革方面来。

大量的因循守旧观念是不会一下子被清除掉的。任何命令，甚至最严厉的命令也消除不了心理上的多年积习。实在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未能完全抛弃那种依靠思想“壁垒”和漂亮的空话来做人的工作的过时形式。必须在这方面进行长期的、紧张的斗争。同墨守成规、华而不实、抽象口号、大讲排场的恶习作斗争是困难的。主要的是不要陷入一帆风顺的幻想，不要让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堵塞人民主动精神的生气勃勃的源泉。

在大街上或在工作岗位上同人们交谈时总是能听到：“我们全都支持改革。”我相信这些话是真诚的和对的，但每次我还是回答说，现在对改革来讲最主要的是少说多做。需要更多的秩序、更多的勤恳精神、更多的相互尊重和诚实。应当问心无愧地生活。好在我们的人民明白这一点，而且全心全意地赞同这一点。这非常重要。有政策，有为这个政策奋斗的政府，有支持这个政策的人民，这是最主要的。其余的一切都不成问题，改革会开展起来，也会取得成就。我从与苏联人生动的和直接的会见中得出的主要印象是，他们以人民自己的感触多么深刻地感觉到了改革的政治意义和思想意义。

法制是民主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们还从改革的广泛和原则性的立场及其实质 ——

民主化出发来看待保障牢固的法制和完善立法工作的问题。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法制。同时，不依靠法制，民主也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因为法制的使命是使社会不受滥用职权的影响，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以及他们的团体和集体的权利和自由。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坚定地坚持这些立场。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也知道，人们有时偏离这些立场。

从苏维埃政权初期开始，列宁和党就认为建立和加强法制具有首要意义。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刚刚诞生的新社会的政治现实所要求的：巩固新政权，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土地国有化，劳动者监督生产，在反革命势力的攻击面前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这一切都需要有法律依据和形式。否则革命进程就有发生混乱的危险。否则就不可能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确保苏维埃政权正常发挥职能，确立新的社会生活秩序。

一系列法令解决了这些任务。这些法令从一开始就宣布法制是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之一，提出了使千百万劳动者参与国家管理和教他们象列宁说的那样去“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任务。这一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于1918年通过的第一部苏联宪法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该宪法基础上通过的《关于认真守法的决定》之中。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立法工作变得更加紧张了。其意义是保障社会主义改造具有法律形式和依据。立法和

执法护法机关的工作成了国家建设和整顿经济、社会、文化及其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同时遵循了列宁关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法制和必须“不允许丝毫违背我们的法律……”^①的要求。

此外，不能不谈谈我们称之为个人崇拜时期的这样一个时期。它对法律、法律的目的性，尤其是对法律的遵守产生了影响。由于高度集中，自上而下地指挥，主要采用行政命令和禁令等做法，法律的作用被贬低了。在人所共知的这个阶段，这导致了专横和放纵违法行为，而这与社会主义原则和1936年的宪法准则毫无共同之处。国家领导人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对此负有责任。以某种政治上的必要性、国际局势高度紧张或所谓国内阶级斗争激化来掩饰这种违法行为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践踏法律导致了我国至今既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的悲剧。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此作出了最严厉的评价。

这已反映在立法中。恢复了法律的民主原则，加强了法制，进行了众所周知的编纂法典的工作。

对法律草案和其他最重要的问题开始进行全民讨论。在过去的25年中，千百万人参加了对大约30个重大的联盟法律草案的讨论，就这些草案发表了自己的见

^① 列宁：《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载《列宁文稿》中文版第4卷第224页。

解，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然而，停滞时期也与执法纪律的松弛有关。专横和不守法纪的分子再度出现，领导人当中也有。负有维护社会秩序和同舞弊行为作斗争责任的法院、检察院及其他机关，时常受到各种情况的影响，处于依附地位，在同违法行为的斗争中放弃原则立场。护法机关内部营私舞弊的事情增多了。

现在，当我们开始改革的时候，当我们想坚决摆脱过去的不良现象和给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以新的推动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立法领域和完善整个社会主义法制方面也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经济和社会发展管理机制中的彻底变化也要求这样做。这是社会生活各方面民主化的一个有机部分。我们在立法和权利方面采取的措施正在成为改革进程的支柱。我们是密切结合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改革进行这项工作的，并且考虑到劳动人民的愿望和研究民意的结果。

改革需要社会有更高程度的组织性，需要公民有自觉的纪律。我要这样讲：改革进行得越深入，就越应当日益严格地和始终不渝地实行社会主义原则，遵守宪法和我们的法律中明文规定的社会主义日常生活准则。

改革也给法律的内容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律应当坚决维护社会利益，禁止会损害全民利益的行为。这是明显的道理。但是，在规定这些严格的限度时，法

律还应为公民、劳动者的集体和团体发挥主动精神提供必要的自由。应当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由于试图把企业的所有权利都列入各种守则中，我们已失掉了过多的东西。这在实践中造成的结果是，任何超越这些守则限度的创举都被看作是不可接受的。经验表明，我们需要的不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现象的总的法律规章，而是善于在这方面掌握合情合理的分寸，经常关心如何更好地发挥和保持工作人员、劳动集体的积极性以及人民各种形式的主动精神。我们将严格遵守一个原则：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允许做。

在改革中已经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令。其中包括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改变农工综合体管理体制法，教育改革法，个体劳动法，反对非劳动收入法，反酗酒和吸毒法。颁布了规定改善居民保健和自然环境保护以及加强对母亲和婴儿的关心的一些法律。

我们认为，加强保障苏联人的权利和自由具有特殊意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些法令规定了压制批评应负的刑事责任，还规定了国家机关、社会机关和公职人员的非法行为给公民造成损害时的赔偿制度。通过对损害公民权利的公职人员不合法行为向法院控告程序法。

就国家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全民讨论的做法，目前

已在苏联最高苏维埃1987年6月通过的一项法律中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

同时我们很清楚，改革将继续要求在立法和法制领域内不断采取步骤。普通编纂法典的工作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些法律应当符合当前的这样一些任务，如提高经济效益，执行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揭示各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潜力。总之，应当保障人民自治的广阔天地。

将要对选举法作出重大修改。1987年6月在选举运动中为此进行的试验，使我们更准确地确定了解决这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的方法。目前正在制定有关改革国民经济领导体制和提高地方权力机关及管理机关的作用的法规。如果考虑到我们的经济领域中现在有大约3万个全苏规范性文件，那么这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工作。许多规范性文件需要作重大修改，甚至有许多要干脆撤销。在国营企业法通过以后，已经有数千个规范性文件被撤销。

工会和共青团在不久前召开代表大会，会后提出了起草青年法和工会法草案的建议。劳动法正在起草中，有关合作社、扩大由劳动集体大会解决的问题范围、职工和集体农庄庄员退休金数额、产品质量标准等法律草案也在起草。

在修改刑事立法方面，我们还要付出不少劳动。刑

事立法也应当与苏联社会目前的成熟程度紧密相联。完善我们立法和法律工作这个重要部分的工作，将在与改革和民主化相联系的重大变革的背景下进行。

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提高法院这个由选举产生的、最接近居民的机构的作用，保障审判员的独立性，最严格地遵守诉讼程序的民主原则、客观性、辩论制和公开性。最近采取的一些措施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这些措施包括：加强检察机关对守法情况和一视同仁地执法工作的监督，扩大审理经济纠纷的国家仲裁的职能，搞好国民经济中的法律服务，对居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律教育。

总之，我们面临着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基础的大量工作。权利、法律、法制，这不仅仅是深化我们的民主和加快社会进步的产物。这是改革的可靠工具和改革不可逆转的可靠保障。

改革与苏维埃

当前在改革阶段，在全面发扬民主的条件下，党的政治领导与国家机关、工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的作用相结合的问题再次提了出来。

就以我们的苏维埃为例。改革十分严肃地要求弄清楚和确定苏维埃在已经开始的改造中的地位。如果不使苏维埃参与这个进程，如果不使它们本身的地位和工作

实现创新的变革，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社会民主化。

俄罗斯的苏维埃是世界政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它们是劳动人民进行直接创造活动的成果。大概西方很少有人知道，苏维埃这个设想本身和组建苏维埃的最初经验在十月革命以前好久，早在1905年就出现了。在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以后，苏维埃开始成为全俄罗斯范围内的权力机关，尽管两个政权并存——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并存的局面限制了这个政权并使它“减少了一半”。可是，苏维埃自然而然地成了1917年10月诞生的新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我们的国家本身获得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名称。

如果没有苏维埃，我们在国内战争中就不可能取胜。如果没有苏维埃，我们就不可能团结起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千百万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如果没有苏维埃，新经济政策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苏维埃的力量在于，它们是群众自己建立的，它们是劳动人民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维护者。苏维埃在全国迅速的，甚至可以说是自发的扩展的特点和秘密就在于，它们自己作出决定和自己执行决定，而且是在全民面前和在这些决定涉及到的那些人的公开监督下这样做的。这是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的独一无二的和最有效的形式。

然而，随着行政命令式管理体制的出现，苏维埃好

象被排挤开了。不少问题都是在没有它们参与的情况下加以解决的，要不然就干脆被搁置起来，从而发展成大问题。这影响了苏维埃的威信。从这时起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就出现了停滞现象，出现了劳动人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宪法权利受到剥夺的迹象。政权不仅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而且是由劳动者自己执掌的——这条社会主义革命原则遭到严重损害。

不必隐瞒，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经济工作领导人也开始以缺少应有的尊重态度来对待苏维埃的合法要求与建议。地方苏维埃应当在其管辖范围内，在关系到该地区的发展和满足居民日常需要的一切方面成为绝对的和负责任的主人，对于这一点，好象所有人都很明白，也没有人正式否认过。但是，与经济机关的条件相比，苏维埃的实际条件不允许它们发挥这些职能。许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的厂长和管理人员根本不愿理睬苏维埃坚持不懈的正确要求，如建设住房、社会和文化设施、净化设施，发展公共交通，完善本地区公用设施等。

不能说这一切没有使劳动者和党的机关感到不安。曾尝试过扭转这种状况和改变这种局面，但这项工作做得软弱无力，不坚决。这与其说是由于客观情况，不如说是由于主观情况造成的。最近15年作出了关于改善苏维埃工作的14个决定。这些决定是不错的，但事情毫无进展，因为障碍机制的全部情况——经济、政治和思想

情况都一起在抵制加强苏维埃这个实质上 是广泛民主和公开的机构的作用。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 由于行政压制式的领导与管理方法盛行， 官僚主义的态度在社会工作和国家工作的许多领域中占了上风， 我们远未运用苏维埃的潜力来造福于人民。 在苏维埃的作用削弱的情況下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们称之为以党的机关来代替国家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能与工作的现象。

以党的机关来代替苏维埃的做法也影响到了党的工作， 特别是政治工作本身。 党的工作者的精力开始用于经济事务和行政工作。 于是干部也相应地从受过职业训练的人中挑选， 但是这些人当群众真正的领导者， 就往往是不内行和不高明的。 总之， 在民主机体的全部职能中出现了一种偏差， 而民主机体的诞生应归功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 在改革过程中， 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 政治权力机关和强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因素的体现者的作用。 现在我们正充分恢复苏维埃的威信和权限， 为苏维埃在改革条件下进行 名副其实的、 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条件。

一月全会号召各级党委严格遵循提高苏维埃的 作用的方针， 不再干涉苏维埃的事情， 更不要代替苏维埃权力机关。 同样重要的是， 苏维埃领导人自己和苏维埃机

关也要全力以赴地工作起来，克服惰性，去掉总是看某人脸色行事和总是等待指示的习惯。有关苏维埃作用的新的法律文件，在改革阶段将鼓励加强苏维埃工作中和苏维埃执行机构中的民主原则。对苏维埃来说，主要的应当是同人民的联系。新的决定将使苏维埃安排好自己的工作，使自己表现为真正的人民权力机关。苏维埃拥有协调和监督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企业和团体的活动的广泛权利。

但这仅仅是恢复苏维埃的革命和民主本质的最初步骤。在即将举行的全苏党代表会议上，将研究完善选举制度问题和各级苏维埃的工作问题。已经在起草一些建议。现在评价这些建议还为时尚早，但是可以指出它们的主要特点：它们的目的在于深化苏维埃民主。

工会的新作用

国家目前所处的条件和正在解决的任务，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工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在这里首先应当说：我们的工会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有关劳动的法律都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参与下制定的。在有关劳动法、遵守该法和维护劳动者权利等问题上，工会有最后决定权。如果某位行政领导人未征求工会意见就解雇工作人员，法院会自动取消该决定，甚至不必去弄清决定内容，而这仅仅是因为

工会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任何一项计划，不管是年度计划还是五年计划，在工会未同意之前都不能提交最高苏维埃。甚至在计划的起草阶段，各级工会就参加进来了。

社会保险、劳动者的疗养保障、旅游、体育、运动、儿童的休息及他们的保健，这一切都掌握在工会手中。由此可见，它们手中握有实权。但是，可惜最近几年工会的积极性下降了。由于一系列原因，工会把自己的特权让给了行政部门，而有些权利又运用得不够有效。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开始改革以后看到，我们不能对工会的工作感到满意。在视察库班地区时，我曾指责一些工会领导人，批评他们常常迎合行政机关，往往简直象陪着波兰少妇同她跳舞一样。不是到了他们最终要站在自己的原则立场上坚定地奉行保护劳动者方针的时候了吗？

工会在改革条件下的新的作用，首先在于工会应当加强其经济决定的社会目的性，同最近几年经济中盛行的技术至上心理相抗衡。这就意味着工会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社会部分，必要时还要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可取的建议。

工会委员会应该成为行政机关真正的，而不是便于使用的伙伴。工会组织似乎常常习惯于容忍某些企业的

劳动条件恶劣、医疗服务不佳、更衣休息室糟糕的情况。要知道，苏联工会既拥有监督行政机关遵守劳动协议的权利，也拥有批评行政机关的行为的权利，甚至还拥有要求撤换厂长的权利，如果厂长侵犯了劳动者合法利益的话。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似乎劳动者不需要保护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还需要更多的保护，因为社会主义是劳动者的制度。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会责任重大。整个苏联社会极其关心工会更加积极的工作。

青年与改革

我国青年中间蕴藏着改革的巨大潜力。因为正是青年将在革新的社会里生活和工作。青年的劳动、学习和休息的组织工作，自然具有头等重要意义。青年刚刚走向生活，正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要组织家庭、获取专业技能、形成政治面貌、站稳公民立场。要形成个性。因此要全力以赴地关心青年，关心共青团。

我们已经商定这样做这件事：解决青年人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应听取共青团的意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似乎在迎合，在开始央求共青团。不是的！我们必须坚决提高共青团的责任。除了信任、让青年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以外，任何东西也不会对形成正在

成长的一代人的面貌，对这一代人肩负国家现在与未来的责任的能力产生这样有效的影响。拍拍青年的肩膀，傲慢地对待青年或是向青年献媚，所有这一切都一文不值。不，需要的是使共青团和青年有机会自己真正地大显身手。必须使青年摆脱琐碎监督，培养青年的责任感和对实际工作的信心。

中央一月全会呼吁党的各级领导人更加重视青年的劳动、思想和品德锻炼。在做青年的工作时，教训人的腔调和命令主义是不能容忍的。不管对这些做法作何种解释——是不相信年轻人的志向和行为的成熟性，还是简单地为青年打保险、想使自己的下代人走轻松愉快的生活道路，这种态度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今天，在青年的生活和工作中有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必须掌握民主政治与自治的全部手段，使自己的青春活力投入生活各个方面的民主化进程，积极参加社会创造活动。不这样，就不会有加速发展，甚至不会有进步。当前的任务就在于使每个青年都体验到自己是国家一切事务的参加者。第二，年青一代应当准备参加我国经济极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作，首先是通过电子计算机化、开发新技术和新材料来实现。更新和丰富社会的智能，这就是我们期待青年要做的事情。

青年的一大堆社会问题是复杂的。许多领导人往往呼吁青年提供帮助，例如帮助新建项目，可是在解决社

会问题时却忘记了他们。我们反对这种态度。我们支持制定青年法的主张。在这项法律中不必重复适合于全体苏联公民的一切条文，可以专门阐述男女青年的特殊问题以及他们的权利与义务。青年法有助于使共青团与国家机关、工会、其他团体在青年人的学习、劳动、生活和休息问题上的协作具体化。这项法律将提高各部和主管部门处理涉及青年问题的责任心。

1987年举行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大会表明共青团认识到它对人民和国家所负的责任，表明青年热切希望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革新的进程。就连代表大会本身的严格要求的气氛也令人欣慰。大概，我从来也没有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那样热切地希望参加辩论。我同充满活力的、富于同感的听众进行了一次气氛最活跃的接触。

一切迹象使人感到，我国青年全心全意接受国内已经开始的革命性变革，愿意将自己的青春活力、自己的全部激情注入这种变革中去。

关于妇女和家庭

今天，国家需要妇女更加积极地参加经济文化管理，参与社会生活。目前全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妇女委员会就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一月全会也提出了更广泛地提拔妇女担负领导工作

的问题，尤其是有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在卫生、教育、文化和科学部门工作。许多妇女在轻工业、商业、生活服务部门工作。

众所周知，根据妇女解放的程度可以判断一个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水平。

苏维埃国家坚决地和无情地结束了作为沙皇俄国一个特点的歧视妇女的一切现象，使妇女在社会上与男子完全平等，并且由法律加以保证。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苏维埃政权给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同工同酬权利及受到同样社会保护的权力。妇女获得了受教育、职务晋升、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一切机会。没有妇女作出的积极贡献和自我献身精神，我们就不会建成新社会，也不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坚持下来。

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好象忽略了涉及妇女作为母亲、家庭主妇的作用和涉及她们在教育子女方面不可代替的职能的特殊权利和需求。在工地上和生产单位，在服务行业、科研工作中任职和一心一意从事创作的妇女根本无暇过问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家务，教育子女，给家庭创造舒适的环境。看来，许多不幸——无论是子女和青年的举止，还是社会道德和文化问题以及生产问题，都与家庭关系削弱、家庭义务淡薄有关。

请看这多不近情理啊，尽管我们曾经真诚地和政治上完全有根据地力图在各方面都使妇女同男子处于平等

地位。但是，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已开始纠正这种疏忽了，虽然它似乎继承了社会的美德。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报刊、社会团体以及各种场所——工作单位和家里——尖锐而又热烈地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完全让妇女恢复她们的真正女人的使命。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妇女从事不利于她们身体健康的繁重工作。这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大批男人丧生、各个地方和一切生产领域严重缺乏人手造成的。我们已开始认真地处理这个问题。

健全家庭，提高家庭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包括在同酗酒的斗争中的作用，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最迫切的社会任务。我们迫切期待各级妇女委员会发挥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妇女委员会正在开展工作。它们可以做不少事情。因为任何其他组织都不可能这样接近个人的生活，这样接近女人所关心的事情。

如果不提高妇女的作用，没有妇女们有力地 and 独特地干预和参加我们的各项改造工作，那么，作为改革的核心和保障的社会民主化就是不可思议的。我相信，妇女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将不断增强。

社会主义各民族的联盟——独一无二的构成体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这一点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有力量、不软弱、不解体的因素。过去称

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革命、社会主义结束了民族压迫、不平等，保证了各大小民族经济和精神上的进步。先前落后的、受践踏的各个民族有了发达的工业、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以及先进的文化水平，尽管有些民族从前连文字都没有。每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我们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改造工作。这项改造工作的结果丰富了苏联社会，也丰富了世界文明。

居住在我国的一切大小民族都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共同捍卫了社会主义祖国的自由、独立和革命成果，使之免受敌人的侵犯。如果我国没有基本解决民族问题，就不会有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上象现在这样的一个苏联了。如果各共和国的发展水平不是大致持平，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与合作、尊重和互助基础上产生的大家庭，我们的国家就难以立足。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民族事务没有问题。任何发展都有矛盾，因此这方面也产生了矛盾。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基本上是确认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取得确实重大的成就，用洋洋得意的语气评价局势。可是要知道，这是形式多样、复杂纷繁的现实生活。

这里的辩证法是：随着教育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现代化，每个民族都产生了本民族的知识分子，民族自觉性日益提高，对本民族历史渊源的自然兴趣也在

增强。这非常好。这曾是那些为我国革命作好准备并在沙皇帝国的废墟上开始建设新社会的各民族革命家梦寐以求的事情。与此同时，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人堕入民族主义迷途，表现出民族局限性、民族攀比和傲慢态度。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此，而且也在于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首先在于一代人在被另一代人所取代并且每一代人都应经受多民族国家生活的考验。经受考验并不总是轻松和简单的。使每个民族发挥了全部才智的社会主义，拥有一切条件，本着各民族平等与合作的精神解决民族问题。重要的是要按社会主义的原则精神办事，同时要记住：已经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往往连他们的民族是如何取得这种腾飞的情况也不知道。谁也没有向他们认真地解释清楚，对他们已经进行了多少年的国际主义教育，是如何进行这种教育的。

就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未能摆脱民族之间的敌视，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范例。这就是列宁制定的那种民族政策的结果。要知道，在开始建设多民族国家时，最初迈出的几步是艰难的，而且是十分艰难的。俄罗斯民族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在列宁的民族政策范围内，在短暂的历史时期中，全国许多民族经历了一条独特的复兴与启蒙的道路。一旦有人对此报以民族傲慢和故步自

封，并试图把“自己的东西”当成绝对的珍品，这就不公正了，这种看法是不能同意的。这永远会成为苏联社会热烈而详细讨论的问题。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能失去的宝贵财富。但是，对每种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一切宝贵财富的健康兴趣，不应变为脱离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与接近的客观过程的尝试。

另一种危险是一个民族的代表人物有时悄悄地产生了不尊重任何其他民族的情绪。我曾多年生活在北高加索，那是个真正多姿多彩的民族地区。那里的每个城市、乡镇、山村都居住着不同民族的人民，整个地区也是如此。高加索的历史经受了重重苦难，可是在苏维埃政权年代，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决不是把情况理想化了，但是，尊重的态度、合作、接近和团结终究是居住在这个多民族地区的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主要特点。我根据切身经验知道：山里人非常珍重友谊，同时对稍许流露出来的对他们的傲慢态度也是十分敏感的。我记得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境内的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居住着卡拉恰耶夫族人、切尔克斯族人、俄罗斯族人、阿巴津族人、诺盖族人、奥塞梯族人、希腊族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他们友好相处。平等和公正处理一切问题是他们友好相处的基础。如果某个时候发生了背离这些原则的事情，那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在这个不大

的自治州里，各民族的文化都得到保留和发展，他们爱护自己的民族传统，用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的文字出版书籍。这并没有使各民族疏远，相反却促进各民族的接近。只宣布各民族平等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一切民族的生活充满生机。

我要再说一次：如果在人类关系的这一十分敏感领域里出现不良现象的话，那么这些不良现象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由于官僚主义和忽视合法权利造成的。有时我们对发展各民族语言问题辩论得很热烈。在这里能说些什么呢？就连最小的民族也不能没有语言。要知道，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一代的人类文化是各不相同的，语言、服饰、礼仪、性格都不同。这是我们共同的财富。难道能对我们共同的财富采取不关心的态度并损害它吗？

但是，与此同时，生活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国里没有交往的工具是不行的。俄语自然就成了这种交往工具。各民族都需要这种语言，甚至连历史本身也确定交往的客观过程是在最大民族的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许多民族的人民来到美国，英语就成了共同的语言。显然，这是自然而然作出的选择。可以设想，如果迁居美国的每个民族的人民都说本民族的语言，不想懂英语，那会是什么情景呀！我国也是如此。何况俄罗斯民族已经用他们的全部历史证明，它具有国际主义、

对一切民族抱有尊重和善意的巨大力量。现实生活证明，必须学习两种语言（除了外国语外）：本民族语言和用来交往的俄语。

任何煽动民族狂热的企图都只能使寻找明智解决办法的工作复杂化。我们并不想回避这个问题和其他正在发生的问题，我们将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巩固我们各民族的族际主义大家庭。

列宁教导我们在民族问题上要极其谨慎和温和。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也不应有呆板公式。有一点是清楚的：当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吻合的时候，当一切平等的原则成为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基础——苏联社会的情况恰恰就是这样——的时候，即使在困难情况下也能解决所产生的任何问题，消除任何误解。当然，西方和东方都有不少人想破坏和削弱苏联各民族的友谊与团结。但这已经是另一种现象了。这里有苏联法律来保护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成果。

基于这种立场，我们将是坚定的和有原则的。应当尊重人们的民族感情，决不能忽视这种感情。但是，在民族感情上进行投机则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我们党的传统是：同民族局限性和沙文主义、地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人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原则性斗争，而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忠于这种传统。我们的全部经验证明：只有彻底的国际主义

和国际主义教育，才能成功地抵制民族主义歪风。

在我视察苏联一些共和国和民族地区时，在当地与人们会见时，每次都使我更加深信，他们珍视的并引为自豪的是：他们的民族属于一个族际主义大家庭，他们是这个在人类进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幅员辽阔而又伟大的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苏维埃爱国主义。我们今后将继续加强自由国家中各自由民族的联盟和兄弟情谊。

威望与信任

改革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在横的方面都涉及社会的一切阶层。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改革的发展需要一边解决问题一边克服困难。苏共是为加强社会主义的利益、为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我还要说是改革的保证人。我们党担负着真正历史性的责任。弗·伊·列宁在1917年就曾经说过：既然开始了革命，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对待改革也是这样，党定将把改革进行到底。党的威望不断提高，对党的信任日益增强。尽管我们仍然处在从一种质量状态向另一种质量状态过渡的阶段，但是党的机关正在尽可能不承担经济主管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职能，尽管这样做并不简单。因为人们认为，好象经受过考验的道路就是从党的方面来催促人们走的，这样就可保证完成

计划似的。但是，党的任务在另一方面，首先是从理论上思考情况，及时找到矛盾发展的关键，修正战略和策略，制定政策和确定实行这个政策的方式和方法，挑选和配备干部，从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保证改革。除了苏共以外，所有这些事情是谁也做不到的。

管理工作，经营工作应当由国家机关和其他主管此类事务的单位去做。这种态度是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的决不是什么人杜撰出来的。党应当管党的工作。所有其他机构也应当管自己的工作。哪里不这样做，哪里党的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和干部工作就会削弱。

我国社会从历史上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党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反映在国家生活中。我国没有正式的对派。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就负有更大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工作中的集体领导原则，扩大党内的公开性，是自己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中央委员会要求那些被选到领导岗位上的人要谦虚、正派、诚实，不容忍奉承、拍马。党内不能有不受批评的人，同样也不能有没有批评权利的人。

对于我们来说，很清楚的是必须从思维与心理、工作组织、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开始改革，从人们，首先是从领导干部开始。

我们坚定地采取了支持富有首创精神、善于思考、精力旺盛的人的方针。因为这样的人能够用自我批评的

精神估计工作情况，摆脱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老一套做法，寻求新的、不寻常的解决办法，能够并且愿意大胆前进，善于取得成就。改革为这样的人开辟了创造性活动的广阔天地。

但是，当然不必完全换掉所有的干部。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既可以在中上层重新安排，也可以在各经济单位重新安排，需要增加新生力量。其实，现在已经在这样做了。此外，也出现了一个自然而然的情况：有人已经到了该总结自己劳动活动的时候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有人简直已经无力承担新任务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必渲染这种情况。

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要求，有它自己的先进人物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谁能自我改造并在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中走出新路子，谁就应该去工作，谁就会受到劳动人民和党组织的支持。我们干部的大多数都准备这样做。哪怕准备的情况各异：一些人较快地领会了新要求，另一些人也许要再考虑考虑。我们原则上认为，我们干部的基本部分都有能力解决改革的任务。然而，我们也不能安于一切照旧，不加速，不更快地前进。

改革要求有一批懂行的、技能高超的工作人员。今天，不及时地做好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不具备生产、科学与技术、管理、经济、组织工作和劳动刺激、社会

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渊博知识，那是不行的。总之，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智能，大大提高智能的创造效益。

我想再次强调党的理论工作的意义。在这方面也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但是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在竭力加强民主原则，不允许一个人或一批人搞垄断。苏共中央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党和社会的一切创作力量都要投入这项工作。如果认为一切都要来自中央，或者更糟，都要来自一个人或是一批人，那么说不定我们会滑向思想僵化。这将对改革的致命打击，甚至是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致命打击。苏共历史上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而且是惨痛的和令人难过的教训。不能使社会科学界和创作力量在党内只起对某些决议或地位很高的同志的讲话发表评论的作用。我们选择了另一种态度：将本着列宁主义精神，列宁主义传统办事。

四、西方和改革

我们一直关心国外，特别是西方怎样看待我们的改革。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出于政治家的责任。我们看到，改革进程不仅因为它本身，也不仅因为事关一个伟大国家人民的命运问题而引起日益强烈的兴趣。我们的改革被公正地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后果的事件。西

德一家报纸写道：“苏联发生的事情关系到全世界。”

首先应当指出，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对我们的改革怀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充满乐观主义态度，真诚希望苏联人民开始的改革取得成功。全世界对我们的改革期望甚多，期望它能对全世界的发展以及整个国际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至于谈到官方人士和大部分西方舆论界，起初他们很少有谁相信1985年4月我们宣布的改革的现实性。还有许多挖苦嘲讽的议论：瞧，一个班子取代了另一个班子，就匆匆忙忙提出一些新构想和纲领。又说什么俄国人是容易激动的，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新领导人把一切失误都记在老领导人的账上，但是，一切依然如故。过一段时间，批评也沉寂下去了，新的提法也忘了。

但是，这种立场是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的。已经十分清楚，改革是一个历史现实，这个进程正在展开。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再也不可能回避我国确实进入了大胆的、影响深远的改造时期这个事实了。

在对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各种评论中，新的提法就更清晰了。人们开始承认，在经营管理领域提出的改革的规模和彻底性超过了大多数苏联问题研究专家的预料。我们发现，西方许多人没想到我们会这样坦率地和深入地进行讨论，会采取这样大规模的建设性措

施。六月份以前一直加封给我们的“半途而废”的绰号，对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六月决议来说，已经不合适了。我们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解释者对我们的可能性和意图所划的小框框。要知道，在全会前夕许多人还断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运动”正在失去势头。

现在，开始谈论“第二次革命”和改革的不可逆转性了，开始谈论在新建立的经济和法律基础上，改革将发生“新的飞跃”。总的来说，人们正确地体会到，六月全会在改革道路上具有阶段性质。对待改革的态度问题变得更为迫切了。各方面都在改革的速度上批评我们。“左”的方面批评我们走得慢，“右”的方面批评我们步伐太快。但是，看来有一点大家的意见是相同的，这就是苏联领导人认真地搞改革了。

西方观察家非常关心，假如改革不停下来，它对苏联和对全世界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们问道：是改革成功，还是改革失败对西方更有利？

不言而喻，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很多的。许多严肃的专家承认，大大加快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可能的。他们强调指出，改革成功在国际上将会产生积极后果。这些严肃的专家清醒地认为，由于苏联人物质福利的提高和进一步发扬民主，国际社会只能得到好处。苏维埃国家实行的社会经济计划的规模本身，就是它爱好

和平的对外政策方针的证明和某种物质保证。据此，向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了实际建议：不要害怕改革，不要把改革当做心理战的目标，而要通过经济联系、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机制促进改革，要认真接受苏联就裁军和国际局势健康化问题提出的建议，要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

抛开许多我们认为有争论的估价和预测不谈，整个来说，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现实主义的，我们欢迎它的总的建设性方向。这个方向符合国际关系健康化任务，反映了广大公众的情绪。

一些政治活动家认为，如果不对莫斯科发出的积极信号作出反应，不清除对苏联的错误看法和自己编造的骗局，西方就会犯历史性错误，这些政治活动家显示了自己的远见。

但是，西方舆论工具和所进行的政治讨论中还十分卖力地宣传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它们不遗余力地诋毁我们的政策和意图。对我们的内外政策的动向充满悲观的预言和恐惧。这再次表明，“冷战”的惯性有多么大，代表某些集团自私利益的反苏主义的根源有多么深。如果这是理论上的辩论和宣传上的做法，大可不予理睬。现实生活本身终究会表明真理何在。但是，问题在于，由此产生了这种做法：用改革来进行恫吓，说什么改革会加强苏联的军事经济实力，就是说，会使“苏

联的威胁”加剧。既然是这样，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就应把赌注押在改革失败上，以改革受阻和半途而废为基点，遵循根深蒂固的反苏主义者的准则：“苏联越坏，对西方越好。”

极右集团毫不掩饰对改革的敌意。改革将打破极右集团的如下算盘：社会主义拿不出什么吸引人的东西同“自由世界”抗衡。对这些人来说，放弃关于苏联社会“僵化”这种已经发霉的教条的看法，就等于意识形态的崩溃。这样，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整个反苏主义的理论 and 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方针。这样，关于“苏联威胁”的臆造就会烟消云散。而这种威胁似乎是由于苏联无力解决国内困难而去搞扩张造成的。

甚至还有人企图诋毁公开性和民主化。举例来说，报道来自苏联的一些假消息，而且还是援引苏联报刊的。随后发现，苏联的出版物中根本没有这类东西。想挑拨我们限制和刹住公开性，从民主化倒退，激起对舆论工具的不满。其目的就是要破坏改革进程，而没有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进程就是不可思议的。

有人十分卖力地企图在我国公民当中散布对改革的政治方针的正确性的怀疑，用困难吓唬人，激发不切实际的愿望。他们企图激起人民对领导人的不信任，挑拨个别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分裂党，分裂社会。

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舆论工具，特别是美国的一些政

治活动家和舆论工具企图把我国的改革说成是在西方的压力下所采取的“自由化”。当然，不能不给西方宣传家们以应有的回击，这些人非常善于玩弄民主的文字游戏。但是，只有当西方的工人和雇员能在全体会议上自由地选举工厂主、银行经理等，只有当舆论工具能经常批评公司、银行及其老板，能介绍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况，而不是仅仅同政治活动家进行无休止的和毫无益处的争论时，我们才相信西方社会的民主。

另一些批评我们改革的人，则强调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把通货膨胀、失业、价格上涨、社会分化加剧，也就是把西方的“特产”强加给我们。或者说什么中央委员会身旁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党和国家机关。或者编造说：你们那里军队也反对改革，克格勃还没有表态。各种手段都动用了。

但是，我们的反对者会伤心的，因为在今天，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什么东西也动摇不了这种团结。在军队内部，在克格勃内部以及其他任何一个主管部门里，党是最高权威，政治上的决定权是属于党的。改革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地位，使党在社会和国家中的精神和政治作用具有新的质量。

同时，为了公正起见，我要指出，西方一些严肃的观察家看到了我们变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看到了改革的

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那些拿改革吓唬西方公众的人，确实害怕改革成功。这一切都因为，改革打破了利用“苏联威胁”吓唬人的可能性，打破了用漫画式的、令人厌恶的“敌人形象”来歪曲我国真实面貌的可能性，打破了在这类煽动性的口号下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和靠它发财的可能性。

实际上，假如我们的发展计划将顺利完成，那时还怎样再用社会主义是一种毫无生命力的制度，不能使人们丰衣足食的陈词滥调去愚弄人们呢？把我们国家描绘成“万恶帝国”，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历史性错误，把我们十月革命后的道路说成是“历史的弯路”的一整套谎言势必崩溃。这样的改革确实使某些人不高兴。

西德《明星》画刊写道：“现在有人狂妄地企图诽谤和诋毁苏联的改革，可是又断言，在现实中改革只能加强共产主义，克里姆林宫希望一点：使体制更有效益。但是，我的上帝，如果同贪污和经营不善作斗争，如果言论非常自由能加强共产主义，那么，根据这个逻辑，民主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营养基了！”我要对这段雄辩的话补充一句。假如社会主义事实上象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所断言的那样同民主和经济效益根本不相容，那么，他们就不必为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利润担心了。

如果说我们对自己所作的批评的激烈程度，是西方、东方、任何方面的任何人对我们的批评所从来没有

过的，那是因为我们强大，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毫不担忧。我们能经受住这种批评，人民能经受住，党能经受住。当我们的改革取得预期成果时，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也得“重新改造”了。

我们把他们置于困难境地，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缺点了解得比谁都清楚，写的和说的比谁都坦率，比谁都更了解情况。西方的人们逐渐不再相信西方继续大量散布的关于苏联的种种无稽之谈。不言而喻，这一切无助于形成对西方国家政策的信任。

在同美国人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人士谈话时，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们所关心的，是不是苏联可能靠降低自己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重而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是相反，西方企图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破坏我们国内已经开始的巨大工作，迫使苏联领导人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非生产性开支，用于军备目的？是不是企图使苏联忙于解决国内问题，而由他们自己主宰世界？

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些打算拖垮苏联的人过于自信地估计自己经济的健康状况了。不管美国如何富有，每年把3300多亿美元用于军费开支，它也负担不起。随着军费开支曲线上升，预算赤字曲线也在上升。考虑到预算赤字的数额，美国的军费开支现在就有2/3是靠借款维持的。美国的国债就其实质来说，是五角大

楼的债务，这些债务要靠几代美国人来偿还。这条绳索不可能无止境地缠绕下去。不过，这是美国人自己的事。

我有时甚至有这样一种印象：一些美国政治家不断吹嘘资本主义制度，大肆宣扬自己的民主，同时又不很相信这些，害怕在和平条件下同苏联竞赛。因此，他们开动战争机器，加剧紧张局势等等。我觉得，观察家们在读完这几行之后会写道，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民主知之甚少。可是，多少还知道一些，至少是毫不动摇地坚信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我们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自己非常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还需要考虑到我国人民的性格。既然他们如人们所说“触到痛处”，既然他们抒发爱国主义感情，他们就不会吝惜力量，而且必能达到自己的目标，简直能够创造奇迹。苏联是一个幅员辽阔、物产十分丰富、干部素质很高、科学非常发达的国家。大多数工人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因此，不必急于把我们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在苏联只能引为笑谈。

1987年4月，我同美国众议院代表团谈话时讲过，实现我们的革新计划对美国人民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构不成任何威胁，既构不成政治威胁，也构不成经济威胁或其他什么威胁。在克里姆林宫向“争取无核世界、

争取人类生存”会议参加者发表讲话时，我还讲过一次同样的话：我们希望被人理解，希望国际社会承认：我们想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好，这对谁也没有坏处，全世界从中只能得到好处。

可见，不管是苏联，还是改革，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威胁，而只能成为某些人可以接受的榜样。但是，有人一再硬说我们要把共产主义强加于全世界。多么离奇的荒唐话！算啦，如果靠这一手混饭吃，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吧。但是，迄今为止，公开说这类话的，却是负责的国务活动家。在我们的改革开始两年后，我就从我所尊敬的一位政治家口中听到了这类说法，这使我十分惊讶。我反驳说：根据何在？大家都知道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里根主义。现在和过去我们都未曾讲过要“建立共产主义统治”。列宁说过：我们，亦即社会主义国家将通过自己经济活动的成就对世界发展产生自己的主要影响。

改革的成功将表明，社会主义不仅能解决攀登科学技术进步高峰的历史任务，而且能用民主的方法，为了人和依靠人本身的努力，依靠人的智慧、技能、才能、良心和对其他人的责任感，以最高的社会和道德效益解决这项历史任务。

改革的成功将揭穿目前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势力的阶级局限性和利己主义，这些势力大搞军国主义、

军备竞赛和在全世界寻找“敌人”。

改革的成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确定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而无须向新殖民主义让步，不致落入资本主义罗网。

哪种制度更符合人们的利益，在这场历史性争论中改革的成功将提供决定性论据。清除了在非常条件下生产的积垢之后，苏联的形象将具有新的吸引力，将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将获得新的动力。

我一向相信，我的来自西方的交谈者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倘若你们能做到你们想做的事情，这将产生巨大的、真正全世界意义的后果”，这番话是西方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说的，他根本不是共产党人。

可能，国外读者不大容易理解我们的许多问题。这是很自然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法律和制度，自己的希望、困惑及自己的理想。这种多样性好极了，要发展这种多样性，而不要企图把大家一刀切。举例来说，一些政治家的企图使我非常厌恶，他们教训别人怎样生活，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而且高傲地断言，他们国家的生活和政策是自由、民主、经济活动和社会状况等等的典范和样板。我想，允许其他国家的人民不同意这一套，那要民主得多。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不平静的世界里，不能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一

切。今天，不仅军事强制，而且精神政治和经济压力都不时兴了。这是危险的，这会激怒世界公众，就是说，会有碍于朝着和平与合作前进。

正确地认识改革，是理解苏联对外政策方针的钥匙。改革的实情符合普遍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利益。我们呼吁西方负责地、诚实地、不怀偏见地分析我们的工作，我们这种呼吁的出发点不仅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不善于或不愿意理解改革的实质，是国外对我们的意图迷惑不解的原因，或是再次企图保持和加深各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

每个国家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的有机联系，在转折时期变得特别密切和具有实际意义。国内方针的变化必然要对对外政策问题采取新态度。因此，目前在改革的条件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而具体地显示出，我们在国内的活动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目的是一致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构想及其纲领性方针和实际步骤，都是改革的哲理、纲领和实践的真实而直接的表现。

我国的改革进程为国际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一些客观的观察家预料，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增长，对外经济联系和科学技术联系，包括国际经济组织系统的联系将活跃起来。

我们诚恳地大声宣布：我们需要持久和平，以便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社会，解决改善苏联人生活的任务。

我们的计划具有长远的根本的性质。因此，包括我们西方竞争伙伴在内的所有人都应当清楚，我们关于无核和非暴力世界以及关于在国际交往中确立文明原则的国际方针的原则基础是非常坚实和非常可靠的。

下 篇

新思维与世界

第三章

我们怎样看待当代世界

我们处在什么地位？

我们是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70年代的缓和几乎已经消声匿迹。我们的和平呼吁没有得到西方统治集团的响应。苏联对外政策在空转。军备竞赛一再升级，战争威胁不断加剧。

为了回答怎样使局势好转的问题，需要先提出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情况的问题。世界在自己的发展中正走向什么样的边缘？为此需要清醒而现实地纵观世界全貌，从旧框框中摆脱出来。正象我们所说的，用新的眼光去观察。

我们的共同世界，人类这一代人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它是多种多样的，五彩缤纷的，变化万千的，它充满了相互对立的趋势和尖锐的矛盾。这是一个取得重

大社会进展，进行着全面的科学技术革命，经济、原料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尖锐，信息科学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界。这是一个空前的发展和进步潜力同极度贫困，落后和野蛮并存的世界。这是一个有着广阔的“紧张区域”的世界。

过去，一切都很简单。有着几个大国，如果达到了平衡，它们就确定并平衡自己的利益，而如果达不到，就交战。国际关系就建立在这几个大国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这里是一国的势力范围，那里是另一国的势力范围，还有第三国的势力范围。但现在，请看，在战后40年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世界的政治格局包括：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自己不长的历史中走过了进步发展的重要道路；大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有着各自的利益、历史、事务和问题；最近30至40年诞生的一大片“第三世界”，即获得政治独立的几十个亚非拉国家。

人们几乎都知道，每一类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从最起码的推理来看，所有这些利益似乎都应该在世界政治中得到合理的体现。但恰恰不是这样。我多次对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交谈者说过，让我们看看和考虑一下现实吧，现实是既有资本主义世界，又有社会主义世界，还有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世界。那里居住着几十亿人。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但发展中国家

的问题要多得多。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这些国家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几十年来它们一直是殖民地，它们为自身的解放顽强斗争，赢得了独立，它们想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资源，建立独立的经济和文化。

比如说，只从苏联或美国、英国或日本的利益出发，难道能够期望建立起正常和公正的国际关系吗？不能！应该平衡所有国家的利益。现在没有这样做。现在是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第三世界”正发生着能够彻底震撼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进程。

谁都不能封闭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世界或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然而，不客气地说，有这样一种观点：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偶然，该是把它扔到垃圾堆的时候了。这样，“第三世界”也就老实了。一切都将回到老路上去——可以继续靠别人享福了。回到过去并不是对未来召唤的回答，而是恐惧和不相信自己两者兼而有之的冒险主义。

我们不仅重谈了五彩缤纷的多维世界的现实，我们不仅估计了各国的不同利益，而且看到了主要的东西——国际社会各国相互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当代发展的辩证法就在于此。一个矛盾重重的，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多样化的，然而却是相互联系的，许多方面是整体的世界，是在困难情况下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摸索着并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而形成的。

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十分明显的现实是：产生了所谓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日益尖锐，它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命运同样具有迫切的意义。这里说的是保护自然、环境、大气层和海洋的情况危急，地球上的传统资源原来并不是取之不尽的。这里说的是可怕的新老疾病，是人类共同关心如何在世界广大地区消除饥饿和贫困。这里说的是用智慧共同去认识宇宙和世界大洋的工作，是利用已获得的知识造福于全人类。

我可以讲许多情况，说明为了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国家正在做些什么。在谈到我国的改革时，我已谈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把我们该做的事做好。

但苏联一家是无力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在呼吁进行国际合作时，我们再次提出这一点。摒弃虚伪的“威望”考虑，我们十分负责地说，在当代世界上我们大家越来越相互依赖，变得互相需要。因此我们认识到，从宏观上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使用它的资源，互相交换这些资源，我们知道，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的，应当保护它们，保护自然和我们周围的环境，这就是我们大家面对的现实。越来越迫切需要有有效的、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国际程序和机制，这种程序和机制能够保证合理利用世界资源这一全人类的财富。

我们从这里发现了我们的相互依赖性，发现了世界的整体性，发现了人类迫切要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以便保护人类自身，以便造福于今天、明天和未来。

最后，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认识到的现实。人类在进入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便不再是永生的了。曾爆发过战争，可怕的战争，它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使城市和乡村变成一片废墟，整个整个民族连同他们的文化被消灭。但是，人类的繁衍没有成为问题。而现在，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

人类将被消灭多次，这一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的事在技术上已是可能的了。现有的核武库给地球储备了能够把每个居民周围的大片土地烧为灰烬的弹药。目前一艘战略潜艇拥有的毁灭性力量就相当于几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样的潜艇竟有许多艘！

在军备竞赛中取胜，就象在核战争中取胜一样是不可能的。军备竞赛在地球上继续着，而且还扩展到了宇宙，从而加速了本来就已相当疯狂的积蓄和完善核武器的速度。世界局势可能出现政治家无法控制的局面。它将受偶然性左右。我们大家面临着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地生活，制定新的政治思维，因为今天的条件与三四十年前完全不同了。

是该结束从帝国立场出发看待对外政策的时候了。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镇压、强迫、收买、摧毁、破坏只能得逞于一时。这只是暂时的。从长远的政策，即从重大的宏观政策角度来看，谁都无法使别人屈从。也就是说，只剩下一点，这就是平等的关系。我们大家都应当意识到这一点。除了我上面所说的现实——核武器、生态、科学技术革命、信息科学外，这也要求人们必须在各方面互相尊重。

我们的世界是复杂的，但不是毫无希望的。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每个人都应重新考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并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新的政治思维

在1985年4月后的两年半中，我们在思考世界局势和使其好转的途径方面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我还要谈谈我们为国际气氛根本健康化所采取的实际步骤。但现在只谈最本质的东西。

我们在自己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但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实质上是一个整体的世界的构想。我们在这一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诚然，在社会选择、意识形态和宗教信

仰、生活方式上，我们各不相同。当然，差异将继续存在。难道我们就因此而决斗吗？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地球上的生命，我们跨过把我们隔开的障碍岂不是更正确吗？我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用说到就做到的声明和具体的行动确立了新的政治思维。

紧张局势和对抗使各国人民疲惫不堪。他们渴望寻找更安全更可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哲学、政治、意识形态观点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陈规陋习仍盛行，助长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野心的旧思维根深蒂固，仍旧把别国只看成是推行自己政策和从事其他活动的目标，不给它们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奉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权利。

我们完全不赞成用某种过激的方法解决涉及世界各个地区的问题，虽然某些地方也许还需要这种方法。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不想采取会加剧对抗的行动。例如，我们不同意现在西方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性质，但我们也不呼吁去打破它。我们认为，应该改造它，清除新殖民主义，因为它只是在剥削手法更巧妙这一点上不同于老殖民主义。需要创造一种条件使发展中国家可以支配自己的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使它们不是为别的什么人效力，而是为自己造福。

应在广泛的国际化的基础上，在经济、信息科学、

生态领域方面开辟通往国际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大概，西方只想在“七国”和“五国”范围内活动，也就是说，在它们自己之间，在“家庭圈子”内活动。显然，企图破坏联合国的威信也与此有关。例如，一些人喋喋不休地说，联合国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几乎面目全非了。今天，世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充满了许许多多国家各种不同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寻求得到平衡，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真令人忧上加忧。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安排国际协作经验的联合国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的确，联合国的努力不总是成功的。但我认为，这个组织恰恰是寻求各国利益平衡最适合的场所，没有它世界将不会稳定。

我明白，一天之内不会使一切都发生变化。我明白，我们和西方对具体情况看法仍会有分歧。但这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现在世界各国人民，就象我曾说过的，恰似在山坡上的一队拴在一起的登山运动员。他们或是一起向上攀登，登向顶峰，或是一起摔下深渊。为了不致发生这种情况，政治活动家们应摆脱对利益的狭隘理解，认识到当前局势的紧张程度。因此，我们尖锐地提出了必须对整个国际局势及其各种形成因素加以重新思考的问题。

在目前这个世界上，不能根据1947年的方法，即杜鲁门主义和丘吉尔的富尔顿讲话来制定政策。应当按新

的方式思考和行动。而且历史在催促人们，使人们无暇左顾右盼。明天可能就晚了。而后天也许根本就不会来临。

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须知，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义。核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反理智的。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这甚至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战争，而是自杀。

况且，军事技术的发展已具有这样的特点：现在即使是非核战争，其毁灭性后果也逐渐与核战争不相上下了，因此我们用对核战争的评价来评价大国的非核武装冲突，也是合适的。

由此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以在世界政治中使用武力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形成的。它们成为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公理。现在它们失去了所有理智的依据。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由于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和核力量来解决国际矛盾，便需要有一个实力与安全的新辩证法。现在，安全是不能用军事手段来保障的，无论使用武力，无论恫吓，无论不断完善“剑”和“盾”，都不能保障安全。谋求军事优势的任何新企图都是可笑的和荒谬的。现在又要通过宇宙来谋求军事优势了。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时代错误，它之所以能够被保留下来，是因为军国主义集团在制定政策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从安全的角度看，军备竞赛是荒诞的，因为它的逻辑导致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并最终导致核冲突。军备竞赛使巨大的资源不能用于其他需要，降低了安全水平，破坏了安全。它本身就是和平的敌人。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的道路，是裁军的道路。只有越来越低的战略平衡水平——其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和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才能保障我们时代获得真正同等的安全。

这可能会使某些人害怕。说什么这要把军界工业界集团往那儿摆呢？它养活了多少人，提供了多少收入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瓦列昂季耶夫在最近写的一本著作中专门分析了这一问题。他证明，从经济观点看，军国主义分子的这些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在军界工业界集团中，每个工作岗位要比民用工业多耗费一二倍的资金，即可以为民用工业建立三个工作岗位的资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目前军事经济成分

已同民用经济成分联系在一起，为它生产许多产品。这就是说已经有了基础，军事经济能够为和平目的发挥自己的力量。第三，苏美两国能够制定庞大的共同计划，把我们的资源、科学和智能潜力联合在一起，解决为人类造福的各种各样的任务。

新的政治思维需要承认另一个简单的公理：安全是不能分割的。安全只能是对大家都一样的，或者都没有。它唯一的坚实基础是：承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要使自己的安全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例如，难道为了美国的利益，苏联就应当认为，它的安全应让位于美国的安全吗？难道反之就对我们有利吗？我要十分肯定地说，我们不想这样做。结论是，对手不得不成为伙伴，不得不共同寻找通往普遍安全的道路。我们看到，在许多国家，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已有形成新思维的迹象。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这是一条在共同的最高利益——不允许发生核浩劫的基础上——达成互利协议和彼此妥协的道路。这样，就不能靠牺牲别国的利益来谋求自己的安全了。

新的政治思维十分严格地规定了军事理论的性质。它应是绝对防御性的。这与这样一些新的或比较新的观念有关：军备的合理的足够程度，非进攻性防御，消除各种武装力量的不平衡和不对称，在两个集团之间使进

攻性军队集团脱离接触等等。①

当代普遍安全的原则基础是，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其他国家，同时用客观的和自我批评的眼光看待本国社会。人民既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受美国或者苏联的支配。就是说，政治立场应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

不应把意识形态分歧搬到国家关系中来，使对外政策服从于意识形态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和防止战争的利益则是普遍的、高于一切的。

新的政治思维认为，除了消除核威胁之外，解决包括经济发展和生态问题在内的所有其他全球性问题，是保证持久与公正和平的有机条件。按新方式思维，就是

① 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坚决走这条路。1987年5月29日在柏林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它们通过了一个原则性文件《关于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军事理论》。文件揭示了这一理论的绝对防御性实质。文件指出，只要缔约国本身不成为军事进攻的对象，无论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对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采取军事行动。我们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对欧洲和欧洲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华沙条约缔约国不把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国人民当作敌人，愿意毫无例外地同各国在彼此考虑到安全利益与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建立关系。

华沙条约国家不想使武装力量和军备超过防御目的所需的水平。它们将严格遵守足够原则，以便保障自己的安全。它们建议北约成员国一起坐下来比较两个联盟的军事理论，以便彼此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意图。但对方对此没有作出回答。

要看到裁军与发展之间的直接联系。

我们主张国际上共同努力，把裁军变成发展因素。1987年8月底在纽约举行了国际裁军会议。我在致会议的信中写道：“实现‘为发展而裁军’的基本原则，应当而且能够团结人类，帮助人类树立全球意识。”

1986年11月访问印度期间，我同印度共和国总理拉·甘地签署了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和无暴力世界的原则的德里宣言。其中有一段话，我想在这里引述一下：

“在核时代，人类应当确立新的政治思维，以及能保障人类生存的新的和平概念。人们希望能生活在更加安全和更加公正的世界中。人类应当有更好的命运，而不是成为核恐怖和核绝望的人质。必须改变当前的世界局势，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没有暴力和仇恨、恐惧和猜疑的世界。”

已经出现了形成新思维和理解世界走向何处的重要迹象。这一进程的发展是很困难的。最困难的是，要使这种理解在政治家的行动和头脑中得到反映。但是我相信，新的政治思维将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因为它产生于我们时代的现实之中。

我们通往新思维的道路

我们并不想教训别人。听够了别人喋喋不休的教训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此举毫无益处。教人们学会新思维的首先是生活本身。在按新方式认识自己对战争与和平及两个体系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传统概念，以及深入思考全球性问题时，我们自己逐步接近了新思维，逐步掌握了它。

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30多年前，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得出了这样的基本结论：新的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而是可以防止的。这不单单指的是推迟未来的冲突，也不单单指的是延长“和平的喘息时间”，有可能和平消除某个国际危机。我们党宣布的坚定信念是，可以并且必须消除战争威胁，把战争从人类生活中排除出去。当时还声明，战争绝不是社会革命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变化，和平共处原则得到了发展。

在缓和的年代里，我们曾试图在平等的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用具体的内容来充实这一原则，正是在这一时期签订了一系列重要条约，使欧洲“战后”时期得以结束，并改善了苏美关系，这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了影响。

缓和的逻辑本身，是由于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不可能在核战争中取胜而形成的。正是根据这一点，还在5年前我们就向全世界宣布，任何时候都不首先对任何人使用核武器。

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是同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和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密切相关的。这也是向新的政治思维、向关于当代世界的阶级原则和全人类原则相互关系的新概念的转变。

新思维不是即兴之作，也不是智力游戏。这是对当代世界的现实深刻思考的结果，是认识到对政策的负责态度要求政策要有科学根据的结果，也是摒弃以前某些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公设的结果。采取非客观的态度，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而向形势作出让步，在分析形势时缺乏严谨的科学性，这使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可以说，新思维不是轻易得出来的，是在痛苦的思考中产生的。我们从列宁那里得到鼓舞。每当请教列宁时，每当以新的态度“重温”列宁的著作时，你都会对他能深入到现象的本质和看到世界进程极其复杂的辩证关系感到惊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列宁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论证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时，善于高瞻远瞩，能超出革命任务的阶级范畴。他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思想。我们只是现在才理解了这些思想的深刻性和全部意义。这些思想也为我们

的国际关系哲理和新思维提供了精神食粮。

有人可能反驳说，各个时代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对“永恒的”具有全人类价值的思想都曾进行过研究。是这样。但是，当时这些思想注定要成为乌托邦和空想的“智力结构”。在20世纪，在这个紧张的世纪的末期，人类应当承认，迫切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和对内政策一样，在对外政策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把阶级利益放在首位。当然，在正式场合，阶级利益通常都是用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或者集团利益等等掩盖起来的，阶级利益还被“共同福利”或者宗教说教弄得模糊不清。但是，归根到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其他清醒地判断问题的人都深信，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政策，都是由在这些国家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所决定的。在国际舞台上这些利益的尖锐冲突，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曾导致了武装冲突和战争。结果是，人类的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部战争史。今天，这一传统径直通向核深渊。整个人类现在是同舟共济，是沉是浮，只能在一起。因此，裁军谈判不是赌博。大家都应当赢，要不大家全都输。

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

某些人可能会对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全人类的利益和

价值这一点感到奇怪。的确，从阶级角度来对待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这种态度在今天既完全符合存在着各种阶级利益对抗的阶级社会的现实，也完全符合充满这种对抗的国际生活的现实。直到最近为止，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现在阶级斗争仍然是划分为阶级的国家的核心。同样，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用阶级态度对待社会现实的主要问题。全人类概念是最后一个阶级——工人阶级斗争的职能和最终结果，工人阶级解放了自己，并正在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对抗。

但是现在，随着大规模（普遍的！）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第一次出现了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今天的，而不是遥远的全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文明免于毁灭。

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新修订本本着新思维精神加以修改的，例如，我们认为，在党纲新修订本中，不能继续保留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视为“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一提法了。

人们曾习惯地认为，世界大战的根源似乎是两种社会制度间的矛盾。在1917年以前，世界上只有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世界大战就是在这一种制度的国家之间爆发的。还发生过其他一些战争。相反，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同一同盟范围内不同制度的国家与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斗争，并且粉碎了它。在法西斯的威胁面前，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高于它们之间的社会政治差别，并且为建立“超制度”的反法西斯同盟奠定了基础。就是说，今天，在更加可怕的危险面前，属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可以并且应当为了和平和解决全人类的全球任务进行合作。

在发展自己的世界哲学观念的同时，我们还按新方式考察了战争与革命的相互联系。过去，战争往往是革命爆发的雷管。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巴黎公社是普法战争的回声，而俄日战争触发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一场革命风暴。我国的十月革命成了它的九级巨浪。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了东欧和亚洲革命的新浪潮，也引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

这充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逻辑：帝国主义必然产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这些冲突理所当然地在一些国家中将造成社会上的“极度”不满情绪和革命局面。因此，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预测：如果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这场战争必将导致新的社会动荡，从而彻底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标志着普遍和平的到来。

但是，在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在核战争结局只能是全部毁灭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作出了战争与

革命之间不再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社会进步的前景已同防止核战争的前景“结合起来”。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已明确地把革命题目和战争题目“分开”了，并在我们的党纲新修订本中删去以下两句话：

“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不会再容忍那种使他们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扫除和埋葬帝国主义。”这一提法在理论上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爆发的，它不符合核时代的现实，因此已删掉。

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赛是必然的。但是，这种竞赛能够并且应当控制在必须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范围内。哪一种制度好，应当由历史作出判断。历史能判断一切。让各国人民自己去判断，哪一种制度更好，哪一种意识形态更好吧。让和平竞赛来决定这一切吧，让各种制度来证明自己有能力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吧。地球上的国家和人民是大不一样的。不一样，甚至是一种好现象。这对竞赛是个推动。这种理解是同和平共处的概念相协调的。这也是辩证的对立统一。

这大体上就是我们对新的世界哲学观念，对当代全人类原则和阶级原则的新辩证法的基本认识。

但是，是否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分析核威胁和某些其他全球性问题的原因时放弃了阶级分析

呢？我要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是这样。不能不考虑世界舞台上现有力量的阶级差别，不能忽略阶级对抗对国际关系和对解决人类所有其他任务的态度影响。

我们看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中那些富有侵略性和军国主义情绪的有影响的势力的立场十分强硬。这些势力的支柱就是强大的军界工业界集团，军界工业界集团的根本利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它靠牺牲纳税人的利益，从武器生产中获取巨额利润。为使人们相信钱没有白花，就必须向人们灌输存在着蓄意侵犯他们的福利和整个“民族利益”的“外部敌人”。不明智和不负责任的实力政策也是由此产生的。

“实力，又是实力，还是实力”，难道在我们这个武器多得只要使用其中一小部分就足以使人类不复存在的核时代能这样干吗？这就是充满“冷战”精神的思维。但是，这种思维源于生产武器的垄断组织的具体经济利益，源于不愿放弃享有特权地位的军队以及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官僚机构对政策的影响。

人们可能要问：苏联出于什么原因保留着武器和军队并且在不断完善他们呢？我来回答，因为我确实知道此事，因为我是国防会议主席。十月革命以来，我国人民一直处在侵略威胁的压力之下。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有外国人参加的国内战争，14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实行经济封锁和建立“防疫线”，外交上不予承认

（美国直到1933年才承认），东面的军事挑衅，最后是法西斯从西面进行的毁灭性的流血战争。我们也不会忘记美国军人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对苏联进行原子弹袭击的计划。我们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首先建立了北约组织，总是第一个制造出新式武器系统？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令人不快的：为什么美国现政府不愿意停止核武器试验，并且滥用美国人的巨款搞“星球大战”计划呢？难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和平目的吗？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们处于我们的地位，你们会怎么办呢？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真诚地愿意裁军，但是要在同等安全的公正基础上裁军，愿意进行最广泛的合作。我们牢记沉痛的教训，不能采取单方面的重大步骤，因为我们担心，这样的步骤可能会使“全球民族利益”的热衷者产生邪念。我们认为，现在主要的是使人类自我保全机制发挥作用，促进和平、理智和善良力量的不断增长。

“莫斯科之手”

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即尼·谢·赫鲁晓夫出于一时气愤脱口而出的话：“我们要埋葬你们”，几乎成了西方最常引用的某位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应当向外国读

者说明一下，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我国的一些土地问题专家曾进行过尖锐的辩论，有的人以辛辣的嘲讽口气把这场辩论（指的是辩论的特殊政治内幕）称之为“谁埋葬谁”的争辩。也许，这场辩论产生了一个形容在各个方面都不成功的比喻，而赫鲁晓夫采用了这个比喻。

但是，应当从赫鲁晓夫整个讲话的上下文来看待这一点，不要赋予它以军事色彩。他指的是两种制度的竞赛，他想证明社会主义并不害怕同资本主义作比较，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当他为改善国际形势所作的真诚努力和他提出的具体建议完全不被理解和遭到反对时，他就动感情了。

我现在根据自身的经验要说一句：同西方进行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这里涉及经济利益，就需要学会极度忍耐。或许，还应当补充一点，要是我们苏联根据某个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某些言论来判断这个国家的政策的话，那么早就该打起来了。但是，并没有发生这种事，因此不应当无休止地利用一位死者这几个词来进行投机，并把这几个词说成是我国的立场。

至于说到白宫的秘密文件——一些人经常引用它来宣传列宁有一套关于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和征服欧洲计划的“学说”，那么应当说，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都没有任何这种“学说”。

一些身居高位的讲演人有时引用的这些所谓“引语”，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伪造，退一步讲，只不过是无知罢了。

对于臭名昭著的“莫斯科之手”，我想说几句。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未来属于没有人剥削人，没有民族压迫和种族压迫的社会。未来属于社会公正、自由和个性全面发展的原则。但是，是否以这些原则为方针，是否在改造自己的生活中遵循这些原则，如果遵循这些原则，要采取哪些形式和采取什么样的速度，这些都是由每个国家人民自己决定的事情。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①恩格斯的这段话是我们对各种变相的“革命输出”所采取的正确公式。正如列宁曾说过的那样，须知，只有在千百万人民作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时，革命才能发展壮大。革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是在许多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凑在一起的时候爆发的”。^②列宁把“按订货”搞革命，“排出次序”和事先规定革命的日期的一切做法，都痛斥为“招

^①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353页。

^② 列宁：《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载《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514页。

撞撞”。

我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在自己的发展中要经历某些阶段。最初是原始公社制度，随后是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的是资本主义。到了20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开始起跑了。我们深信，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历史阶梯的合乎规律的几个台阶。这是必然的世界进程。西方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是文明社会的最高成果。这样认为是他们的事。我们根本不同意这一点。真理在哪一方，让历史去决定吧。

革命与解放运动产生于本国的土壤中。在群众的贫困和无权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时，在民族的尊严遭到践踏和自主选择的权利被否定时，就产生了革命与解放运动。如果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就说明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侵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其他什么人的野心和阴谋，不在于“莫斯科之手”。其实，这种无稽之谈也带有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凭空捏造和包藏祸心的性质。

新思维的国际潜力

我们并不把新思维看成是某种完美的体系。我们不认为，已经找到了真理，别人只能同意，或者否定，即采取我们称之为是错误的立场。不是的。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新思维仍是一个我们正在继续学习，经常积

累新知识的过程。众所周知，列宁认为，为了相互联系地分析世界经济的过程，就是70个马克思也是不够的。从那时以来，世界又变得复杂多了！为了形成新思维，就需要不仅同志同道合者，而且也要同那些在哲学上和政治上与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积极的交往。

因为他们也是本国人民的代表者，人民现在仍然是世界发展的主体，拥有发表自己意见和有效参与世界政治的权利。我确信，当代的政治家应当是易于接受别国和别国人民的智慧的人，否则他们的活动注定会充满土气，带有民族局限性，如果不是比这更坏的话。

正因为如此，我们支持广泛对话、进行观点对比、争论和辩论。这样做能够激发这样一种思想：不使新思维停止不前和仅仅局限在习惯看法的圈子里。而这主要是以国际内容丰富新思维。

特别重要的是“不同世界”的、具有不同职业和不同观点的人聚在一起进行交流。

如果他们共同关心人类，那么他们的争论和多种多样相互矛盾的论据并不妨碍他们找到共同点，就主要的问题达成协议。他们仿佛在小范围里为整个国际社会显示出这样的可能性。

这在科学家、作家、文化艺术活动家的会晤过程中表现得最明显。他们对世界前途、人的命运和能力的关心和忧虑，他们道义上的力量和对一切还不符合人类生

存条件的东西的担忧是诚挚的，也是内行的。在当代，当科学、知识渗透到自然界和整个生物界的深处，并在实际上决定着历史的发展的时候，这是无价之宝。因此，我甚至要这样说：政治家和科学文化界人士的非官方的、生气勃勃的交往是时代的要求。

况且，同这些人交往还不仅仅能在理论上和哲学上得到丰富。应该承认，同他们的交往对最近几年采取的政治步骤、作出的决定也产生了影响。

我清楚地记得1985年11月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会代表团会见的情景。这些科学家是沃尔德（美国）、克尼彭伯格和加布里埃尔（荷兰）、恩伦德尔（奥地利）、普罗霍罗夫（苏联）。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和韦利霍夫院士也参加了会见。我是在前往日内瓦同里根总统举行第一次会晤前不久与他们交谈的。他们把大会参加者的一份呼吁书交给了我，进行了很认真的谈话：谈到了使用核武器可能产生的后果，禁止核试验的意义，宇宙军事化的危险。我们谈到，通过裁军实现安全的道路，是同努力争取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生存相互联系在一起。

我记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发表的见解：现在勇气不是要用来准备战争，而是要用来确立和平。这次会见从道义上加强了我们为同美国总统会晤而准备采取的立场。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莫斯科“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国际会议上——在代表的广泛性和与会者的威望方面，这次会议是史无前例的，我了解了可以说是国际知识界的精华的情绪、思维方式和思想。同他们的交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同政治局的同事们讨论了这次会议的结果。我们决定采取新的重大的妥协性步骤：解开雷克雅未克一揽子解决的包袱，将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从一揽子解决中分离出来。

还有一个例子。众所周知，苏联不止一次延长单方面暂停核爆炸的期限。应当说，这是认真地研究了外国各类知识分子向苏联领导人多次发出的呼吁的结果。我们极其认真地领会了他们的不安和论据，因为我们懂得，一项负责的政策不能不考虑几乎是最权威的这部分公众的意见。我想，不考虑人类的命运——真正知识分子的使命正在于要考虑人类的命运——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是不人道的政策，不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在我们关于新思维内容的思考中，伊塞克湖会议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应苏联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的邀请，卓越的世界文化活动家出席了会议。我会见了与会者。我们交流思想的主题是人道主义和政治、核时代政治活动中的道德原则和精神原则这样一些问题。我当时说过：人们从过去的不幸中吸取了教训，集中了思想，鼓足了劲，战胜了困难、贫困和损失，重新振作起来向

前进，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驱散我们整个人类大厦上空的核威胁，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担心，那时我们就没有可能来纠正所犯的 errors 了。这就是头等重要的任务。正因为如此，在制订实际政策时应当把世界文化的精神和道德力量考虑进去。

国际医生防止核战争联合会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对世界公众的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联合会的奠基人是美国的劳恩教授和我们的恰佐夫院士。已有美洲、欧洲、亚洲、非洲、澳洲的数以万计的医生加入了这一组织。我在早些时候会见过劳恩教授，而在这一次，在莫斯科举行例行的代表大会后，我会见了联合会的所有领导人。这些人谈到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所做的工作受到极大的尊重。因为无论是他们所说的，还是他们所做的，都贯穿着实实在在的知识 and 把人类面临的危险预先告诉人们的强烈愿望。

我觉得，从他们掌握的论据和精确的科学资料来看，是容不得耍半点政客手腕的。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都没有权利不重视他们的结论，轻视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使世界公众的意识上升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关于苏联领导人，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对那些代表着现代世界多样性的人的意见（甚至是批评）很感兴趣

趣。我们在同他们的交往中可以检验新思维的可能性和我们政策的现实性。在这种交往中发现了观点上的接近，而有时是吻合。这就向我们证明，我们的新主张是与人类进行诚实思考的那一部分人的探索处在同一轨道上的。

我们认为，加强科学家、文化活动家，总的来说是知识界的国际接触，以及他们之间进行职业性往来是一种尝试——引导各大小民族的优秀分子，帮助这些民族的优秀分子认识当前世界，表达有关世界的未来的意见，以预防大家可能一起遭到的不幸。

这不仅同裁军、意识和社会的非军事化有关，而且也同生态危险、能源和资源前景、卫生保健、教育、粮食、人口、信息交流等这样一些属于全人类的问题有关。在就所有这些问题同科学和文化界人士、同各界权威人士的接触中，我们找到了许许多多的共同点，吸收了很多有益的东西。

我要说，进行交往、会见、经常交换意见是必要的，而且在目前条件下，看来这种必要性应该成为政治家、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自然需要。

不久前，我同拉丁美洲杰出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克斯进行过交谈。这是位智慧超群的人。他的思想境界是全球性的：只要读一读他的一本书，就足以相信这一点。因此，谈起苏联的改革，就能够深入思考当

代的任何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因为全世界需要改革，也就是需要发生质变，需要向前发展。这个人的看法是意味深长的。他的看法能鼓舞人，因为它反映了亿万人民——地球上的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总之是各种人的思想、忧虑和情绪。这就是说，我们自己所做的事也能够有利于别国人民。

对于我这个共产党员来说，经常同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交往是很自然的。在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交往的性质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逐渐地“改掉”了党与党之间的那种将真话掩饰起来，而有时在某些场合又吞吞吐吐不直说的外交。

不管共产主义的敌人是怎么想的，这一运动已经产生，它的存在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和维护人的真正权利，为了地球上的公正。它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巨大潜力。因此，我同朋友们就精神和世界观交流的思想、看法、设想以及相互善意的批评，对于新思维的形成和加深，对于在政策中正确运用能反映劳动群众利益和情绪的国际主义经验的全部财富来说，具有无法代替的意义。

工会、妇女、青年、反战和生态等许许多多的社会运动最近几年来对国际政治的直接影响显著增长。它们要求严格，触及到以前从未触及过的外交禁区。

人们想亲自了解国务活动家的意图，这是合理的，

因为国际生活关键方面的事态发展实际上取决于这些活动家。我曾会见过最大的工会组织——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世界上许多国家数以亿计的劳动人民站在这个组织一边。代表团把第十一次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一份向我和美国总统同时发出呼吁的文件交给了我。在我看来，这个文件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又反映了全人类对确立和平的关心。从这个文件中，从同工会领导人坦率的和 content 丰富的谈话中，我得出了这样的信念：工人阶级作为整个社会发展利益的表达者（通过自身的利益），其历史使命是永存的，在新的条件下他们仍然在继续履行这种使命。而自工人阶级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使命以来，这个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87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感人至深。我被邀请在大会上讲了话。这是一次有150多个国家的妇女参加的非同寻常的代表大会。在代表们的发言中，在同她们交谈时她们所说的话语中，令人强烈地感觉到她们本人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密切的关系。是的，妇女命中注定具有使人类一代一代繁衍下去的天性，和平思想今天在她们身上找到了最无私、最忘我和最众多的捍卫者。参加这次大会，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政治方面，我都获得了许多东西。

我每天都收到数十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呼吁书

和电报。有些来信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城市市长、议员和实业家写的，但更多的是普通人、夫妇俩写的，还有全家写的。有许多是集体发出的呼吁书，儿童的来信，有的是集体写的，有的是个人写的。常常有一些很动人的事情：在信上附上诗、整首整首的长诗、图画、小小的自制纪念品、证书、某个学校或者小组、俱乐部的奖状，甚至还有祈祷文。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人类情感和想法，表达了对世界前途的担忧，希望人类能有比在核浩劫阴影下生活更好的命运。

虽然很忙，但我力求尽可能给这些信以回复。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呼吁书中最主要的是对苏联，对我们目前政策的信任。我们珍视这种信任，并将以自己在国内和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来证明没有辜负这种信任。

同世界各国人民的这种交往使我们更加相信：既然优秀的思想家和诚实的人们都在思考和关心人类文明的现在和将来，为了维护和平和建立美好、公正的世界而情愿贡献出自己的才干、知识、时间、热情和精力，人类文明的前景就不是没有希望的。

总之，我们在制订建立在新思维基础上的政策时，决不想局限于我们习惯了的思想和我们固有的政治语言的圈子内。决不是硬要所有的人都信奉马克思主义。新的政治思维能够，也应当吸收各国人民的经验，保证各种文化传统的相互丰富和融合。

主张奉行诚实的和开放的对外政策

苏联领导人力求以新的方式进行工作。我首先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对话。不进行对话，甚至很难谈得上实现相互了解。我们刚开始实行新思维的原则，就把对话作为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实现这些原则的基本手段。不仅如此，通过对话我们可以检验我们的思想、倡议、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本身是否切合实际。我们满意地指出，同“改革”一词不同，虽然“对话”这个词不是来自于俄语，但这个词最近几年来在外交词汇中已牢固地确立下来。而政治对话已开始在国际关系中起着从未起过的重要作用。

在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两年半内，我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长、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的领袖，同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各个级别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会见和会晤不少于150次。

这一点也是苏联领导人中我的许多同事们的正常活动。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所大学校。我认为，就是对我们的大多数交谈者来说，这样的对话也不是没有益处的。当代世界所必需的文明的国际关系是在对话过程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

其次，我们想在国际交往中恢复“国际交往”这个

词所固有的真正含义。我们在宣布自己忠于诚实的开放政策时，指的是诚实、正派、真挚，我们实际上一直遵循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本身并不新，是我们从列宁那里继承下来的。新就新在我们正努力使这些原则摆脱在当代世界中盛行的模棱两可作风。新就新在目前形成的局势要求人人必须遵守这些原则。

我们实际上排除了我们关起门来对我们的外国交谈者所说的话同我们公开声明和所做的事情之间的任何脱节。我承认，我不赞成那种让人弄不明白的外交：会晤或者交换信件的结果使人不明白交谈者究竟想说些什么。我赞成开放政策和干实事的政策。这种政策不应该有两张底牌，因为这种政策的预见性是国际稳定的必要条件。在对外政策事务中要多些开放，多些公开性，少些策略性手腕和花言巧语。现在，谁也欺骗不了谁。我不断地对西方交谈者重复这一点。

今天对领导人的要求是准确地估计现实，有清醒的头脑，增强责任感。这就是说需要严肃的政策，而不需要玩弄政治把戏，玩弄政治把戏就是玩弄权术。

我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新作风要求扩大接触范围，使其远远超出外交过程的范围。除政府以外，议会正成为国际接触的越来越积极的参与者，这是个良好的征兆。它说明在对外政策领域发生了民主化趋势。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时代的象征是广泛吸收舆论、国际

组织和各国社会团体参加这一领域。公开的人民外交——直接向人民发出号召——正成为国际交往中的正常手段。

我们运用公开外交方法并不是玩弄诡计。我们的出发点是，军备竞赛的全部负担都落在了人民群众的肩上，更不用说国际冲突可能产生的后果了。我们希望，苏联的立场能为各国人民所了解。

在这里，应当谈谈关于政策和宣传的相互关系这个尖锐的迫切问题。我们多次听到对我们对外政策倡议的回答：“这是宣传！”应当承认，在我们这个群众性交流和群众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年代，一切对外政策建议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进行宣传的。它们应该“产生影响”。例如，美国领导人在正式提出可能采取的步骤以前很久，就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宣传这些步骤，而且总是把它说成是“巨大的”、“历史性的”、“转折性的”等等。但是，全部问题在于建议的真正性质和目的是什么：是否指望建议得以实现，建议是否现实，是否考虑到各有关方面的利益或者分明只是为了掀起宣传浪潮才提出建议。所以，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我们的全部倡议都是实事求是的建议，用列宁的话说，这是“行动口号”，而不是“宣传口号”。

我可以襟怀坦白地在这里重复一遍我在1985年8月答《时代》周刊问时说过的话。如果真的把我们所做的全

部事情仅仅看作是宣传，那为什么不按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予以回答？我们停止了核爆炸。那么你们美国人也应当这样做呀。或者另外再给我们一个“宣传打击”，比如说停止研制哪怕是一枚新的战略导弹。而我们也会以同样的“宣传”予以回答，依此类推。试问，这样的“宣传”竞赛会对谁有害呢？

两年半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用各种尺度来衡量，我们所谈及的时期充满深刻的内容。这里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可以说，新的政治思维仍然在世界政治中艰难地为自己打开通路。这将是必然的。可以说，旧的习惯势力仍然强于新趋势。这也是必然的。但主要的是，已经为国际关系的改革艰难地开了头。我们相信，世界将会向更好的方面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在发生变化。

第四章

苏联的改革与社会主义世界

我们的国际主义原则是：在自己家里采取某种重要的、本质的措施时，要认真估量一下，这对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将意味着什么。更何况，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其他兄弟国家的理解、支持和互利协作，有时是帮助的情况下，是不能顺利地、健康地向前发展的。

关于现实社会主义

我们采取改革方针的出发点是：改革是苏联人民的事业，负有把我们的社会引导到崭新阶段的使命，但是它现在和将来都有助于加强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所选定的方针和大大加快步伐的必要性迫使我们从广泛的历史角度来看待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协作的问题。结果得出一个结论——所有兄弟党也

都赞同这一结论，这就是要使我们的合作加速发展，而且这方面的改革也迫在眉睫。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倡议是根据以下情况提出来的。

战后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已经成了强有力的国际体系，成了世界政治的极为重大的因素。许多国家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已为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多边组织的活动也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科学和文化交流已具有很大的规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成功的一面。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个国家的经济起点有很大不同。今天，经济水平也非常不一致。这就是社会主义发挥共同潜力，实施一体化机制的困难之一。

社会主义经历了不寻常的发展阶段。在战后的头几十年里，只有苏联有建设新社会的经验。它不得不对当时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当时经济关系的性质是与此相符的。主要是苏联提供原料和燃料，帮助建立工业基础部门。就是在国家建设方面，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大多以苏联为榜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把“苏联模式”强加于人的投机说法歪曲了当时的这种客观必要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援助，总的来说对其他国家建设新社会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但是，也免不了有缺点，并且是很大的缺点。苏联

的许多经验是在不考虑这个或那个国家特点的情况下被照搬过去的。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公式化的态度被我们的一些理论家，特别是实践家从意识形态上加以“论证”，他们似乎成了真理的唯一捍卫者。他们不考虑问题的新变化，也不考虑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而是常常对它们的探索表示怀疑。

另一方面，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某些固步自封的倾向，这就为作出主观主义的评价和采取主观主义的行动创造了条件。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国家从其诞生时刻起就是帝国主义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大规模施加压力的对象。

所有这些在许多情况下造成的结果是，一些客观进程和业已成熟的问题不能被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及时发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朋友们即使看到了某些令人不安的东西，一般也是保持沉默。当时还不习惯于坦诚相见。正如常言所说，害怕“被误解”。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中遇到了严重危机。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56年，后来又是80年代初的波兰就是如此。其中的每一次危机都有自己的特点。摆脱危机的办法也各不相同。但是，客观事实是：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旧制度的复辟。我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和复杂情况，其过错自然不在社会主义本身，是由于执政党的失误。当然，这里也有西

方的“功劳”，有它们经常地、顽固地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进行暗中捣乱的“功劳”。

经过认真的，有时是痛苦的试验，已经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从实践中，从执政的共产党的理论工作中，获得了关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方式和办法的更全面和更准确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只是从理论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并没有想要描绘未来社会的详细蓝图。而且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认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来源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创造。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现象。苏联同南斯拉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友好关系遭到了特别严重的破坏。总之，痛苦的教训够多的了。然而，共产党人吸取了教训，现在还在继续吸取教训。

一般来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是它有学习的才能。学会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学会防止产生我们的敌人企图制造和加以利用的危机形势，学会抵抗那种分裂社会主义世界，使一些国家与另外一些国家相对立的企图，学会避免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相互协调这种冲突，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极复杂问题的办法。

世界社会主义是如何进入80年代中期的呢？现在可

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大批国家中已牢固地站稳脚跟，社会主义的经济潜力在不断增长，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完全合乎道德规范并使人变得高尚。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一切都这么好，为什么改革还要深入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来呢？是的，这个问题提得合情合理。

总的说，回答也十分简单：世界社会主义最初产生和形成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而当时所形成的关系形式实际上并未发生变化。这种关系的消极面当时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也就是说，妨碍这种关系的发展和妨碍把它引上新的现阶段的一切“障碍体制”还没有显露出来。而且，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在自己生活的各个领域积累了大量经验。若是死抱住旧的合作形式不放并局限于此，就会给社会主义的威望和潜力造成直接损失。

确实如此。从70年代末起，兄弟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开始具有徒有其表的性质。接触中的信任和求实精神减少了。

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大家共同做了大量工作。这一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并且也正在继续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都在更新。这不是出于感情冲动，而是由内部发展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

谈谈新关系

在改革条件下，苏联在大家庭中的作用是由我国的客观形势决定的。不管我们这里的形势是好还是坏，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大家。但是，我们现在所达到的协作水平不仅是我们在自己家里工作产生的结果。这是兄弟国家共同活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同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对合作的所有方面讨论过不止一次，也不止两次。

我们大家都认为，在当今世界发展的复杂时期，社会主义应该充分表现出自己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朝气，表现出人道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关系的改革已在进行。我们并不盲目乐观，工作才刚刚开始。但是，主要的方向已经确定。

这些方向的实质是什么呢？这里首先指的是，一定要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整个政治关系体系。这是兄弟国家所有领导人的共同观点。每一个党的自主性，它有权自立地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对自己的人民负责——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

我们同样也深信，如果没有每一个党和每一个国家不仅对自己的，而且对共同的利益的关心，没有对朋友和盟友的尊重态度，不认真考虑他们的利益，认真对待

别人的经验，大家庭就不可能取得成就。

我们的力量就在于对国内任务与世界社会主义利益的这种联系的理解。这给了我们解决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任务的信心。

执政的共产党的相互协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合作的核心。最近一些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兄弟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同我们举行过会见和内容丰富的会谈。合作的形式本身也在革新。出现了一个新的，也许可以说是关键性的环节——兄弟国家领导人多边工作性会晤制度。这种会晤可以使我们就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就其对内对外方面及时地、同志式地进行协商。

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根据华沙条约缔约国的一致决定延长华沙条约期限具有巨大意义。在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定期会议上，各缔约国可以集思广益和“对对表”。

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在国际事务中，使每个国家的倡议同大家商定的共同路线有机地结合起来。经验表明，这个公式的两个要素是多么重要。没有哪一个兄弟国家——我们自己也完全包括在内——能够离开共同方针在国际舞台上解决本国的问题。同样，只有把每个国家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加以综合和考虑，协商一致的对外政策才能是有效的。

至于谈到经济关系，那么，我们把这种关系建立在

始终不渝地遵守互利和互助的原则基础上。大家都懂得，今天，我们需要在科技和经济进步方面来一个大跃进。为此，我们制订并通过了共同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纲要规定要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到2000年把劳动生产率提高1至2倍。这是空想吗？不，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具有做到这一点的一切必要条件：既有强大的生产潜力，又有可观的科技力量，还有自然资源和干部。而且，计划体制可以把大批资金集中于决定性方面。

在经互会成员国领导人会晤时，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应当保障这个制度的全部结构更有成效地发挥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将发生同样的过程。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其政治制度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是从原则上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多少都处在探索革新和深刻改造的过程中。以多大规模进行这些工作，它们的形式、速度、方法应当怎样，这些问题要由每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和人民自行解决。这里没有矛盾，只有独特性。

法国总理希拉克曾问过我：“改革的精神是否会影响到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您对此有何看法？”我回答说，在这方面是相互影响。我们借鉴朋友们的某些经验，朋友们从我们这里借鉴那些适合于他们的东西。一句话，这是个互相交流和互相充实的过程。

老实说，我觉得问题本身不仅仅是由于对我们的事业感兴趣而引起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据说我们的一些朋友“不同意”苏联领导人的改革方针这种传闻而引起的。对此能够说些什么呢？我们与朋友和盟友没有任何重大分歧。而交谈照例是坦率和求实地进行的。而且我认为，在任何事情上都为我们友好地鼓掌，不如以关心和批评的态度来认识我们的行动和倡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这方面我也要重复一句：我们不谋求真理的垄断权。真理是在共同的探索和劳动中产生的。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经济工作。我们认为，加深我们的一体化的主要潜力和杠杆是发展联合公司与企业之间的直接协作联系和专业化。我们正是在这个关键方面重新安排对外经济活动，消除妨碍企业在兄弟国家中寻找合适的伙伴和自己商定共同项目的障碍。我们正准备建立社会主义合资公司，其中包括能够更迅速地满足我们这些国家对最现代化产品的需求的公司。这样一些公司将出现在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业中。苏联准备向它们提出大批订货。我们也准备积极对待西方企业家参与这些公司的活动问题。

我们打算今后几年加快一体化进程。为此，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工作显然将进一步集中在两项主要任务上。

第一，协调经济政策，制定一些最重要的领域中的长期合作纲要，实施共同的重大科技纲要和方案。在这

方面也可以并且适于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联合公司，首先是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合作。

第二，经互会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协调一体化机制的规范原则，以及开展直接协作联系的法规和经济条例，当然也包括价格形成方面的法规和条例。

我们力求使经互会的工作少一些行政手段和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多注意一些经济杠杆、主动精神、社会主义的事业心和使劳动集体参与这个过程。我们和我们的朋友都认为，应当使经互会摆脱无用劳动和文件泛滥现象。

经互会的存在决不会损害每个国家的独立，决不会损害每个国家支配本国资源和潜力、做造福于本国人民的一切事情的主权。经互会不是超国家组织。在经互会内部，一切问题不是凭多数票，而是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全体一致原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的。重要的只是某个国家不愿意或没有兴趣参加某个方案时别阻止别的国家参加。有兴趣就参加，没兴趣就观察一下，看看事情将如何发展。每个国家自己决定它准备在何种程度上参加这种合作，在这方面它将走多远。依我看，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我们大家还面临着在精神方面进行合作的规模宏大的任务。变革在这方面也找上门来了。实际上，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座社会实验室，进行社会主义创造的

各种形式和方法都在这里接受试验。我们认为，正因为如此，交流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总结这一经验的意义才急剧增长起来。

在考虑社会主义未来的时候，我们苏联共产党人所遵循的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将在不同国家经过一系列尝试之后才能实现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衡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是否严肃认真，其可靠标准不仅是它对待自己的经验的态度，而且也是它对待朋友的经验和全世界的经验的态度。至于这些经验的价值，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社会政治实践，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的真正加强。现在我们的科学界、我们的新闻界、我们的实践工作者的活动比过去广泛和积极得多，它们对兄弟国家的经验加以分析，并在苏联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经验。

同样，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也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在几次国外之行期间会见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普通公民时我看到了这一点。

有一个小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期间，当我在布拉格的大街上和企业中按照自己的习惯同人们交谈起来时，他们回答我说：“您现在做的是正确的！”一个年轻人说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看来要讲实话，要喜欢讲实话，并希望别人也讲实话。”我补充说：“而且要做实事。这是最困难的学

回。”我还说道：“生活比任何学校都困难，在生活中不总是能够轻易地获得一切。有时不得不退却，然后再进攻。思考，认识和重新认识是痛苦的，不要害怕这一点。”

苏联领导人得出的总的结论是：通过发展劳动集体之间和人们之间的联系，通过交流经验，我们能够达到新的关系水平。我们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联系将变得更加积极。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说，在党、国家和社会方面形成的牢固的相互联系网，对兄弟国家的合作具有重大的决定性意义。我们交往的级别是多种多样的，从企业、作业队、家庭、儿童和青年团体、大学和中学、创作协会和文化活动家、个人接触直到主管部门领导人、政府成员和中央书记经常的事务性联系。

我想谈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国在“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正在实现很有意思的、在许多方面很有成效的设想。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正在采取实际步骤使苏中关系沿着睦邻合作的轨道顺利发展。这方面有一定的改善和进展。我们相信，隔绝的时期已成为过去。我们邀请中国同志们在增进和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美好关系方面共同采取行动。

历史发展的现阶段给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大大加快步伐，使经济、科学和技术达到先进的水

平，令人信服地展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吸引力。

我们公开地和自我批评地评价了过去的发展，并且对于在社会主义世界中没有搞好的事情承担了自己的一份责任。这立刻得到了反响，从而为重新调整相互关系，使这一关系达到新的、当代的水平开辟了道路。

最近在政治、经济、信息方面共同做了不少工作。如果有什么还没搞好，我们不会着急，我们会坚持不懈地工作，寻找新的方法。主要的是我们深信合作的重要性和充实合作的必要性。在当前这个实际上是转折阶段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了解自己高度的民族责任和国际责任，顽强地寻求加快社会发展的潜力。科技进步、群众创造和发扬民主的方针是一个保证，与各种不怀好意的人的预言相反，社会主义在今后的时期内定将更充分地发挥其内部蕴藏的潜力。

革命性变革正在进入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这种变革正在积蓄力量。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但它也是对文明社会发展的贡献。

第五章

国际社会中的“第三世界”

当今世界的伟大现实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100多个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登上了国际舞台。我们对20世纪的这一奇观表示欢迎，这是一个广阔而又形式多样的世界，它有着自己的重大利益和种种困难问题。我们懂得，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世界将如何发展和以什么方式发展。

要使地球上的这几十个国家和亿万人民群众能够展现并发挥自己极为丰富的潜力以利于全世界的进步，这个责任不仅仅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一方面，我们在“第三世界”看到了经济迅速发展的例子，尽管这种发展是不均衡的、病态的。许多国家正在步入现代工业国的行列，某些国家已经在起大国的作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奉行的以所取得的民族尊严为支柱的独立政策，日益在整个国际事务中得到反映。

另一方面， 贫困、 赤贫、 非人的生活条件、 文盲和愚昧、 食不果腹、 触目惊心的儿童死亡率以及流行病的泛滥等等， 依然是居住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25亿人民生活的一个特点。 这是痛苦的现实。 80年代初， 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1/10， 这个差距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在扩大。

然而， 西方富裕国家仍在继续搜刮新殖民地的“贡品”。 仅最近10年， 美国一些公司从发展中国家榨取的利润超过它们的投资3倍。

巨额外债负担落在发展中国家的头上。 每年从发展中国家拿走的利润加上日益增长的债务说明： 发展前景的缩小和本来就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尖锐化。

我想起同密特朗总统的一次谈话， 谈话的意思如下。 很清楚， 每一个资本家的企业都试图获得最大利润， 但与此同时， 这个资本家或公司不得不在相当大程度上在劳动人民的压力下考虑下面一点： 为了使自己的企业有效地、 正常地运转， 必须保证职工拥有尽管很少但有助于恢复生产能力、 维持健康、 提高技能以及养育儿女的收入。 资本家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他明白，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自己今天的利润和保证明天的利润。 而作为资本家总体的西方国家在对待自己的前殖民地方面甚至连这一简单的真理也不想明白。 它们把自己同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搞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各国人民注定要受经济上不景气之苦，不能够满足最起码的需求，被巨额外债捆住了手脚。

当然，这些国家在目前条件下还债是不可能的。如果找不到公正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情况将孕育着种种后果。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变成了一种定时“社会炸弹”。如果炸弹爆炸的话，就可能造成可怕的灾难。具有强大破坏力的社会爆炸的潜力正在日益聚集中。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早就存在，但对这个问题要么是回避，要么是不予重视，要么是仅限于泛泛的议论。西方领导人对所孕育的危险估计不足，根本不理解可能发生的经济动荡的全部严重性，因而，他们正在采取局部措施，试图用权宜之计来挽救局势，但显然不愿意采取真正的根本性步骤，以便使他们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正常化。

在可能实行真正的变革和把关系纳入世界经济新秩序轨道之前，将面临一场艰苦的斗争。道路将是漫长而艰难的，因而，应当对出现各种预想不到的情况作好准备。要知道，改革国际关系需要考虑到各国利益，需要利益的平衡，而许多人不想作出任何让步。

地区冲突

发展中国家陷入灾难境地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冲突的真正根源。在日内瓦同里根总统会晤时，就提到了这一点，我对他说，首先应当弄清，地区冲突从何而起。

真实情况是：尽管就其本质和对抗力量的性质来讲，冲突不尽相同，但冲突通常是在当地产生的，是内部或是地区性矛盾的结果，而这些矛盾则要么是因为过去的殖民地遗留下来的问题，要么是因为新的社会发展过程，要么是因为侵略政策的复活，要么是因为上面各种原因的总和而产生的。

危机和冲突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肥沃土壤。苏联从根本上反对恐怖主义并愿意同其他国家在消除这一祸患方面进行积极合作。应在联合国范围内集中进行这项工作。在联合国主持下，成立国际恐怖活动侦查法庭是有益的。在同西方国家进行双边对话的过程中——而最近一年则是同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瑞典加深交换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主张制订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有效措施。我们愿意签订专门的双边协定。我希望，同国际恐怖主义作共同斗争的战线在今后几年能够扩大。

但也应当意识到，为了杜绝恐怖主义，必须消除产生冲突和恐怖主义的种种原因。我曾不止一次地遇到西方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他们把地区冲突存在本身看成是“克里姆林宫阴谋活动”的结果，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近东几十年来长期存在着以色列同邻国的尖锐冲突局势。谁是罪魁祸首呢？竟然说是一贯反对以色列的扩张政策，维护阿拉伯人民，其中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主权的莫斯科。而且还硬说苏联有反以色列的偏见，尽管苏联是帮助以色列建立国家的第一批国家之一。

谈严肃的事情就应当严肃认真。近东是一个许多国家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和乱作一团的死结。该地区的局势依然很危险。我们认为，无论是对东方，还是对西方，乃至对全世界来讲，解开这个死结是极为重要的。但也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近东问题根本就不可能解决。对这一立场甚至很难理解，无论是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道义上考虑，都不能同意这一立场。因为根据这一逻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注定要出现新的尖锐矛盾、爆发新的军事行动和该地区各国人民遭受新的灾难。要是持积极的立场，并且支持那些在公正政治解决的道路上探索走出近东死胡同的办法的人所作的努力，不是更好吗？

我们懂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很难调和冲突双方

的利益，但应当进行探索，应当力求为阿拉伯人、以色列、以色列的邻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利益找到一个共同点。同时，我们绝不是希望解决的进程与形式以及这一进程的目的本身有损于美国和西方的正当利益。我们不是试图把美国从近东挤走，而且这也是不现实的，但美国也不应当给自己提出不现实的目标。

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要考虑到各方的利益。这正是我们早就提出召开近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倡议的原因。我在同詹·卡特交谈时回顾了这一历史。美国人用了10年时间才通过亲身的体验（尽管他们本可以吸取前人经验）相信：单独交易会一无所获，走这条道路是毫无益处的。只是到现在，好象上了一堂特殊的“培训”课之后，华盛顿才对局势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认识，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重要的是，要使谈判过程开始有所进展，要把已有的双边接触和多边接触纳入谈判过程，并积极开展探索公正政治解决的工作。只要会议不是掩护单独交易和单独步骤的“保护伞”，只要会议是为了近东的政治解决，并考虑到阿拉伯国家，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利益，我们就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作，并参加这种会议的各个阶段，而且是建设性地参加。

我想就此强调指出：我们原则上对以色列没有任何敌意，我们承认它存在的合法权利。但是，在目前情况

下，而且从以色列采取的行动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同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如果我们看到，出现了在近东局势正常化和近东问题解决上取得进展的可能性，那就可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成套的看法。至于说我们两国之间已有的接触，那么，我们不回避这种接触。

以地球上另外一个“痛点”——中美洲为例。冲突的实质何在呢？尼加拉瓜推翻了反人民的索摩查政权，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如常言所说，桑地诺革命刚一发生就又被宣布是“莫斯科和古巴干的”。这就是对这个小国不宣而战的惯用的意识形态理由，这个小国的唯一“过错”在于它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愿在别人的监视和指示下生活。然而，尼加拉瓜发生的事情表明，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可能发生。对我们来讲，下面一点听起来是十分奇怪的：我们听到有人说尼加拉瓜“威胁”美国的安全，说什么很快就会在尼加拉瓜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美国人似乎知道这件事，而我则闻所未闻。

我同玛格丽特·撒切尔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激烈的辩论。

我说，不堪忍受的生活情况迫使尼加拉瓜人进行革命，而造成这一情况的是英国的美国朋友们，因为他们把中美洲和整个拉丁美洲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从那

里残酷掠夺各种资源，而后来又对人民为何起来反抗感到吃惊。尼加拉瓜过去发生的和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是桑地诺主义者和尼加拉瓜人民自己的事。我们的谈话是直截了当的、开诚布公的。我问玛·撒切尔：“您责怪我们声援尼加拉瓜，但为什么您认为支持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者是正常的呢？您不为您在世界公众眼里的那种形象感到难堪吗？我们同情争取社会公正的解放运动，而您，据我所知，是不同情的。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说实在的，如果美国使尼加拉瓜得到安宁，那么，这对美国自己、对拉美人乃至对全世界都更好一些。

爆炸性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它们是不会自行得到妥善解决的。南部非洲早已掀起了风暴。那里的形势是阴森可怖的。南非广大群众反对种族隔离，这种不道德的和实行血腥镇压的制度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可是，西方的许多人却认为这种冲突形势是“共产主义阴谋”造成的，并且说什么这里有“莫斯科之手”，尽管我们根本没有“呆在”南非，至于美国及其伙伴就不能这样说了。

对波斯湾地区目前的形势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对波斯湾形势的评价，对形势加剧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在一些官方声明中已作了阐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决议，要求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要求伊朗和伊拉克军队撤至国际公认的界线。苏联投票赞成这项决

议。但是，美国却与这项决议的精神背道而驰，寻找借口干涉两伊冲突，增加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其借口又是保护西方利益不受好象是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并且扬言在冲突得到调解之后仍要留在海湾地区。

有些人就是这样判断所有地区冲突的，他们总是把地区冲突同苏美对抗联系起来。我们的印象是：美国需要地区冲突，把地区冲突作为提高对抗水平，玩弄强权政治和反苏宣传的长期因素。我们则认为，不能把地区冲突变成两种制度，特别是苏联和美国对抗的舞台。

既然谈到地区冲突，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对阿富汗问题是怎么想的呢？

也许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阿富汗是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我们同这个国家——不管是同历代国王，还是同部族头领——保持了良好关系。当然，阿富汗存在着许多由于国家极端落后而产生的问题。这首先是英国统治造成的。因此在阿富汗人中间出现一批人，他们想帮助人民挣脱中世纪的愚昧落后，使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现代化，使其发展更富于活力，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在阿富汗刚刚出现了进步变化的时候，国家却受到了外来的压力，帝国主义集团进行了干涉。因此，阿富汗领导人根据我们两国间签订的条约要求苏联提供帮助（在我们同意派出有限数量的苏联军队之前，阿富汗领导人向我们提出了十一次要求）。

我们本想尽可能快地把苏联军队撤回国。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个问题同必须政治解决围绕阿富汗形成的局势分不开。我们支持阿富汗现领导人的民族和解方针。苏联今后仍愿意看到阿富汗是一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不结盟国家。这个国家要走什么路，它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计划，这要由阿富汗人民决定，这是他们的主权。美国的干涉延缓了我国军队的撤出，妨碍了民族和解政策的实现。这就是说，妨碍了围绕阿富汗形成的全部问题的解决。将毒刺式导弹交给反革命匪帮，反革命匪帮用这种导弹打民用飞机，这简直是不道德的行为，是毫无道理的。

走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

各国人民都应当拥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掌握自己命运，支配本国领土，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如果各国政治家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可能使国际关系纳入正常轨道。要知道，意识形态和社会差别、政治制度的差别，也是各国人民作出的选择的结果。可是这种选择不应成为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事件或出现某种趋势并且可能会发展成为冲突或军事对抗的理由。

西方领导人应放弃殖民帝国时代形成的心理和概念，这是终究要做的事情。只要西方把“第三世界”

（西方在这里作威作福许多个世纪了）看作是它的“势力范围”，紧张局势的策源地就将存在下去。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将加强，这会导致“新热点”的出现。

我们的西方论战者不喜欢我们同他们议论这些。我们直言不讳时，他们就坐立不安，甚至恼羞成怒。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解释我们的估计：认为企图破坏美国和西欧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关系，是损害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我曾不止一次地解释过，我们不抱敌视西方利益的目的。我们知道，从经济利益和获得原料的角度来看，近东、亚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以及南非，对美国和西欧是有用处的。我们不主张触动这种关系，不想破坏这种历史上形成的经济联系。

然而，已经到了承认“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有权自行处理事务的时候了。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这些国家的人民取得了政治独立。他们还在努力争取经济独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我曾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谈过话——依靠本国人民的意志和支持，愿意为人民做些事情。他们想把本国人民引向真正独立、平等与合作的道路。要知道，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它们希望把这些资源用于本国的发展，是可以理解的。它们希望象发达国家人民那样生活，过不次于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可是它们正受着饥饿与疾病的折磨。它们的

资源流入发达国家并通过不等价交换的渠道变成了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发展中国家并不甘心处于这种状况。

这就是当代世界的现实之一。在西方，并非所有人都正视这一现实，尽管他们也认识到这一现实。可是，不正视是不行的。要知道，现在说的是几十个国家啊。

各大洲所有的人越是能更迅速地认识这一现实，国际关系就越会更快地纳入正常轨道。整个国际形势也就会更快地得到改善。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我认为，把这个问题提到国际上来，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已经来到。要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某种组织形式。联合国是最好场所。我们在准备这方面的建议。我已向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通报了这一情况。他在同我谈话时坦率地表示了对在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所持的积极态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支持不结盟政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代表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100多个国家的不结盟运动。现在，这个运动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是国际政治的重大因素。不结盟运动有助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当然要保持不结盟运动中现有的一切细微差别和特点。

不结盟运动体现了已解放的各国人民追求平等合

作，渴望其他国家承认他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将统治、发号施令、谋求霸权的种种表现从国际生活中清除出去的意愿。苏联理解不结盟运动的目标，支持不结盟运动。

不久前，不结盟运动参加国中间还有人认为，裁军问题、消除核武器问题是“大国”的事，是美国和苏联的事，是一桩同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大关系的事。

然而，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表明，不结盟运动已深刻认识到了裁军与发展的相互关系。并且还正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的确，如果军备竞赛得以停止并实现裁军，就会腾出足够的资源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它们的最迫切问题。

我同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讨论过裁军与发展的相互关系。我们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联合国给予最认真的关注。苏联向联合国裁军与发展会议提出了具体建议。遗憾的是美国拒绝参加这个会议。

今天，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指出，不结盟运动是世界政治中重要的积极因素。苏联欢迎这一情况并在其对外政策活动中考虑这一点。

亚洲太平洋焦点

东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充满活

力。我国的经济也在移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因此，我们在客观上对加强亚洲太平洋合作表示关注。

苏联不仅是欧洲国家，而且也是亚洲国家，因此它主张在辽阔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在今后的100年内世界政治的中心很可能移向这个地区——确立一些原则来改善形势，并根据所有国家的利益和这些国家利益的平衡来重新考虑各种关系。我们反对这个地区成为什么人的世袭领地。我们要求各国真正平等、协作和普遍安全。

看来在亚洲，和平问题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尖锐和棘手，而在某些地方甚至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尖锐和棘手。当然，苏联、印度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其他国家在不同年代提出过相应的倡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关于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了联合国大会和不结盟运动的支持。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是亚洲、太平洋以及全世界和平非常重要的因素。

1985年5月，我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第一次会晤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谈了下述想法：是不是应该根据过去提出的各项倡议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根据欧洲的经验考虑一下处理亚洲安全问题的全面态度，考虑一下是否有可能把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向这方面努力。

在同外国领导人和外国其他政治活动家会晤的过程中，这种想法更强烈了。不由地把亚洲情况同欧洲形势

作了比较。结果得出了结论：考虑到军事化的危险与日俱增，亚洲太平洋地区也需要某种类似欧洲赫尔辛基进程的“安全装置”系统。

在中央向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里强调指出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日益增大的意义。我们曾经指出，这个地区需要刻不容缓地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自己的途径，而且从协调开始，然后联合起来为政治解决棘手问题而努力，以便在此基础上哪怕是缓和一下亚洲各个地区军事对抗的尖锐程度，稳定亚洲局势。我1986年7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①。

置身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这座城市特别适于从亚洲和太平洋的角度观察世界政治问题。整个远东、亚洲和与亚洲相联的辽阔海域——我们很早就是这里的常住居民和航海者——的局势，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民族和国家的意义。在这里，在这个几乎囊括了世界一半的辽阔空间里，有许多大国，其中包括苏联、美国、中国、日本、越南、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这里还有被认为是中等国家，而按欧洲的标准看却是很大的国家的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了这些国家以外还有几十个

^① 关于阻挡在亚洲和太平洋扩散和扩充核武器的道路；关于减少海军在太平洋上的活动；关于削减亚洲的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关于本地区的信任措施和不使用武力等建议。

小的和十分小的国家。

顺便提一下，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曾经引起多少喧嚣啊！有人恶语中伤，说什么苏联现在决定夺取太平洋了，“也要在那里”称霸了，当然，首先要损害美国的利益了。

不过，对我们的倡议作出此种“吹阴风式”的反应，我们已习以为常了。只要我们作出小小的尝试，想同这个地区的某个国家建立良好的，或者纯粹是外交的或贸易的关系，立即就会被认为是险恶的阴谋。

实际上又如何呢？在我视察远东一周年的时候，我向印度尼西亚《独立报》发表了谈话。总编辑布·穆·迪亚十分正确地理解了我在那里的讲话的意思——邀请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共同解决问题。但是，他在列举这个地区国家时，忘记了提美国。我提醒了他并对他说：我们希望同美国合作。硬说我们的努力和我们对这个地区的关心会威胁他人的利益，这是荒谬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讲的话表达了我们的—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这项政策不应使任何人感到不安。我们说准备同美国合作，也如同说我们准备同日本，同东盟国家、印度、其他国家合作一样。我们邀请所有国家为了和平与共同利益而协作。

在回答《独立报》编辑的问题时我用新的具体建议证明了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真实意图。在这些具体建议中有

一项最重大的建议，这就是关于消除苏联在亚洲部分的全部中程导弹的建议，当然是在“全球零点方案”基础上同美国一起消除。

我们对待世界这个集中了众多不同国家和人民的广大地区的态度，是建立在承认和理解这里的现实情况基础上的。我们关于在亚洲和太平洋建立国际安全与和平协作的想法是以这种现实为依据的，这种构想出于共同在该地区建立新型公正关系的真诚愿望。

时过一年，我们可以指出的是，出现了一些积极趋势。我在上述对报纸发表的谈话里提到了这一点。但是，麻烦和矛盾并没有减少，对抗的趋势仍然在发展。这促使我们提出了补充措施，以缓和亚洲和太平洋的紧张局势。这些补充措施发展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提出的倡议并使这些倡议具体化了。

我们正在认真地研究位于世界这一地区的各国提出的意见和倡议。已经提出了独特的、建设性的主张并正在该地区传播。居住在该地区的各国人民世界观的特点、他们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出类拔萃的文化等，的确可以帮助人们在解决该地区的问题方面提出许多各国人民可以理解和可以接受的办法。

东盟对国际事务作出的越来越多的贡献令我们敬佩。我们愿意单独同东盟成员国中每一个国家以及同东盟整个组织，在尊重这些国家共同和单独地对改善国际形势

作出独立贡献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我为什么谈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奉行的独立方针的意义呢？不是因为我们在支持这一独立方针的同时想做有损于别的某个国家的事。而是因为只有在独立方针基础上才能开始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取决于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行动。这并不会促进全世界形势的改善。历史教训就是这样的，一切严肃的政治家都应记取这一教训。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在亚洲太平洋这样一个复杂的地区，只有通过合作和把各国利益结合在一起的途径才能建立起新关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那种类型的关系，即一方面是宗主国，另一方面是殖民地的那种关系，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它应当让位给新型关系。

在可预见的将来的某个时候举行一次由太平洋沿岸所有国家参加的太平洋会议的主张，已经引起了许多评论。这项主张是作为一种工作设想提出来的，更确切地说是作为建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来的。我举赫尔辛基这个例子，是因为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其他类似的经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模式”可以移植到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土壤上来。但是，在当代，任何国际试验都具有共同的全球性特点。

在《独立报》向我提出的问题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看苏联在发展地区性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根据

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的构想，我们更加关注乌拉尔以东地区，那里的经济潜力超过苏联欧洲部分好几倍。我们认为，同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实业界合作创办的合资公司和企业可以参加开发这些地区的丰富资源。

关于亚洲核裁军问题

考虑到亚洲国家的意见和不安，苏联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同意有关中程导弹和战役战术导弹的“全球双零点方案”。我们还表示愿意承担义务不在我国亚洲部分增加携带核武器的飞机的数量，如果美国将不在亚洲补充部署可以打到苏联领土的核武器的话。我们期望，这一切将成为推动亚洲核裁军进程的动力。

尽管亚洲太平洋局势十分复杂和纷乱，尽管在明快色调和阴暗色调的分配上有种种细微差别，但整幅图画的反核结构仍是很突出的。存在着现在就开始沿着通向消除亚洲核武器的路线前进的可能性。例如，建立无核区就可以成为在这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众所周知，苏联签署了关于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的拉罗汤加条约的有关议定书。我们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在东南亚和朝鲜半岛建立无核区的建议。关于印度洋问题的国际会议也可以为核裁军的目标服务，在这个会议上可以讨论和解决宣布该地区为和平区的问题。

我们对核裁军问题采取的方法和态度在亚洲和欧洲是一致的。核裁军应当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包括通过就地核查方法进行。我们诚恳地建议同美国就亚太地区核武器问题开始谈判，在对等基础上和在严格维护各方安全利益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对于解开亚洲核结子的全部认识。如果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位于该地区的国家就将能够开始建立地区安全体系。那么，在生活着25亿人的地区建立正常的关系和良好的环境是怎么回事呢？这好比是建造一所房子。每个人往房子的墙上加一块或几块砖，共同努力一层一层地建造好对大家都合适的合作与相互理解的结构。这是个伟大的、艰难的、但也是现实的目标。

欧洲和亚洲两个大洲的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汇成统一的欧亚进程。这一进程将会给建立全面的国际安全体系以有力的推动。

最近的事态越来越使我们相信，提出亚太地区安全问题是正确的和及时的。激起了对寻找地区和整个大洲范围内合作途径的极大兴趣。我们同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获得了更大的活力。

苏印关系

印度是我们的南邻，是一个有8亿人口的大国，在

不结盟运动中有重大影响和享有国际威望。这是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印关系很早就稳定地向前发展着。我在莫斯科和德里都不止一次地会见过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1986年对印度的访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那里通过了著名的德里宣言。

这个文件引起了普遍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德里宣言非同寻常。它显示了对国家间关系采取政治哲学态度的崭新榜样。宣言的哲学和道德基础是，在核宇宙时代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尽管这个文件是两个国家共同制订的，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双边范围和地区范围。

德里宣言的产生本身反映了苏印关系独一无二的性质。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实行那种能够导致在精神上相互补充和就当前的根本问题取得广泛一致看法的合作。我们两国从各自的动机出发，异途同归地取得了这种观点的一致。

印苏关系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堪称是典范关系。比如说，它充满多样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内容，反映了两国人民之间深深地相互尊重和同情，相互信任以及双方深切需要友谊的基调。

为什么印度和苏联这两个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会形成这种良好的关系呢？因为两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主权、平等、不

干涉内政、合作、承认各国人民有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自己的社会发展形式的自由等原则基础之上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自豪地说，苏联和印度是国家关系的典范。这种典范对其他国家是会有吸引力的。我们从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国际结构的萌芽，在这种国际结构中，和平共处和富有诚意的互利合作将成为一项普遍的准则。

在困难的转折点上

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同非洲一些政治活动家进行过多次会晤和认真的交谈。我会见了（同一些人还不止一次）罗·穆加贝、门格斯图、若·爱·多斯桑托斯、奥·坦博、穆·特拉奥雷、马·克雷库、沙·本·杰迪德和其他一些人。在同这些被公认为民族领袖的大活动家的交谈中，我产生了一种印象：非洲正在经历自己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和积极的新阶段。非洲在前进中。那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也存在着许多尖锐的和困难的问题。

同时，不言而喻，我们也没有把非洲看作是一切都是千篇一律，一切进程都按照一个模式发展的大洲。同世界各地一样，每个非洲国家都只有它自身才有的特点，执行着自己的政治路线。非洲领导人也是一些具有自己特点的不同的人。一些人在本国执政时间比较久，

成了世界闻名的人物。另一些人则刚刚登上非洲和世界舞台，正在积累实际工作经验。

我们了解非洲进步政权今天正在解决的任务的复杂性。现实情况是：它们的国家同前宗主国有着历史上的联系，而且在经济上依赖它们。然而，尽管帝国主义企图通过经济、金融，甚至军事手段来保住自己的地位，非洲进步政权仍坚决执行加强民族成果的方针。

苏联支持非洲国家的这种努力和这种政策。因为这是关系到政治主权和经济独立不可侵犯的问题，而当代世界的国际关系只能以政治主权和经济独立为基础。每个非洲国家的人民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合法权利。我们坚决谴责任何干涉他们内政的企图。我国过去支持，今后仍将支持包括南部非洲在内的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而在南部非洲还存在一个种族主义的最后堡垒。

在会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利弗·坦博时，我对他说：在反对种族隔离政权及其帮凶、争取建立民主国家、争取独立发展道路、争取使各种族和民族的人们在平等条件下生活的斗争中，我们站在你们一边。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南非越来越多的白人代表人物开始谴责种族隔离，寻求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晤，表示支持它的目标。这只能证明，种族隔离是没有前途的。

友好关系把我们同南部非洲“前线”国家联系在一

起。我们支持它们正义的立场，坚决谴责南非方面的敌对行动。

苏联在南部非洲没有特殊的利益。我们只希望一点：让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最终有可能在和平与稳定的条件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和决定自己的国内事务和对外事务。

拉丁美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在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方面我们也遵循同样的普遍原则。这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巨大潜力的大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十分向往美好的未来，他们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努力争取实现自己的希望和宿愿。通向自由之路永远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是我们相信，拉丁美洲争取进步的运动将会发展。

右翼集团和支持它们的美国宣传机器把我们对拉丁美洲的关心说成好象我们想在那里进行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派胡言！这根本与我们几十年来的行动对不上号。这不符合我们的理论、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整个对外政策构想。

我对里根总统说过：你们几十年来把拉丁美洲看成是自己的后院，在那里为所欲为。各国人民对此再也不想容忍了。他们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通过和平方式还

是非和平方式，这应由他们选择。你们使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欠下巨额债务，这就等于在这个大洲埋下一枚炸弹。这正是应当考虑的问题。

美国统治集团可能了解这一点。但是，不想承认这一点，因为那样的话就得改变政策。所有的人也都将看到，声名狼藉的“莫斯科之手”的说法是个弥天大谎。

我们确实同情拉丁美洲国家为在各个领域确立自己的独立，为摆脱新殖民主义的各种束缚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不掩饰这一点。我们高度评价墨西哥和阿根廷积极的对外政策，它们对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采取的负责态度，它们对“六国倡议”的贡献。我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为调解争端所作出的努力、中美洲国家首脑的倡议和危地马拉协定，欢迎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政权的民主化进程，理解该大洲国家为维护和加强国家主权而日益团结的行动。

同时我想就此强调指出：我们在该地区不为自己谋求任何好处。我们既不需要那里的原料，也不需要那里的廉价劳动力。我们无意利用反美情绪，更不想助长这种情绪。我们不抱破坏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间传统联系的目的，因为这种做法是冒险主义，而不是政策。我们不是冒险家，而是现实主义者。然而，当某个国家的人民为获得自由与独立而斗争的时候，我们将永远同情他们。对此不要产生误解。

不要对抗，而要合作

我确信，人类已经进入了大家互相依赖的阶段。不能把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分开，把一国人民同另一国人民分开，更不能使这些国家和人民对立起来。在共产主义语汇中这叫作国际主义，然而这与全人类价值观念是一致的。

西方统治集团最终也得考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问过美国政治活动家加·哈特：难道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就不能奉行与今天的政策不同的另一种政策吗？美国为建设国家间的新关系能够做很多事情，而且在经济方面不会有任何损失，相反，只会获得好处。为什么美国拒绝这样做，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

许多事情取决于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立场，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否解开当代世界许多问题的结子和解除对发展潜力的限制。如果能建成以平等和考虑各方利益为基础的新型关系，那么为什么还需要作为奉行扩张主义对外政策的工具而建立起来的战争机器呢？

这个机器是在几个世纪内形成的，要消除它不那么容易，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非要消除这个机器不可的阶段，因为生活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几十亿人希望过人应当过的生活。我确

信，在探索建立世界上新型相互关系的途径方面，美国和苏联能够做很多事情。

我们呼吁美国领导人与我们一起寻求解决“第三世界”各种问题的途径。除了强制手段以外，还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别的途径和方法。我们的建议都是切实可行的。美国应当寻求一种可能性，把自己的实力、自己的资本和现在用在军事目的上的一切用于别的目的，用于解决当代世界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我相信，这是可能的，美国能够使其他西方国家也参与此事。我再重复一遍，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损失，只会获得好处。

第六章

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欧洲

我想谈一点个人的看法。我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一次西方之行，是于1985年10月访问法国。在此之前大约一年，也就是1984年12月，我率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了英国。这两次访问促使我思考了许多问题，首先是欧洲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问题。

弗·密特朗当时谈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见解。他说：“为什么不能沿着实行更广泛的欧洲政策这条道路逐步……前进呢？”一年以后他又在莫斯科说：“应当使欧洲真正地重新成为自己历史的主角，使它在国际关系中能够充分地起到平衡和稳定因素的作用。”我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同两个西欧大国的领导人，同一些议员、政党的代表和实业界人士的直接接触，有助于更好地和更准确地评价欧洲局势。

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在我们的国际政策中，欧洲被列为主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希望，苏联领导

人对待西欧的立场能够得到大家的正确理解。

无论是代表大会前，还是代表大会后，我都同许多属于不同政治阵营的西欧著名活动家进行了会晤和交谈。这些接触证明：西欧国家也关心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我国在它们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历史的遗产

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欧洲有这样的意义呢？西方有些人企图把苏联“排除”在欧洲之外。有时似乎无意中就在“欧洲”和“西欧”两个概念之间划上了等号。

但是，这种诡计丝毫也不能改变现有的地理和历史现实。俄国同其他欧洲民族和国家的联系——贸易联系、文化联系和政治联系——是源远流长的。我们都是欧洲人。基督教把古罗斯同欧洲联系起来。1988年将纪念基督教传到我们祖先的土地上1000年。俄国历史是伟大的欧洲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摩尔达维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卡累利阿人以及我国的其他民族都对欧洲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不小贡献，所以他们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它的合法继承人。

我们整个欧洲的历史是复杂的，也是有教益的，是伟大的，也是悲剧式的；这部历史是值得研究并从中吸

取教训的。

战争自古以来就是欧洲历史的里程碑。在20世纪，这个大洲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这是自古以来人类所知道的流血最多和毁灭性最大的战争。我国人民为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解放斗争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牺牲了2000多万苏联人。

我们提这一点完全不是为了贬低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苏联人尊重反希特勒同盟的所有国家和抵抗运动的参加者为粉碎法西斯恶魔所作的贡献。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意见：似乎苏联“仅仅”是在1941年才加入了同纳粹德国的交锋，而在此之前其他国家就同希特勒进行“一对一”的搏斗了。

当玛·撒切尔对我发表这种意见时，我反驳了她，提醒她说，苏联从1933年起就同法西斯进行了政治斗争，而从1936年起就进行了武装斗争，对西班牙共和政府进行了援助。至于谈到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的含义常常被我们的论敌所曲解，如果当时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同苏联合作反对侵略者的话，象其他许多条约一样，这个条约本来是可以不签订的。

是谁把捷克斯洛伐克送给纳粹分子瓜分的呢？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去以后说，他给英国人民带去了和平，但是实际上全倒了个个，他带去的是战争。这首先是因

为，在英国统治集团的头脑中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把希特勒引向东方，引向苏联，如何压倒共产主义。

我不想把事情简单化，因为东欧国家也得到了一份不寻常的遗产。就拿俄国和波兰的关系来说，在几个世纪当中这种关系由于两国统治阶级的争斗变得复杂化了。波兰国王派波兰人打俄国人，而沙皇又派俄国人打波兰人。战争、暴力和掠夺毒化了人民的心灵，激起了相互之间的仇恨。

社会主义意味着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多世纪历史上的一个深刻转折。粉碎法西斯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欧国家中的胜利，使该大洲出现了新的形势，在这里形成了以制止接连不断的武装冲突为目的的强大力量。所以欧洲各国人民已经有40多年没有经受战争了。

同时，欧洲仍然是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政治对抗和军事对抗的舞台。某些人认为欧洲的分裂起源于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对在那里签订的历史性协定提出疑问。这完全是颠倒黑白。

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奠定了欧洲战后结构的基础。这两次会议的生命力就在于，这是反法西斯的和实质上是民主的会议。这两次会议规定取消希特勒的“新秩序”，而这个“新秩序”剥夺了许多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以及对自由和自主的希望。

旧的政治思维的逻辑导致了欧洲划分成两大对立的

军事集团。西方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共产党人分裂了欧洲。那么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呢？杜鲁门主义又怎样呢？是那些瓦解反希特勒同盟的人，那些策划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的人，那些建立北约集团作为欧洲军事政治对抗的工具的人为从政治上分裂欧洲开了个头。应当再提醒一下，华沙条约是在北约成立以后缔结的。

由于北约的过错，欧洲再次被套在这回是装满核弹头的军国主义战车上。今天，那些把欧洲变成了导弹核对抗的场所，要求重新划定欧洲国家之间的边界，改变领土政治现实的人，应对欧洲分裂的加深负主要责任。

我们不止一次地建议解散军事集团或者至少先解散两大联盟的军事组织。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只有尊重这种现实。但是，我们认为，即使在保留军事集团的情况下，也应当开辟一条通往美好世界之路，通往在某个阶段能导致解散所有军事集团的国际关系之路。

在战后的欧洲，曾经出现过不少次非常紧张的局势和转折。但是，欧洲国家还是根据具体条件和自己的可能以各种方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些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些国家则走向了社会主义。只有承认和尊重这种现实，才可能制订出真正的欧洲政策和组织起全欧进程。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传统看法：似乎欧洲注定要

有集团之间的对抗，要准备相互之间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促使整个欧洲、美国和加拿大参加赫尔辛基会议的倡议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不赞同上面说的那种前途。在赫尔辛基通过的最后文件指明了在和平的平等基础上实现欧洲团结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然而，在芬兰首都举行的这次著名会议所产生的动力，在第二次“冷战”刮起的阴风之下开始消失了。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已经谈过不少，现已无需多谈。作为自我批评，我只谈其中的一个原因，这就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地位受到了削弱。这再次从反面证明，恰恰是社会主义才能在遏制反对缓和的人和实现所有欧洲国家之间在关系正常化方面起主要作用。只要社会主义国家一放松，军国主义、实力政策和帝国野心就会重新抬头。

现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再一次采取了主动。在加强社会主义的同时，我们正使赫尔辛基进程具有更大的力量和生命力。该是最终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的时候了。这就是只有在西方不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东方或者东方不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西方的情况下，现有的障碍才能得到克服。应该通过共同的努力使事情从对抗和军事角逐转到和平共处和互利合作的轨道上来。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我们的大洲才能成为一个整体。

欧洲——我们共同的大厦

我好象是在一次谈话中想到这个形象说法的，似乎是偶然说出来的，但是我早就在思索这种提法了。这种提法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尤其是在会见了欧洲的许多活动家以后形成的。

按照新的政治思维，我就不能再用老眼光去看待五颜六色的欧洲政治地图了。欧洲经历的战争、流的眼泪已经够多了，它已经吃够了苦头。只要纵观一下这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的全貌，思考一下多种色彩的，实质上却是统一的欧洲文明的共同根源，就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集团间的对抗是相对的、暂时的，“铁幕”的说法已经过时。显然，关于欧洲是座共同的大厦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于是这一提法在需要的时候就脱口而出。

后来这个提法象是有了独立的生命，并上了报纸。也听到了一些人的指责，说什么这个提法太抽象，太空洞。于是我决定完整地阐述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适当的时机出现了——我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恰好处于欧洲的中心。这使我在布拉格的公开讲话中有了谈“欧洲问题”的机会。

欧洲的确是我们共同的大厦，在这里，地理和历史把几十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当

然，其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各自的问题，都希望按自己的方式生活，都希望坚持自己的传统。

因此，可以再打个比喻：欧洲是座共同的大厦，而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房子，各家有各家的大门。但是，要保护好这座大厦，使之免遭火灾或其他灾难，使之更舒适、更安全，保持大厦中应有的秩序，欧洲人就只能共同作出努力，遵守公共生活的各项合理准则。

有人可能以为这只不过是美好的幻想。然而这不是幻想，而是认真分析欧洲形势之后得出的结论。如果说世界需要新关系的话，那么欧洲就尤其需要。可以说，欧洲人民饱经忧患，他们理应得到这种新关系。

“全欧大厦”这个概念首先意味着承认某种整体性，虽然这里说的是社会制度各异并分别属于对立的军事政治联盟的国家。这个概念中既包括必要性，也包括可能性。

必要性：全欧政策的要点

可以举出几个能说明需要有一项全欧政策的客观情况。

1、在人口非常稠密和高度都市化的情况下，欧洲的武器——核武器和其他武器——过于饱和。今天，只说欧洲是“火药库”已经不够了。用最现代化的、不断完

善的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在这里相互对峙着。这里集中了几千枚核弹头，虽然总共只要几十枚就足以使欧洲大地变成火的地狱。

2、对于欧洲来说，非但是核战争，即使是“常规”战争在今天也只能是毁灭性的。这不仅是因为现在“常规”武器的破坏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武器大好多倍，而且还因为在欧洲境内大约有核电站的200个机组、大量生产能力大的化工厂。在“常规”军事行动过程中摧毁这些项目就会使欧洲变得无法生存。

3、欧洲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欧洲工业化和交通运输发展的规模已经使欧洲的生态危险接近于临界点。这个问题已远远超出一国的界限，具有全欧规模。

4、欧洲的两个部分都在加紧进行一体化过程。该考虑一下今后将怎么做了。是为了分裂欧洲继续各搞各的一体化呢，还是为了东欧和西欧的幸福，以及为了世界其余部分的利益，把这两个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呢？欧洲两部分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科技进步促使人们去探索互利合作的某些形式。这不是指“欧洲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而是指更好地利用欧洲的全部潜力造福于居住在欧洲的各国人民，并在同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中利用这种潜力。

5、在欧洲的两部分之间存在着不少东西方方面的

问题，但是在解决北南极其尖锐的问题上欧洲的两部分却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东欧国家对西欧大国过去的殖民主义政策负有责任。但现在说的是另一回事：忽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命运，不重视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这样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无论对欧洲还是对全世界，都孕育着灾难性的后果。① 不管是西欧国家，还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与“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广泛的联系，并且本来都可以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作出共同努力的。

由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利益和需要所决定的全欧政策的要点基本上就是这些。

欧洲的有利条件

现在谈谈作为“共同大厦”居民的欧洲人采取行动的有利条件和前提。

1、欧洲各国人民拥有两次世界大战最沉痛的教训。不容许发生新战争这种意识已历史地铭记在他们的心中，这种意识比任何人都强烈。反战运动恰恰在这里最广泛，最有威望并波及到一切社会集团，不是没有原

① 在这方面，我们赞同“勃兰特委员会”关于北南问题的报告以及社会党国际在维利·勃兰特和迈克尔·曼利领导下起草的《全球性挑战》报告的精神和目的。

因的。

2、从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来说，欧洲的政治传统是最丰富的。一系列欧洲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正确。政治上的“结识”更广泛，时间更长，因而也就更接近。

3、任何地方都没有象欧洲这样在全欧范围内有一个实际上是在各个级别进行双边和多边会谈、磋商、签订条约、接触的全面系统^①。欧洲拥有赫尔辛基进程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史上独一无二的成果。斯德哥尔摩会议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果。后来，维也纳会议又接过了接力棒，我们希望维也纳会议今后在发展赫尔辛基进程方面也将迈出新的步子。这样，兴建“欧洲共同大厦”的蓝图实际上已经准备就绪。

4、欧洲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力量雄厚。这种力量是分散的，欧洲东西两部分之间的排斥力大于吸引力。然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可预见的前景是：已有可能找到某种方式把欧洲两部分的经济进程结合起来，以便为所有国家造福。

这就是欧洲物质文明继续前进的唯一合理的途径。

5、“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是一个由复兴时

^① 也存在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群体，它的历史前提和特点却与欧洲的不一样。

代和启蒙时代、19世纪至20世纪伟大哲学和社会学学说的共同遗产联合起来的历史文化整体。这是一块使政治家有可能在国家关系中找到相互谅解与合作途径的强大磁石。

在欧洲文化遗产中蕴藏着和平与睦邻政策的巨大潜力。总之，在欧洲，能扭转局面的思维比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任何其他地区具有更良好的基础。

我可以毫不隐讳地说，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不仅东欧，而且连西欧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中包括政治观点同我们根本不同的活动家，都理解“欧洲共同大厦”的主张。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根舍表示愿意“接受欧洲共同大厦的构想并同苏联一道为使这座大厦成为真正的共同大厦”而工作。西德联邦总统里·冯·魏茨泽克、意大利外交部长朱·安德烈奥蒂和其他活动家在同我交谈时都本着这种精神发表了看法。就是说，对欧洲文化具有共同性、欧洲各国命运相互联系和互为依存、各国迫切需要合作这几点的认识，在人们的头脑中并没有消失。

但是，有些思想家和政治家还在继续散布对苏联的不信任。继美国之后，大多数西欧国家都发表了不少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文章，而法国右翼报纸则一如既往尤其卖力。欧洲形势改善的前景简直使法国右翼报纸胆战心惊。就以法国《快报》周刊为例来说吧。这家周刊1987年

3月6日硬说我们企图建立对欧洲的统治。用惹人注目的标题《戈尔巴乔夫和欧洲》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是按照著名童话《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格式写成的。

我常常想：难道欧洲读者、欧洲各国人民会幼稚到相信这类胡编乱造的东西吗？我们相信欧洲人的健全理智，相信他们最终将学会区分真理与杜撰。看来，如果从已经公布的民意测验材料判断，西欧的大多数人都会对苏联奉行的结束欧洲长期存在的争论的公开的欧洲政策作出应有的评价。

两个德国

在思考欧洲共同大厦的构想时，不能不谈到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中部形成的局面的态度。现在欧洲中部存在着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里·冯·魏茨泽克进行过相当详细的交谈。

他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真地听取了“欧洲共同大厦”这个提法。我问：你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怎样理解这一点的呢？我不妨在这里转述一下我们接着进行的一段简短对话：

里·冯·魏茨泽克：这是一个方向，它能帮助我们想象出在这个欧洲大厦里应当出现一种什么秩序。特别

是大厦里的各家各户究竟会怎样互相走访。

米·谢·戈尔巴乔夫：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只是并非每个人都喜欢深夜来客。

里·冯·魏茨泽克：我们也不大喜欢一条鸿沟把大客厅分隔开。

他暗示这样一个事实：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被一条国际线分开，特别是这条国际线穿过了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的历史现实就是如此。

如果德国全面执行波茨坦协定，现在的情况会如何呢，怎样猜测都可以。除了波茨坦协定，不存在别的统一的基础。但是，不仅当时的美、英、法领导人暗中破坏与我们达成的协议，而且西德热衷于实力政策的人也反对波茨坦协定。对于他们来说，波茨坦协定是一场“恶梦”。结果是明摆着的。

有人说什么“德国问题”悬而未决，“东部领土”尚未确定，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不合法”，这当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众所周知，这些议论在联邦德国并不罕见。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有关恢复“德国统一”的声明，用德国人的话说，这根本不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的话。40年来它没有给联邦德国带来任何好处。支持恢复“德国在1937年时的国界”的幻想，就意味着破坏邻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对联邦德国的信任。

无论里根和其他西方领袖对此讲过什么，他们实际上在所谓德国问题上不可能向联邦德国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建议。历史上在这里形成的东西还应让它作为历史保留下来，其中还包括有关德国民族、有关德国人的国家存在形式问题。

现在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存在着两个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德国。它们各有各的价值观。它们都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它们都能对欧洲和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100年后将会怎样，那要由历史来决定。而现在则应从业已形成的现实出发，不要再进行挑拨了。

这里我要插上一段我对魏茨泽克谈过的一件往事。1975年战胜法西斯30周年的时候，我正在联邦德国。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汽车加油站，我与该站的主人攀谈起来。他对我说：“斯大林说过：希特勒分子是匆匆过客，而德意志民族是永存的。但后来，战争结束后，苏联征服并分裂了德意志民族。”

于是就辩论起来。我提到了丘吉尔和美国政治家们早在战争期间就拟定了分割德国的计划。我们反对这个计划，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主权的、民主的德意志国家。我还提到，西方大国支持在西德建立单独的国家，只是到后来才出现了民主德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之后，我们主张在肃清纳粹主义、民主化和德国非军事化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主权的和首先是和平的德意志

国家。但是，西方出现了一种势力，它们把事情搞成了目前这种状况。因此，在分裂德国问题上苏联没有过错，应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罪人。目前存在着两个德国，这是国际条约公认的现实。任何一位现实的政治家只能尊重它。

这就是我们谈话的内容。

经受了这场可怕战争的苏联采取了原则性立场。我们没有改变现实主义态度。我们没有把德国人民与纳粹政权混淆起来。不能把希特勒侵略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归罪于他们。

在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中，我们考虑它的潜力和可能性，它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它的政治作用。历史要求我们以应有的方式相互对待。没有我们两国的积极配合，欧洲的建设是不可思议的。联邦德国与苏联的关系的可靠性将具有真正历史性意义。两国留在各自的体系和联盟中仍然能够对欧洲和世界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苏联关心联邦德国的可靠安全。如果联邦德国不稳定，那也别指望欧洲有稳定的局势，也就是别指望世界有稳定的局势。联邦德国与苏联之间的稳定关系能够使欧洲的局势明显好转。

欧洲与裁军

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中所谈的一切都与欧洲有直接的

关系。我们在与美国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忘记欧洲的利益。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我与北约的许多西欧国家的政府首脑举行了会晤，有丹麦的保·施吕特、荷兰的吕·吕贝尔斯、挪威的格·哈莱姆·布伦特兰、冰岛的斯·赫尔曼松、意大利领导机构代表人物阿·范范尼和朱·安德烈奥蒂。我们对《欧洲与裁军》这个题目谈了很多。

我从与我交谈的人那里听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而后苏联领导人认真考虑了他们的论据和主张，对其中正确的东西，在我们的政策中给予重视，特别是有关欧洲导弹问题。但是也有争论，与玛·撒切尔和雅·希拉克的争论特别激烈，在这些问题上以及在整個北约“核遏制”观念上都进行了争论。我向他们说，我对某些西方国家首都对雷克雅未克会晤惊慌失措感到惊讶。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次会谈的结果看成是对西欧安全的威胁，这是某些人的错觉。这种结论和评价是“冷战”时期旧思维的结果。

在与外国活动家交谈时，有时我直截了当地问：你们是否相信苏联打算进攻你们国家，进攻整个西欧？几乎所有人都回答说：不，不相信。但某些人却有保留，他们说，苏联拥有巨大军事实力这一事实本身在“客观上”就造成了潜在威胁。这没有什么，这种论调还是可以

理解的。然而最令人费解的是：他们把一个国家的威信和国家强大同拥有核武器联系在一起，尽管知道，一旦爆发核战争，它们的武器只会引火烧身。这种论点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当话题涉及到裁军这个建设全欧大厦所必需的和刻不容缓的设计方案时，我们自然首先注意到欧洲核大国——英国和法国。苏联同意在当前的裁军谈判中不考虑它们的核潜力，表现出了对西欧的巨大信任。我们迈出这一步的主要动机是，我们甚至在思想上，更不用说在战略打算上，排除了与英国或法国作战的可能性，尤其是排除了与欧洲非核国家作战的可能性。

有人对我们的建议散布种种说法，说什么莫斯科是不是想搞什么骗局，是不是想分裂北约，使其丧失警惕，然后再把西欧踩在脚下，于是又开始咒骂无核欧洲的思想，说这是有害而危险的思想。我公开地对这些活动家说：“先生们，你们怕什么？难道现实地评价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展开的真正历史进程就那么困难？难道你们就这样不能理解这一进程与对外政策中的真正善良愿望有着客观和不可分割的联系？”

是该消除有关苏联具有侵略性的臆想的时候了。只要我国和我们的盟国不成为北约进攻的对象，在任何情况下我国都永远不会对西欧采取军事行动！我再说一遍，永远不会！

但愿西欧尽快摆脱强加给它的对苏联的恐惧。但愿能考虑到：消除欧洲核武器就会不仅对西方，也对我们形成新的局面。我们不能忘记，在核世纪之前，我国领土遭受过来自西方的侵略，而且不止一次。北约在军事演习中总是演练进攻方案，这一事实本身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我们认为，希腊、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瑞典、芬兰等许多欧洲国家为解决欧洲导弹问题发出的呼声是一个具有很大政治重要性的因素。

西方常谈到不平等、不平衡。的确，在欧洲，双方在某些种类的武器和武装力量上是不平衡、不对称的，这是由于历史、地理及其他因素造成的。我们赞成消除在某些方面已产生的不相等，但不能靠落后的一方赶上来，而应靠走在前面的一方退回去。

这方面有许多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削减并最终消除战术核武器，同时根本削减军队和常规武器；使进攻性武器脱离直接接触，以便排除突然袭击的可能；改变武装力量的整个结构，使它只具有防御的性质。我在布拉格群众大会上讲过这些。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建议在华约国家的布达佩斯纲领中已经阐明。

华沙条约国1987年5月在柏林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所宣布的自己的军事理论，是本着新思维精神作出的极为重大的信任举动。这一理论的全部内容都完

全是防御性的。

采取建立无核区、无化学武器区这样一些建议也会有助于巩固欧洲安全的目的。我们支持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在中欧建立无核走廊的建议。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对提出这一思想作出了贡献。我们愿意保障和尊重这一地区的无核地位。我们认为波兰就削减中欧的军备和加强信任提出的折衷计划是及时的和有前途的计划。

我们认为，军备应该减少到合理的足够程度，即减少到只解决防御任务所必需的程度。是该对两个军事同盟的战略观念朝着防御方面作必要修改的时候了。在“欧洲大厦”中，每一个住户都有权防盗，但是这种做法不能损害邻居。

全欧合作

“全欧大厦”的建设需要物质基础——在各个领域进行事务合作。我们苏联愿意这样做，包括探索协作与合作的新形式，包括建立合资联营企业，在“第三国”实施联合方案等等。

我们提出广泛进行科学技术合作问题，绝非因为自己是提不出任何交换方案的乞求者。遗憾的是，恰恰在这方面会出现主要是人为的障碍。比如有人说，这涉及

到具有战略意义的“敏感技术”。所谓“敏感技术”，首先就是指电子技术。但是，现在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先进的工业生产领域不采用电子技术。

为西欧实现技术飞跃提供可能性的不是军国主义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技术进步开辟道路的不是宇宙军事化。这纯属鼓吹技术帝国主义的蛊惑性宣传。有不少进行和平的科学技术合作的途径和项目。已经有了在利用“韦加”太空探测器研究哈雷彗星方面共同工作的经验。在实现这个方案的时候，搞出了新的结构材料，在无线电电子学、控制系统、数学和光学等方面有了发现。朱·安德烈奥蒂提出的“全世界实验室”的主张是有远见的。这个崭新的国际研究方案看来已经有了实际轮廓。

共同开发热核能源已排上了日程。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在苏联科学界提出的主张的基础上所做的工作已经为此奠定了科学基础。当然，美国科学界也可以参加这项工作。今后还有可能共同研究和开发宇宙、太阳系行星、超导问题和生物工程学。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加强欧洲国家的互利依存。而这种依存对双方将是有益的，可以加强责任感和自我克制能力。

本着合作的精神，可以在所谓“人文领域”这个广泛的领域做许多事情。苏联建议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人

文合作会议能够成为这方面的重要里程碑。会上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不仅涉及东方，而且涉及西方的各个方面，包括人权的多方面问题。这将再次有力地推动赫尔辛基进程。

可是，在这方面却出现了有意思的事。我们刚提出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谈一谈人权，在彼此公开的情况下比较一下我国人民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实际上生活得怎么样，资本主义国家就好象紧张起来，并且坚持只讨论个别人员的问题，回避讨论这个题目的所有其他方面。

在同外国活动家和外国代表团谈话时，我曾公开说过，我们愿意本着人道的精神讨论个别事件，但是坚决主张就整个这个问题坦率而广泛地进行交谈。

总的来看，可以说，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和竞赛关系可能并实际上对双方都有好处。欧洲中小国家都可能为这项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们同冰岛前总理赫尔曼松、同荷兰首相吕贝尔斯、同瑞典首相卡尔松以及其他国务活动家都谈过这个问题。

欧洲新思维的萌芽

我觉得，最近，特别是雷克雅未克会晤以后，西欧迫切地感觉到必须为欧洲形势健康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欧洲人已经为净化世界的

政治空气做了许多工作。

我想，如果我提到我从阿·范范尼那儿听到的下面这件事，大概不算是泄露什么机密。他对我讲过他同世界著名电影导演爱德华·德·菲利普的一次谈话。他们谈到复杂的国际形势，德·菲利普问：“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据范范尼说，他的回答是：“指望上帝。”德·菲利普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说：“让我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不给上帝造成障碍吧。”

这就是大家都对世界命运负责的看法，这种看法现在特别必要而宝贵。应当对这些西欧政治家作出应有的评价，因为他们意识到雷克雅未克会晤奠定的基础需要所有欧洲人共同努力来维护。

在西欧，我们今天亲眼看到了新思维已在国际事务中萌芽。在统治集团中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西欧许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在防御政策和安全方面确定新的立场。我们认为它们的领导人都是一些在世界性问题上具有远见的成熟的政治家。

在1985年访问法国前夕，法国记者曾请我谈谈我们同欧洲社会民主党政府建立的关系的性质。我说，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最近几年我们积极地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谈话在我同外国活动家的会晤和谈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我接见了以卡·索尔萨为首的社会党国际咨询委员

会，会见了万·布兰德、埃·巴尔、费·冈萨雷斯和其他社会民主党领袖，而每一次我们都确认我们对国际安全和裁军的迫切问题的观点是相近的或吻合的。很遗憾，我没有机会认识奥洛夫·帕尔梅，他不幸遇难使我们大为震惊。奥·帕尔梅提出并由国际“帕尔梅委员会”加以发展的“大家都安全”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的全面安全构想颇为相近。

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开始进行的对话绝不意味着消除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抹掉目前存在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互相指责说；参加对话的某某人丢了面子或者被对方踩在脚下。经验表明，这样的危险是不存在的。

我们同联邦德国、芬兰、瑞典、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同英国工党，西班牙社会党等政党有着良好的关系和有益的接触。我们珍重这种关系和接触。总之，我们愿意同一切关心克服世界形势发展中危险趋势的力量进行合作。

但是我认为，欧洲对和平与安全事业的贡献本来可以更大一些。现在许多西欧国家领袖都缺乏政治意志，也许还缺乏能力。但是，现实生活终究会使人们现实地评价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关于欧洲和美国

应感到遗憾的是，北约一些国家的政府，其中也包括那些在口头上表示要同美国极端危险的政策划清界线的人，最后还是在压力下屈服了，从而将承担加剧军备竞赛、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责任。

下面就是一个具体事例。1986年4月，美国空军轰炸了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利比亚领土上的其他设施。这是在经不起文明社会的任何批评的借口下进行的直接侵略活动。美国飞机从英国的基地起飞，途经西欧国家领空。而西欧怎么样呢？北约一些国家的政府实际上面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沉默，没有决心制止美国的这次侵略行动。我当时对瑞典首相说（我们的谈话是在得到美国轰炸利比亚的消息几小时以后进行的），这种立场使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侵略者的“绥靖”政策。万一美国军方“想要”用轰炸来惩罚某一个华沙条约缔约国，那怎么办？又是“溜掉”吗？要知道这就是战争啦！在我们这个核时代，所有人的责任都无可估量地增加了。

古希腊人有一个攫取欧洲的神话。这个童话故事的情节出人预料地具有现实意义。当然，欧洲从地理概念上说没有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形成一种印

象，西欧国家的自主政策被掠夺并且被送往大洋彼岸。在保卫安全的借口下，民族利益被收买。

欧洲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从大洋彼岸蜂拥而至的“大众文化”。我们理解西欧知识界对这个问题的忧虑。确实，当内容深刻的充满思想性和人性的欧洲文化被愚昧低级的暴力和淫秽作品、廉价的感情和庸俗的思想所取代的时候，只能使人觉得奇怪。

当我们强调欧洲自主立场的意义的时候，常常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想离间西欧和美国的关系。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这种意图。我们无意于忽视或低估西欧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历史关系。把苏联的欧洲政策看作某种“反美主义”，这是荒谬的。我们不打算在外交方面走钢丝，也不想在国际关系中挑起混乱。这同我国对外政策的主旨——促进稳定而持久的和平，使它建立在各国之间互相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关于“全欧大厦”的设想绝不意味着把谁拒之于门外。的确，我们不希望有谁一脚踹开全欧大厦的大门并且喧宾夺主地坐在主人的座位上。但这是房间的主人关心的事情了。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积极接受美国以及加拿大参加赫尔辛基进程。

欧洲的责任

我们谈的是欧洲特有的作用，但这丝毫也不是贬低

其他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作用和意义。

欧洲进程的成功将有利于它为世界其他地区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欧洲不应该回避，而应该参加解决饥荒、债务和不发达问题，促进消除武装冲突。

欧洲各国人民无一例外地都赞成在欧洲创造睦邻与信任、共处与合作的气氛，这是无可怀疑的。从广义上说，这是新的政治思维的胜利。欧洲可以作出应有的榜样。世界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它向何处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的政治立场。

无论是在世界政治中，还是在世界发展中，任何人都不能取代具有巨大潜力和丰富经验的欧洲。欧洲的作用能够也应该是建设性的、创新的和有益的。

第七章

裁军问题和苏美关系

早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就对美国的历史感兴趣，我读过不少美国作者写的书，还一直注意我们两国关系的状况。两国关系的起伏是很大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结盟到40—50年代的“冷战”，从70年代的缓和到80年代初的明显尖锐化。

从对我们有转折意义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到这本书问世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包括同苏美关系有直接关系的事情。

现在我们同美国保持着对话。我和美国总统时常有书信来往。我们两国代表在会谈中经常讨论真正重要的问题。

最近一两年我们两国在科学和文化合作这样一些领域的联系稍微松动了一点。现在各级都在讨论的问题过去只是用来互相指责。甚至在新闻工作方面也有了明显的接触，新闻工作不应该再宣传暴力和敌视，不应该再

干涉内部事务。

不管怎么说，“冰层已移动了”，但两国关系正在进入某个较平静的和建设性的时期吗？我希望这个进程能继续下去。但是如果说已经取得了某种明显的结果，那不是真实情况。关心实际改善苏美关系，就需要诚实地评价苏美关系的现状。好的变化，即使是有，也是非常缓慢的，过去那些站不住脚的观点还经常压倒更新苏美关系的现实需要。

现在，科学技术革命、信息技术使人们接近了。可以利用这个进程来增进相互了解。但是，它们也可以被用来使人们疏远。不知为什么迄今为止还有人喜欢这么干，尽管由此造成了损失，而且是巨大的损失。世界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限度：该想一想怎样生存下去了，我说这样的话既是针对美国，也是针对苏联。如果象过去那样继续下去并且不作任何改变，那么很难预言，10、15、20年以后我们会在哪里。我认为，为我们两国的前途，为整个文明社会的前途担忧的感情不断增长。这种感情不仅在苏联人民当中，而且在美国人民当中都不断增长。

我从来不同意说（不论谁对我说什么）美国人民对苏联怀有敌意。我不能同意这一点。大概有人喜欢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紧张、对抗或者尖锐地角逐。也许有人从中能够得到点儿什么。但是，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两国

人民重大的、广泛的利益。

我们反复考虑，应当做点什么才能使关系得到改善。两国人民需要这样做。要知道我们在这方面不仅没有向前迈进，比如说，从70年代中期以来就没有进展，而且当时所做的许多事情甚至被破坏了。不仅没有前进，而且相反。我们说，美国人有过错。美国方面说，苏联有过错。可见，应当搞清楚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因为应当从过去，其中也包括从我们两国关系的过去吸取教训。这是科学，是严肃的科学，是责任重大的科学，当然要站在真理的立场上。现在还是需要更多地想一想，将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样共同生存，怎样合作。

我同美国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有过许多次会晤。这有时使我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但是每一次我都努力找出时间来进行这种会晤。同时我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仅是阐明我国政策、我们世界观的意义，而且我还感到，要更好地理解 and 弄清楚美国人的思想趋向，更充分地了解，美国的问题和美国政治进程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不这样不行。因为科学的政策应该建立在认真地考虑现实的基础上。如果陷入意识形态的无稽之谈，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朝着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我们之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是不够的，甚至尊重也不够。某些势力在这方面搞了许多名堂，形成了许多妨

碍合作的观念，阻挡着发展合作的道路。

战后时期苏美关系的历史不是这本书的主题。但是，逐个想一想就在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就会看到，成见和不愿接受新事物起了多么不好的作用。1987年夏初在会见美国前总统詹·卡特的时候，我曾诚恳地对他说，我们绝不认为他担任总统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是消极的。不，也有许多积极的东西。比如说，我指的是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条约即使没被批准，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尽管美国政府奉行目前的方针。这个条约的精神仍存在。同时不能不说，也错过了许多机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80年代初，在反卫星武器、武器贸易、限制印度洋的军事活动及解决近东问题这样一些方面，离达成重要协议，如常言所说已近在咫尺了。十年过去了，浪费了多少时间，军备竞赛用了多少资金，断送了多少人的生命！

我们期待美利坚合众国的是什么？

1985年8月底，我在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时说：我们两国决不能让事情发展到对抗的地步。这是苏美两国人民的确关心的事。必须用现实政策来表明这一点。必须停止军备竞赛，实行裁军，把苏美关系纳入正常轨道。老实说，已经到了使两个大国人民的这种关系

无愧于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的时候了。要知道，世界的命运，世界文明的命运的确取决于我们的关系。我们愿意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我们应该学会在现实世界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的利益，也有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安哥拉、阿根廷等其他国家的利益，有波兰、越南、古巴的利益，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利益。不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剥夺各国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即使人民选择错了，也应该让他们自己找到出路。这是他们的权利。

我同许多美国人，包括1987年春天在莫斯科同乔·舒尔茨交谈时都谈到了这一点。谈话的内容是广泛的，但是我的话题贯穿着一个想法：让我们一起试试在现实世界上生活，让我们考虑到双方的利益。而这就不能不考虑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只从苏联和美国的利益出发，就不能形成国际关系。需要有平衡。

在每个历史阶段这个任务都会以新的方式出现。利益在变化，平衡也在变化。这样也就需要新的态度。我再重复一遍：如果在20世纪末还站在以丘吉尔的富尔顿讲话和杜鲁门主义为基础的立场上制订政策，那就危险和有害了。早就该认真地着手重新调整苏美关系了。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应当改掉发号施令的习惯。任何国

家，不论是苏联、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能把世界或者世界的某一部分看作是剥削的对象，哪怕打着“民族利益”的旗号。

把关系建立在强制、暴力和发号施令上的做法，现在已经很难行得通了。将来这也绝对是不可能的。理解新现实的意义的过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时间和大家的努力。但是既然开始了，这个过程就应继续下去。我们应该学会互相听取和理解对方的意见。我对乔·舒尔茨说，我们主张同美国互相协作，建设性地互相协作，因为苏联和美国所承担的责任任何人都代替不了。

我回想起同美国前总统理·尼克松的一次谈话。尼克松说起温斯顿·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我希望这不是有先见之明的话：科学如果插上闪光的翅膀，世界就可能回到石器时代，并强调指出，我，也就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及里根总统和后来人需要作出有利于和平的未来的历史性抉择。

当时我对理·尼克松说，有一天我看了一部介绍美国旅游者游览伏尔加河影片。银幕上有我国公民和美国人。可是却不容易分清，谁是美国人，谁是苏联人。人们兴致勃勃地聊天，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在友好地交谈，能互相理解，而政治家就缺乏这一点。

不仅政治家交谈，两国人民的直接代表也交谈，这

很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欢迎这种做法。让苏联人和美国人多见面，让他们所有人都彼此形成对对方的亲切印象。交往，人们的直接交往，这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交往，如果没有各国人民之间广泛的交往和相互了解，政策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我请理·尼克松注意，当今世界最严峻的现实是，恰恰我们两国有庞大的军火库，包括核武器库。我对他说，如果我们在错误的前提下制订对对方的和对世界其他所有地区的政策，事情就可能发展到对抗的极点，就会不仅给苏联，给美国，而且给整个世界都造成最悲惨的后果。

今天我还打算重复一遍这次谈话中所说的话：在苏联社会，不只是在领导人当中，形成了一个坚定的愿望，那就是寻求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寻找和扩大共同点，以便最终实现友好关系。这个目标目前可能显得过高了，但是我们相信，应该作出的正是这种选择，因为否则就不能想象，我们向何处去。

或是好转，或是恶化，政治是没有假定式的。历史的进程不能预先排演，也不会重演。因此，认识历史进程、历史教训就更加重要了。

美国是“山顶圣城”吗？

我们所听到的歪曲我国的说法和反苏的陈词滥调太

多了，因此我们对有意无意的谎言所造成的罪恶了解得太清楚了，所以不能只用黑白两种颜色来看待美国。

我知道，美国的宣传，是的，是宣传，总是极力把美国形容成“山顶圣城”。

美国有伟大的历史。谁能对美国革命在人类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或者美国的科学技术天才，它在文学、建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提出异议呢？所有这一切美国都有。但是在今天的美国也有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和别的问题，美国社会暂时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且更糟的是，他们寻找问题往往找的不是地方，甚至使别人感到不舒服。

在美国，一边是巨大的生产潜力和雄厚的物质财富，而另一边是千百万极端贫困的人。这就需要考虑考虑了。一边是以传教士的热情来宣传人的权利和自由，另一边是自己家里对保障这些最起码的权利漠不关心，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一边喋喋不休地谈论人的自由，一边又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大肆宣扬崇尚武力和暴力。这该怎么理解呢？陶醉于力量，而且是军事力量，不断增加军费，预算上出现赤字，有了内债，现在又有了外债。这是为了什么？是什么在推动美国？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试图分析美国的现实，力求找到导致美国政策变化的动因。

坦率地说，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我们没有得出

美国是“山顶圣城”的概念。然而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我们也并不认为美国是“万恶帝国”。同每一个国家一样，在美国的现实中既有光明，也有黑暗。美国实际是什么样，我们就把它看成什么样，我们看到，美国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见和看法，对美国社会也有多种多样的意见和看法。

苏联领导人不只从一个方面，而是认真地从各个方面来看待美国的：那里既有忙于自己的事情和自己所关心的事情、总的来说是爱好和平的千百万劳动者，也有有现实头脑的政治活动家，还有有影响的保守分子和与他们站在一起来的同军界工业界集团和军火生产“利润有关”的反动分子；既对我们表现出健康而正常的兴趣，也颇为盛行骗人的反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

我们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是美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由美国人民来决定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怎样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自己的政府。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主权。如果我们开始怀疑美国人民的选择，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政策应该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在理解每个国家的人民有权自主选择自己生活方式、自己政治制度的基础上。

美国是一个强国，我们要同它一起生存，同它建立关系。这是现实。尽管我们两国关系矛盾重重，但很显然，在保障和平方面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什么也做不成，

同样，如果没有我们美国也什么都做不成。我们回避不了美国人，美国人也回避不了我们。因此需要接触、对话，必须寻找改善关系的途径。

我们清楚地知道和懂得，美国有政府——白宫，还有国会。我们希望既同美国政府合作，也同美国国会合作。我们现在正在加深对美国政治进程的认识。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文职的国防部长和美国职业军人的看法不一样。对前者来说，许多东西都意味着做生意，意味着军事订货，而具有现实头脑的职业军人就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手里有什么和这可能给全世界带来什么。这种认识证明了军人的现实感和责任感。看来，使军人正确地了解现实的局势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补充一点，我们不打算根据美国国内政局的变化来同美国建立关系。今天是共和党人在美国执政，明天是民主党人执政或者仍然是共和党人执政。这没有特殊的差别。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有它的利益。我们将同执政的政府保持关系。美国的事情是美国人的事，我们的事情是我们的事。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性立场。

“敌人形象”

无论对国内的需要来说，还是对我国对外政策的利益来说，我们都决不需要把美国作为一个“敌人形象”。

只有想要保持紧张局势，想要进行会带来深远的，我补充一点，难以预料的后果的对抗，才需要有一个虚构的或现实的敌人。我们的目标并非如此。

至于我们，苏联没有进行仇恨美国人、不尊重美国的宣传。无论在我们的政策中，还是在教学中，在任何地方你们都找不到这种东西。我们批评我们不赞成的政策。这是另一回事。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尊重美国人民。

1987年夏天，我会见了一批来自美国的俄语教师，他们在列宁格勒见习了两个月。我们谈得很好，既诚恳，又热情。下面我就从速记记录中摘一小段。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这些日子里，你们遇到对美国人不尊重的事情了吗？

帕杜拉：没有。诚然，有一次，一个人在大街上问我：什么时候会有和平？我对他说，我希望很快就有和平。

米·谢·戈尔巴乔夫：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谈话。我相信，朋友们，在苏联的任何地方你们都不会遇到用不尊重的态度对待美国人的现象。是的，在任何地方。你们可能也看我们的报刊。你们可能找到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对某一个集团的声明和行动的批评、分析、看法和评论，但在任何报刊上都找不到对美国和美国人不尊重的地方。所以，尽管“赤色分子”在“前进”，但他们

是同你们一道走在全人类的道路上。

而在美国就有人“需要”把苏联当作敌人。否则就难以理解一些电影、美国从慕尼黑播出的教唆性广播以及充满对苏联人民的侮辱和仇恨的连篇累牍的文章和广播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40年代，也许更早。

我绝不认为，最近几十年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每一步都是完美的。我们也犯过错误。不过这些错误往往是由于对美国的行动，对其制订者称之为“推回共产主义”的那种政策作出的反应考虑不周造成的。

我们对于把苏联作为“敌人形象”的做法是敏感的，我不隐瞒，也是警惕的。尤其是，问题不仅仅在于所谓“苏联的军事威胁”、“莫斯科之手”、“克里姆林宫的阴谋诡计”这些惯用的意识形态手法和对我国内部事务非常消极的报道。我甚至不想说这类说法的荒谬性，但是不能忽视一个事实，这就是在政治中一切都是有它的目的的。因此，问题在于政治实践，政治实践不可能不抱有某种意图和打算。必须避免沙文主义在我们两国的各种表现，特别是考虑到这两个国家所拥有的力量。沙文主义可能给政策带来不能容许的因素。

痛心的、悲剧性的事实在于，苏美关系长期走下坡路。关系改善的短暂阶段被紧张局势和敌对情绪加剧的漫长时期所代替。我相信，现在已有扭转局势的全部理由，并且看来已经在取得某些进展。我们愿意竭力促使

局势好转。

为什么和什么人需要军备竞赛

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在给苏美关系造成负担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会不得出下面的结论：首先是军备竞赛。我不打算回顾军备竞赛的历史了。只想再一次指出，差不多在每个阶段苏联都是追赶的一方。到70年代初，我们达到了大致的军事战略平衡。但是，坦率地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水平。现在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拥有多次毁灭对方的能力。

看来，面对战略上的僵局，合乎逻辑的做法应是停止军备竞赛，着手裁军。但是却不然。本来已经饱和的武器库又继续补充新的更加精密的武器，在研制军事技术装备方面开辟了新的方向。而在这种即使不是毁灭性的，但也是危险的事情上，定调子的是美国。

如果我说苏联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使自己的国防保持在现代化的和可靠的水平上，那我并没有暴露任何秘密。这是我们对本国人民、对我们的盟国的义务。与此同时，我想十分明确地强调指出，这不是我们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强加于我们的。

美国人极力散布对苏联在裁军方面的意图的种种疑虑。但是历史证明，我们说过的话我们信守，我们承担

的义务我们履行。遗憾的是，对美国就不能这样说。美国政府对社会舆论做灌输工作，用苏联威胁来吓人。而当需要国会通过下一年度的军事预算的时候，就干得特别起劲。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美国在追求什么目的？

显然，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在有核武器的世界上，利用核武器来解决苏美之间存在的问题的任何企图都意味着自杀。这是事实。我并不认为，美国政治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此外，现在形成了十分反常的局面。即使一个国家不断装备自己，增加军备，而另一个国家什么也不干，装备自己的那一方反正从中得不到好处。弱的一方甚至可能干脆在自己领土上引爆自己的全部核武器，这对于它来说就意味着自杀，而对于对方来说意味着慢性杀害。正因为如此，追求军事优势就是追求荒唐的结局。它不应用到现实的政策中去。

美国不急于放弃的还有另一种幻想。我指的是想使苏联在经济上一蹶不振，不让它实现建设性计划的不道德打算，想使苏联在军备竞赛的泥坑中越陷越深。

我建议读者看一看战后几十年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是疲惫不堪了。是的，我们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胜利了，同美国以及反希特勒同盟其他成员国一起胜利了。但是在美国的领土上没有扔过一颗敌人的炸

弹，也没有听到一声敌人的枪响，而我们国家的大片领土却是激烈战斗的战场。我们的损失，无论人力损失，还是物力损失，都是巨大的。然而我们恢复了被破坏的东西，增加了经济实力并且满怀信心地完成了防御任务。这难道不是对未来的经验教训吗？

不能容忍的是，有些国家在错误观念的基础上制订政策。我们知道，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认为，现实的威胁来自苏联绝不是因为苏联拥有核武器。他们这样推断——关于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就另一个问题谈过了，说什么苏联清楚地知道，如果它进攻美国，免不了要遭到美国的还击。美国恰恰也清楚地了解，进攻苏联也将遭到回击。因此只有疯子才会发动核战争。这些人认为，如果让苏联实现其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显示出新的经济和政治潜力，那才是对美国、对西方世界的真正威胁。因此它们指望在经济方面拖垮苏联。

我们诚恳地劝告美国人：不要对我国采取这种立场。指望利用在工艺、先进技术方面的长处来取得对我国的优势是徒劳的。认为苏联现在“束手无策”，只要对它施加更大的压力，就会得到美国需要的东西，从这种推测出发就大错特错了。这种打算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在现实政策中不能把希望当成现实。即使苏联比现在弱得多，它也能够对向它提出的任何挑战作出回答，说实在的，现在只有瞎子才看不见，我国保持强大的国防

并同时解决社会任务和其他任务的能力已成倍增长。

我再说一遍，至于谈到美国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至少是在两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一是相信苏联的经济体制就要开始崩溃了，它的改革将一事无成。第二是指望西方在技术上和工艺上并且最终在军事上能取得优势。这种幻想就产生了下述方针：通过军备竞赛来拖垮社会主义，然后就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这就是蓝图，这种蓝图是幼稚可笑的。

坦率地说，在西方今天的政策中显然缺乏责任感和新思维。如果不停下来，不转向实际裁军，我们大家就可能坐上开往地狱的列车不停地驶向深渊。

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负责的政策。我们和美国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有各自的问题。我们有要做的事情。然而，各个智囊团都在制订战略计划，这种计划的制订者就象魔术师一样，支配着千百万人的命运。这些智囊团的建议归纳起来就是：你们看，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世界各地，苏联都是主要的威胁。我已经说过：应当放弃那种老掉牙的思维。我知道，有这样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在几十年里都受着这种政策和这种思维的束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难道时间没有过去吗？在核时代必须有新的思维。在谈到相互关系的时候，美国 and 苏联首先必须要有新思维。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因此我们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所有国家——甚至是最小的国家的国家利益。应该认识到，大国可以随意摆布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或者至少正在过去。

再谈现实。争取国家间关系 非意识形态化

我深信，早就该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仔细想想过去的教训，勇敢地估计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一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看成“绝对坏”，而把自己说成“绝对好”，这就会把关系引向死胡同。我现在说的不是反共的演说术，尽管它的危害很大。我说的是不善于或不愿意认清人类的共同性及其共同的命运，说的是必须学会正确地、彼此文明地生活在一个地球上。

我们这几代人把苏美两国间的对抗关系作为历史的遗产接受下来了。但是，我们是否一定要把这根仇恨的接力棒继续传下去呢？

当然，我们在和平中生活已经有多年了。如果从整体来说，是这样。然而，现今的国际局势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在继续进行。地区冲突没有停息。战争的危险在加剧。出路在于国际关系人道化。这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这样提出问题：

应当超脱意识形态分歧，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应受到尊重。而为此必须有新的政治思维，这种思维的出发点是理解普遍的相互依存性，它的基础是让文明社会永存的思想。我们能够就这种思维的标准达成协议，那就是寻找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相应办法。如果政治家们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够实现这一点，那将是理智的一个胜利。

我们主张世界局势健康化，我们认为，现实的对外政策有两个特征：考虑本国利益和尊重别国的利益。这是强有力的明智的立场。应当坚决地捍卫这种立场。我们就是这样想的，也是努力这样做的。

疏远是坏事

人们有时说，甚至连我本人也说，苏美两国可以互不依靠地生存下去。没有美国，我们完全能生存下去。没有我们，美国也同样能生存下去。从经济观点来看，这样做是可能的。要知道，今天，我们两国的贸易联系也很少。这没关系，我们照样活着。并且，我们会吸取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教训。

对于我们来说，饲料谷物进口是很敏感的。目前，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保证了，我们不仅有得到谷物的多种渠道，而且我们正在农业中推广能大大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的集约化工艺。我们提出了尽快使谷物打入世界市场的任务。

西方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美国警惕地注视着是否极其严格地遵守委员会所规定的一切限制，不惜干涉参加这个禁运集团的国家的内政，强迫扩大不许出售给我们的商品的货单。

我们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制定了一个相应的计划。该计划叫做《百种材料计划》，因为计划中包括的恰恰是100种材料。这个计划我们不到三年就完成了。我们已经能自力更生地保证90%这种材料。可以说，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所提出的任务。

我们曾坦率地说过，不要妄自菲薄。我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科学潜力雄厚，而国际资本主义伙伴不总是可靠的，它们有时竟然把贸易当作政治讹诈和施加压力的手段。我们采取的措施已开始取得具体结果。在电子计算机、超大型电子计算机和超导材料等方面，取得了崭新的研究成果。一句话，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美国的行为确实缺乏远见和过于自信。它指望，它永远走在前面，而我们永远落在后面。尽管我们知道，许多美国学者并不是这样想的。

然而，由于我们两国多年来的疏远，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失去了多少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啊！由于我们的关系受到不信任和怀疑气氛的毒化，我们没有做的

美好的共同工作，也是数之不尽的。

可见，疏远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并且是很坏的事。何况，经济关系还是政治关系和改善政治关系的物质基础。有了经济联系，就会产生互相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将有助于在政治领域探索解决办法。我想，如果能认真地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继续推进文化领域中的那种虽然发展得不太快、但终究是在往前走的进程，我们两国之间的信任就会得到加强。然而，在经济领域，美国设置了许多障碍，构筑了许多围墙。

是的，我们是在购买谷物。但是，现在这只是为了维持一点贸易关系，否则，贸易关系就会完全中断。但是，如上所述，我们可能很快就不再需要购买谷物了。而我们同美国的其他贸易，实际上等于零。我们只有那么一点点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但已经使那里的人感到不安，并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和禁止。美国有多少不准同我们发展贸易的法令啊！

我再说一遍：从贸易这一点来看，总的来说，美国没有我们当然能生活下去，我们没有美国当然也能生活下去。但是，如果考虑到，世界上许多事情取决于我们和我们的相互谅解，那么，就应当正常地发展和加深这种相互谅解，因此需要发展贸易。这是正常的，也是有意义的。

美国某些人士没有相互往来的诚意和愿望，没有这

种愿望。只有在某一方面能从苏联捞到点什么的时候，他们才干。而一提到对等原则，他们就什么都不干了。

也许，有些事情，甚至许多事情也取决于我们。可能是我们不会做生意。也可能是我们同样没有特别努力，因为不这样做我们也过得去。总之，为了推开障碍，不仅需要苏联的推土机，而且也需要美国的推土机。

恰恰应当这样解决信任问题。这里靠咒骂是一事无成的。通过现实进程和实际行动，其中包括双方在发展贸易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其他联系方面的努力，当然还包括停止军备竞赛方面的努力，才能建立起信任。共同关心解决地区冲突也能促进信任。

有人对我说，先要建立信任，而后再来解决主要问题，我不明白这种说法。这不过是一种借口。难道信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或者由于苏联和美国喋喋不休地说它们主张信任，就能产生信任吗？当然不可能。这是一个进程。而且，信任程度一向总是取决于现实关系和各个领域合作的发展情况。

我们应当相互更好地了解，避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任何意外事件和未卜事件。我再重复一遍：我们需要进行合作，不仅是由于经济因素，而恰恰是出于政治考虑。我想，我们关系的发展不管由于国内外的原因而怎样困难，怎样复杂，都不能失去主要目标：使我们两国关系健康化。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和通过多次个人接触，我们觉得，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从现实出发考虑问题的人都希望进行合作，而不希望对抗。他们欢迎苏联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并对此寄予巨大的希望。我会见过许多实业界人士，我相信，他们虽说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意，但是思维是开阔的。我满意地回忆起我同阿·哈默博士的多次交谈。他为我们两国间的相互谅解和发展友好关系做了许多工作。不久前，有人向我转达了同另一位美国富豪布朗夫曼谈话的内容。他提出为戈尔巴乔夫干杯，并对自己的交谈者说：“在物质方面，我已享受到荣华富贵。但是，现在谈的是人类的命运。苏联将不断发展，这意味着，它将有能力保持均势，就是说既会有市场，又会有和平。”

毫无疑问，苏联和美国是两个具有广泛利益的强国。我们两国都各有各的盟国和朋友。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都有自己优先考虑的问题。然而，我并不认为，由此一定要得出我们注定要对抗的结论。更合乎逻辑的是另一个结论：苏联和美国对世界的命运负有特殊的重任。

核武器基本上集中在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手里。不必说用百分之几十，就用这两个国家所拥有的1%核武器，就足以给整个星球和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了。

这就是说，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和美國人对各國人民也负有最重大的責任。政治家、我們兩國、我們兩國人民对整个人类社会负有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責任。美國人民当年有足够的力量把美國建設成今天的样子。蘇聯当年有足够的力量把落后的國家變成今日的蘇聯。尽管我們在艱難的历史中经历了各种考驗，今天蘇聯已是一個幅員辽阔的強大的發達國家，它擁有有教養的、有無限聰明才智的人民。既然如此，難道都曾成功地解決了這些历史任務的我們和美國人，就沒有足夠的才智、本領、責任感和相互尊重之心來解決今日世界上的問題和防止發生浩劫嗎？

我們迫切地意識到，我們兩國之間的問題已經堆積如山。在很短的时间里研究和解決多年積累下來的所有問題，是不可能的。如果這樣想，就是幻想，就是空想。蘇美關係中的主要一點是，不要想入非非，而要腳踏實地。

我再說一遍，我們是從現實的政治立場來看世界，來看美國的。我們所持的出發點是，美國人民和蘇聯人民不想自相殘殺。我們從這一點出發，奉行了同美國改善關係的方針，而且我們希望是對等的。

在通往日內瓦會晤的路上

在蘇共中央四月全會（1985年）之後，蘇聯領導人

对工作，包括对对外工作作了重大的“修正”，他们坚信：世界局势极其危险，所以不能忽视那怕是极小的机会来改善局势和向着更加稳定和持久的和平迈进。

我们认为有必要以论据的力量、实例和理智来扭转事态的危险发展。局势尖锐化本身使我们相信，哪怕只是为了深入交换意见，更好地了解彼此的立场，同美国总统直接对话也是必要的。

在会晤前夕，在会晤前好几月里，我们就开始为会晤铺平道路，创造良好的气候。早在1985年夏天，苏联单方面停止了一切核爆炸，表示愿意立即恢复全面停止核试验谈判。我们还单方面暂停试验反卫星武器，并提出了减少核武器的重要建议。我们的坚定立场是，不允许把军备竞赛转移到宇宙中去，还建议在和平探索与利用宇宙方面开展最广泛的国际合作。

在日内瓦会晤前夕，在索非亚举行了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会上，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发出了维护和平、缓和紧张局势，反对军备竞赛和对抗，争取国际局势健康化的强烈呼声。

日内瓦会晤

我对日内瓦会晤的所有细节记忆犹新。在繁忙的两天里，我同罗·里根总统单独举行了几次会谈。确切地

说，这样的会谈举行了五次，还不包括我们短暂的话别那一次。

如前所述，我们的会谈是开诚布公的、长时间的、激烈的，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激烈的。我觉得，我们看到了我们之间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可能成为改善苏美关系的出发点。这就是认识到核战争是不能容许的，不能进行核战争，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

我们方面和美国方面多次谈到这种看法。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在目前阶段，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中心问题是安全问题。我曾对总统说，我们两国不仅有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有相互联系的地方，让我们考虑一下，为了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双边关系，并且以后也许能够使这种关系友好起来，我们应当怎样做。要知道，否则就是彻底毁灭。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谈到必须采取措施禁止宇宙军备竞赛和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谈到保持战略均势的重要性和降低其水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谈到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它是具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追求，自己的政策、传统和理想的各国和各国人民组成的一个丰富多彩的总体。每个国家的人民的自然愿望是实现自己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权。每个国家都有选择道路、制度和朋友的权利。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

美国总统在某些方面同意我的看法，而在许多方面，我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仍然存在。在日内瓦会晤中未能找到解决停止军备竞赛和加强和平的基本问题的办法。

然而，当时，亦即1985年秋天，以至今天，我都一直认为，会晤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在历史的急剧转折阶段，往往需要真理，就象需要空气一样。国际局势由于军备竞赛变得十分令人不安了，在这方面，编造的谎言太多了。必须驱散迷雾，做到言行一致。最高级会晤这种形式的直接对话对做到这一点最为有利。直接对话是不能隐瞒真情的。

在日内瓦，我们彼此有了更好的了解，明确了分歧的性质，为对话奠定了开端，签订了文化交流协定，这个协定已经开始执行并给双方带来好处。我们看到，距离满意的相互谅解还远，必须工作，再工作，以使苏美关系和整个世界向好的方面转变。

日内瓦会晤之后

日内瓦会晤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不主动推进已达到的东西，任何东西也不会自行出现。应把在日内瓦达成并且必须执行的关于禁止战争，不容许谋求军事优势和加速日内瓦谈判的

协议付诸实际行动。我们这样做了。

停 核 试 验

1986年1月1日，我们单方面暂停核爆炸的期限已满。苏联延长了期限。这是迈出的一大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因为宇宙技术、新型核武器，例如，装有核泵的激光武器的发展进程在继续。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勇气采取这一步骤，并请美国以国际社会的利益为重，也来仿效我们的诚意。

禁止核爆炸，这是块试金石。如果你真诚地想消除核武器，你就会实行这种禁令，从而减少现有的武器和停止完善核武器。如果你实际上并不想这样做，你就会千方百计把试验继续搞下去。

停止核试验是一项措施，它会立即把新的可喜的因素带进苏美关系和世界形势中。为实现这个步骤，已经有了一个不坏的基础。苏美两国在禁止三个领域的核试验条约上签了字。我们制定了关于限制地下核试验的协定，并且在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方面有了一定的经验。

早先监督问题上有困难。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并声明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督，为此既利用本国的技术手段，也同意第三国参加的国际监督。

苏联暂停核爆炸是个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建议，

它实际上证实了我们的核裁军计划、我们为实行新政策——现实主义、和平与合作政策而发出的呼吁的严肃性和诚意。

善良的人们欢迎我们关于暂停核爆炸的决定。我们听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赞同声和支持声。政治家们、议员们、社会活动家和群众团体都从这个行动中看到了正确对待当前问题的榜样，看到了摆脱核浩劫恐怖的希望。苏联暂停核试验得到了联合国大会——世界各国最有代表性的会议的赞许。

卓越的物理学家和医生支持我们，他们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原子中潜藏的危险。我们的暂停试验鼓舞了各国科学界人士采取积极行动。

然而，新思维的所有这些明显和给人以希望的表现却遭到了军国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政治思维的反对，这种政治思维落后于国际生活深刻变化的进程这是十分危险的。

美国政府对苏联暂停试验的建议的反应是明确的：它继续进行了一系列核弹头试验。美国政府人士正式宣布，试验核弹头也罢，不试验核弹头也罢，这是莫斯科的事。至于美国，它将坚持试验下去。

我们的核试验场上一片寂静。不言而喻，我们衡量了华盛顿的行动引起的危险，也看到了美国政府耀武扬威地坚持自己的方针，对停止一切核爆炸的呼吁根本不

理睬。尽管如此，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全面权衡利弊之后，仍然根据对世界命运所负的责任，于1986年8月作出了把单方面暂停核爆炸延长到1987年1月1日的决定。但是美国始终没有仿效苏联的榜样。

那么，我们的暂停核试验是不是毫无成果呢？我不这样认为。世界舆论了解到，核试验是可以消除的，并且知道是谁在反对这样做。确实，走向停止军备竞赛道路上的历史性机会当时没有得到利用。但是，整个这一事件的政治教训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如今达成了在1987年12月1日之前开始就核试验问题进行内容广泛的分阶段谈判的协议，我们可以向自己和所有人表示祝贺，事情总算有进展了。

核裁军计划。1985年1月15日，我们提出了规定到20世纪末分阶段消除核武器的为期15年的计划。我们仔细地估计了这一计划，力图在每一阶段上保证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平衡，这就使得在任何一个阶段上任何人的安全利益都不致遭到损害。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是不现实的。在这项计划的基础上，我们的代表在日内瓦谈判中提出了重大的折衷建议。这些建议涉及到中程导弹、进攻性战略武器、不许宇宙军事化。

1月15日的声明具有纲领性质。我们想强调核武器和核爆炸给文明社会造成的主要威胁，同时也不放松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并大大减少常规武器的问题。这是一

整套措施，只是细节未详加阐述。在各个阶段上都起作用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保持均势。需要的不是政治手腕，不是耍滑头，而是政治责任心，是要明确认识到，当涉及到国家安全这样的敏感领域时，谁也欺骗不了谁。

1986年1月15日我们所采取的这一步骤，不仅需要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而且需要有决心，有政治意志。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核宇宙时代，对待安全问题必须采取新的态度。这也是我国全体人民的愿望。

我们在采取这一步骤时，很少想到在宣传上捞到好处和要胜过另一方。这是出自防止核战争、维护和平的责任感。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同世界舆论是一致的，也是响应“六国集团”（印度、阿根廷、瑞典、希腊、墨西哥、坦桑尼亚）的呼吁。

我们非常拥护无核世界的思想。这种充满印度政治传统、印度哲学和文化特点的思想，在关于没有核武器和非暴力世界原则的德里宣言中得到了发展。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编造出来让人大吃一惊的口号。安全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为了搞军事竞争。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其结果只能是造成种种悲惨后果的战争。如果把贮存的大量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其他武器投入使用，世界上的一切就荡然无存了。这关系到人类生存问题。对我们来说，无核世界的思想，是我们饱经忧患后获得的

信念。我们认为安全是一个全面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军事政治方面，而且包括经济、生态、人文方面。

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全面地论证了建立全面国际安全体系的构想。我们把这一构想提交给全世界，提交给真正关心世界和平命运的各国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运动。①

① 这一体系的基本原则，我们表述如下：

1. 在军事方面

——核大国彼此或对第三国不进行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

——不许在宇宙中搞军备竞赛，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不研制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在严格的监督下把各国的军事力量降低到合理的足够限度内；

——解散军事集团，而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步骤，则应不再扩大军事集团和成立新的军事集团；

——按比例地相应削减军事预算。

2. 在政治方面

——在国际实践中无条件地尊重每个国家人民自主地选择自己发展道路和形式的权利；

——对国际危机和地区冲突实行公正的政治解决；

——拟定一整套措施以增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切实保证它们免受外来攻击和保证它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制定有效的办法防范国际恐怖主义，包括确保陆上、空中和海上的国际交通的安全。

3. 在经济方面

——从国际实践中排除各种形式的歧视现象；如果国际社会没有提出直接的建议，就不实行经济封锁和制裁政策；

——共同寻求公正解决债务问题的途径；

——建立确保所有国家同等的经济安全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制定将削减军事预算以后节约下来的部分资金用来造福国际社会，首先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原则；

——共同努力探索宇宙并实现其和平利用，解决决定文明社会命运的

我们今天仍然坚持自己代表大会纲领中的 每一项建议， 并愿意最认真地对待能够有助于把和平共处确立为国家间关系的最高普遍原则的任何主张。

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谈到苏美关系。 我想回顾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声明。 “苏联坚决主张不辜负我们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他们期待苏美领导人采取具体步骤和实际行动， 达成制止军备竞赛的实际协议。” ①代表大会对苏美关系的立场的全部实质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 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 没有美国， 我们就不能维护和平。

全球性问题。

4. 在人文方面

——在传播和平、裁军与国际安全思想方面实行合作；提高共同的客观通报情况的水平和增进各国人民对彼此生活的相互了解；在各国人民的关系中加强相互谅解与和谐的精神；

——根除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根除法西斯宣传及其他一切种族、民族或宗教上的排他性，并在此基础上根除对人的歧视；

——在尊重各国法律的情况下扩大在实现人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方面的国际合作；

——本着人道和积极精神解决家庭团聚和婚姻问题，发展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的接触；

——巩固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和医学领域内的合作，并寻求这种合作的新形式。

（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莫斯科，1986年出版，第75—76页）

① 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第69页。

日内瓦会晤后的美国

美国政府在日内瓦会晤后的表现如何呢？已经多次掀起旨在加剧反苏狂热的吵吵嚷嚷的宣传运动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企图把苏联说成某种吓人之物，挑起恐惧心理，以便让国会批准下一年度的军事预算。从废纸堆里搬出一个“万恶帝国”。总统再次重申不放弃这个定义。

对于这一切，本来可以当作诡辩而不予理睬，不过，正象我已经说过的，敌意的诡辩也会恶化关系。后来，时间越久，问题越多：事情越来越严重——要求苏联减少40%驻美外交人员；美国军舰驶过克里米亚海岸附近的苏联领海；对主权的利比亚进行军事袭击。我们把美国政府在日内瓦会晤后的形势下采取的这些行动看作不仅仅是对苏联的示威性挑衅行为。

这也是对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的挑衅行为。

当时还有人声称美国打算退出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文件被宣布为“极不现实的”。为了避免签署有利于停止军备竞赛的新的重大协定，美国政府宁愿废除现有协定。于是，便开展了一场对本国公众和世界公众的心理灌输工作，以便破坏无限期的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

日内瓦会晤后的时期表明，如果说以前我们是在猜想，只能做一些推测，那么现在我们掌握了证明有人不想履行日内瓦协议的事实。不过，在一切都继续按照老一套行事的同时，他们又想“安抚”公众。

我们又产生了问题：难道华盛顿认为他们是在同神经脆弱的人打交道，可以象冒险赌博那样行事，认为苏联看到越来越多的好战姿态后会发抖？

当时我在陶里亚蒂市讲过一次话。我应当向这个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全体苏联人说明，在日内瓦会晤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做了许多事情并在世界面前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就是说，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了自己在日内瓦承担的义务。

而美国干了些什么呢？我已列举过不少事实，有一个问题自然还一直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不是按声明而是按实际政策来看，美国到底想干什么？美国政府不仅背离了缓和，而且害怕任何气氛变暖的现象。我应当诚实地告诉苏联人民，奉行这种政策究竟为了谁的利益。实际上，对加剧军事威胁感兴趣的并不是美国人民。要谈一谈美国的军界工业界集团。这个集团很象古代的战神，不仅吞噬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大量资源，而且还吞噬消除核战争威胁方面所作努力的成果。

不言而喻，战略防御倡议使我国人民感到不安。我

们谈论此事也不是一次了。然而，是不是又要来吓唬我们呢？也许，应不再“害怕”战略防御倡议了。

当然不允许抱无所谓的态度。我们看到，虽然千百万美国人——其中有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普通公民、科学家、神父、大中學生——反对战略防御倡议，也反对核试验，但美国有一些集团对“星球大战”计划简直是入迷了。这就更加危险，这是美国加紧进行的政治思维军事化的直接结果。

但是，还是应该彻底消除不是由我们造成的印象。要知道，有人恰恰把赌注押在苏联害怕战略防御倡议上，也就是说，要用战略防御倡议在精神上、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吓唬苏联。因此，正在加紧实施战略防御倡议，想借此把我们拖垮。于是我们决定告诉人们：是的，我们反对战略防御倡议，因为我们主张消除核武器。战略防御倡议使世界变得更加不稳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害怕的问题，而是责任的问题，因为后果是无法预料的。战略防御倡议不是加强安全，而是毁灭有助于安全的一切。

我在陶里亚蒂市讲话时曾再次说过，我们对付战略防御倡议的办法将是有效的。美国指望我们将建立类似的系统，指望利用技术优势在技术上拉开距离。但是，我们苏联领导人知道，美国能够做到的东西，我们的科学和技术没有做不到的。用不到1/10的资金建立反系

统就足以摧毁战略防御倡议。

因此，我们决心彻底揭露关于我们害怕战略防御倡议的蛊惑宣传。

我在那次讲话中重复了代表大会的一个提法：我们不奢望得到更多的安全，但也不同意更少的安全。

所以，我们在总结日内瓦会晤以后几个月的情况时，想对西方，对美国，对整个北约说，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和平方针，但是在自己的行动中我们会考虑西方的现实政策。我们不会乞求和平。我们不止一次地对任何挑战进行了反击，我们对这次挑战同样能进行反击。

本来，迎合和满足各国人民的期望，应是日内瓦会晤后美国对我们的倡议和行动的自然反应。然而，美国没有这样做。统治集团把狭隘的利益置于人类的利益和自己本国人民的利益之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这样做是：示威性地、挑战性地和以极端轻视的态度对待国际社会的意见。

这种行为说明，责任感再次屈从于恣意妄为的习惯。

在日内瓦会晤以后，包括美国社会在内，各地普遍产生的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因为在美国的现实政策中，一切都依然如故。

切尔诺贝利的教训

1986年4月给了我们一个极其沉痛的教训：失控的原子，即使是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后果。我谈的是切尔诺贝利悲剧。有关这一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和发生的原因以及有关这一悲剧的后果的报道都是真实的。已经对这一灾难的主要肇事者进行了审判。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国家为了缩小灾难的范围采取了什么措施。

我们在中央政治局曾多次讨论过所发生的事情。在收到第一条消息之后，我们就知道，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既要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评价负责，也要对结论的正确性负责。我们的工作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都亲眼目睹的。不能认为我们是敷衍搪塞和玩弄花招。对所发生的事情需要进行充分的和客观的报道。怯懦的立场不是正大光明的政策。没有任何利益能迫使我们掩盖真相。

苏联领导人直接参与了消除事故后果的全过程。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对人民的职责，是我们的国际责任。为了消除事故的后果，派遣了最好的科学、医疗和技术力量。外国的科学家、工业公司和医务工作者，其中包括美国在内，也帮助了我们，我们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最后，我们在继续发展核动力工业方面，为自己做

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

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其中包括物质上的援助，经过好几万人忘我的努力，成功地限制了事故的后果。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可以安心了。无论是对自己来说，还是对其他人来说，我们都不愿意把局势简单化。

工作仍在进行。我再重复一遍，虽然整个局面已得到控制，但是这一工作还要用几年的时间。

要知道，这里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反应堆的事故！切尔诺贝利无情地提醒了我们，如果爆发一场核风暴，等待我们大家的将是什么。

我不再重复那些臆造的有关切尔诺贝利的无稽之谈。我要说的只有一点，我们高度评价那些对灾难真心表示同情并给予了帮助的人，同时我们再一次看到，世界上积下了多少仇恨和敌视的东西。

雷克雅未克会晤

我们看到，美国的军国主义派——我说的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而是那些把自己同军火生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对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哪怕一点点缓和都会作出过敏反应。这一派人把事情都做绝了，企图尽快忘掉日内瓦会晤，驱散日内瓦会晤精神，清除所有路障，从而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其中包括新的宇宙军

备竞赛。

与此同时，我们也十分清楚，军国主义派远不能代表美国整个政治舞台。持有现实主义立场和冷静地评价世界形势的美国政治活动家考虑到军备竞赛对美国本身也将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主张继续同苏联谈判，主张寻求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但是，正象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军国主义集团的利益总是要占上风。

全面的富有成果的苏美最高级会晤的可能性渐渐消失了。举行新的会晤只是为了握握手，叙叙旧，那是不严肃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但我们为了使立场接近和达成明智的妥协作了顽强的努力，因此我们不能接受美国作出的否定回答。我们意识到，需要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时间越久对人类越不利。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举行过渡性的苏美会晤的想法，目的是为了大大推动整个核裁军工作，制止危险的趋势，使事态的发展转入所需要的方向。美国总统接受了我们的倡议。这给人以希望，从而开辟了通向1986年10月雷克雅未克会晤的道路。

在举行第一次会谈时，我就对美国总统说，苏美对话复杂而广泛的机制在日内瓦会晤以后开始动起来了。但是，这个机制多次乱了步调：在如何消除核威胁，如何利用日内瓦会晤有益的推动因素，如何达成具体的协议这样一些双方关心的主要问题上没有进展。这一点使

我们很不安。我对美国总统说，日内瓦谈判总是老调重弹。在谈判中提出50—100个方案，但是，能够对谈判进展产生实际作用的方案却没有一两个。

我们为雷克雅未克会晤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采取的方针是明确而坚定的——最终就彻底消除核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保证在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所有阶段上使美国和苏联保持均势和同等安全。其他的解决办法将是不可理解的、不现实的和不允许的。我们认为，雷克雅未克会晤应该为我们能够在下一次会晤时就限制军备的最重要问题签订协定创造前提。

我们把一些重大措施的方案带到了雷克雅未克，假如这些方案得到采纳，将为人类生活中诞生一个新的时代——没有核武器的时代奠定开端。这里所说的已经不是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中规定的限制核军备，而是在较短时期内消除核武器。

第一个建议涉及到进攻性战略武器。我声明愿意在头5年期间把这种武器削减50%。

我听到的回答是，各种类型的武器的大小限额和伤脑筋的计算使参加日内瓦谈判的代表团忙了好几个月，最后彻底陷入了死胡同。于是就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是我很快发现，谈判毫无进展。在日内瓦谈判中出现这种胶着状态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为了损害日内瓦谈判的声

誉和把它变成恶作剧而专门制造的。为了摆脱这种状态，我提出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解决办法。有三种战略武器：陆基弹道导弹、海基导弹和飞机。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有这三种，虽然每一方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结构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让我们把所有这三种成分、三种武器类型，亦即这三种武器的每一个部分，都削减一半。既平等，又公平合理。

为了更容易达成协议，我们做了重大让步，取消了我们以前提出的关于把美国能够打到我国境内的中程导弹和美国前进基地武器也包括在战略平衡中的要求。我们也愿意考虑美国对我们的重型导弹的顾虑。

美国总统同意这种做法。而且，他还提出在今后5年内完全消除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主张，我当然坚决支持。

我们的第二个建议涉及到中程导弹。我向美国总统提出完全消除苏联和美国部署在欧洲的这一级导弹。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重大让步。我们把英国和法国用来对付我们的核力量放到一边。同意冻结射程在1000公里以内的导弹，并立即开始就这些导弹今后的命运举行谈判。当然，这里说的是最终使欧洲摆脱这类导弹武器。最后，我们同意美国提出的大大限制部署在苏联亚洲部分的中程导弹数量的建议，在乌拉尔以东地区我们保留100枚这类导弹的弹头，美国在本土上也保留100枚中程导

弹弹头。结果出现了授权两国外交部长着手制订中程导弹协定草案的可能性。

在同美国总统第一次会谈时，我向他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有机地包括在我们建议中的一个问题是，加强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和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制度。

我要美国总统相信：既然我们要削减核武器，我们就应该相信，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做出威胁另一方安全的事。加强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制度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在这方面，我们也考虑到美国总统坚持战略防御倡议思想。我们提出了解决在10年内不使用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权利的问题，并且把不禁止战略防御倡议进行实验室研究一事记录在案。在解决削减军备的问题时，我们将保障双方的安全，不允许通过部署宇宙系统来获取单方面优势。为了对此产生信心，10年内不使用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权利，是绝对必要的。

无论对谁来说，这种限制在政治上、实践上和技术上都没有任何损害。我还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现在我想提醒一下，在雷克雅未克，我们建议美国总统约定：在冰岛首都会晤结束后，两国代表立即开始就禁止核爆炸举行谈判。同时我们对这个问题也采取了灵活的做法，我们宣布，可以把达成完全彻底禁止核爆炸的全面

条约看作是一个可以分阶段进行的过程。比如说，首先解决核爆炸当量的“限度”问题，一年中这种爆炸的次数问题，1974年和1976年签订的条约的命运问题。在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方面，我们也是接近的。

现在我也不认为，通向暂停核试验之路已被牢牢堵死。从我们不得不恢复试验这一点，绝不能得出结论说，只有美国能够写脚本。什么时候会作出现实主义的评价，目前还很难说，但这种时刻一定会到来，甚至会出乎预料地迅速到来。因为生活会给人以教训的。历史上有不少例子说明，局势有时会骤然发生变化。

例如，雷克雅未克会晤出现了给两国外长下达指示的可能性，让他们起草三个协定草案，然后在下一次苏美最高级会晤时正式签订这三个协定。但是，这种光明的、完全可以感觉到的苏美达成真正历史性妥协的前景并没有成为现实，而这的确曾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美国在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方面的立场成了绊脚石。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我一次又一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背离关于加强这个无限期条约的协议。而每一次，我都得出一个同样的结论：美国不愿放弃取得军事优势的奢望，这一次，美国又试图绕过苏联，加紧进行战略防御倡议方面的工作。

我想就此再一次谈谈以下看法：如果美国在战略防御倡议方面的意图得以实现——尽管我们对此深表怀疑

——的话，苏联会接着采取对应措施。如果美国不放弃战略防御倡议，那么，我们也不准备使它的日子好过。对应措施将是有效的、可靠的，而且是经济的。我们正在研究，如何使战略防御倡议不起作用，同时，又不必为此花费美国实现这一计划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让美国人再次想一想：是否值得为自己的战略防御倡议而把自己拖垮。在任何情况下，战略防御倡议都不能保证可靠的防卫。

但是，战略防御倡议意味着把武器扩展到新的领域，这将大大破坏战略局势，而另一方面，坚持战略防御倡议本身说明，其政治意图和政治方针是千方百计地使苏联处于不平等地位。就是这种政治企图，就是这种通过“战略防御倡议”取得对苏联的优势地位的幻想，使雷克雅未克会晤最后未能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

我同罗·里根就这一点谈了很多，并且争论得很激烈。我非常真诚地对总统说，我们会晤的结果不可能只有一个胜利者，要么我们两人都胜利，要么我们两人都失败。

雷克雅未克会晤仍然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明确表明，改善世界局势是可能的。形成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局势，谁也不能象在这之前那样行动了。雷克雅未克会晤使我们坚信，业已选择的方针是正确的，所采取的新的政治思维也是必要的和建设性的。

可以说，这次会晤把苏美对话以及整个东西方对话

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现在，对话已从反复的技术计算、数字对比和政治推理转向新的方面。从雷克雅未克会晤这个高度可以看到解决今天仍严重存在的问题的前景，我指的是安全、核裁军和不允许进行新的军备竞赛的问题。雷克雅未克会晤指明了恢复人类永存权利的行动路线，而自从核武器把广岛和长崎变成一片废墟以来，人类永存的希望就破灭了。

我们认为，冰岛会晤是一个阶段性事件。这是争取裁军的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我们打破了旧的谈判模式，可以说，使苏美对话摆脱了施放政治烟幕和进行蛊惑宣传的做法。在多年的谈判期间，由于双方提出了大量建议，裁军题目变成了一卷乱麻一样的文件，就连政治活动家都很难理清它的头绪，就更不用说广大公众了。我们新的核裁军计划言简意赅。它归纳为四点，并且只占一页半的篇幅，各界人士都能一目了然。我们是有意这样做的，以使世界公众都成为谈判的参加者。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

雷克雅未克会晤的辩证法是：目标变得更近了，人们也看得见了，但局势却变得更加复杂和矛盾了。显而易见，达成就范围来讲是史无前例的协定是可能的，但

是这条道路上还存在着巨大障碍。总的来讲，我们还从来没有如此接近于达成协议。

实际上，就我们纲领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战略武器和中程导弹问题——已经取得了谅解，尽管这是十分困难的。仅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我们理解总统的难处，也理解他不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因而，对于反导弹防御问题曾妨碍雷克雅未克会晤取得完全成功，我们也不感到太悲观。我们认为，该让总统仔细考虑一下所发生的一切，让总统同国会商量一下。也许，还需要一次尝试，才能跨过把我们隔开的障碍。我们可以等一等。我们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中提出的建议也未取消。

雷克雅未克会晤使我们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认识到我们处于何处。在这方面，需要有明确的想法，而不应当持肤浅的看法。无论在什么场合，我都不会认为雷克雅未克会晤是一次失败。这是复杂而困难的对话过程中以及谋求解决方案过程中的一个台阶。应当在广泛范围内谋求解决方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达成协议。我们从雷克雅未克会晤中得出的结论是，对话的必要性更加增强了。正因为如此，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我更加乐观了。

当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在华盛顿达成协议——关于中程导弹和战役战术导弹的协定将在最近一段时间起

草完毕并在今年签订时，这本书已在出版商手中了。这将在真正核裁军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并且是一大步。而这无疑是雷克雅未克会晤取得的实际成果，它证明雷克雅未克会晤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

这里包括对许多人当时提出的一个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是：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世界是否变得更加安全了？

某些人试图把雷克雅未克会晤这出戏（情况的确实富有戏剧性）描写成这样：似乎问题在于一句话，似乎一切都因为一句话而遭到失败。不，问题在于原则。我们已经朝对方迈出了几大步。但我们不能作出这种让步，我回到莫斯科后，曾两次就雷克雅未克会晤的结果发表讲话。这不仅是为了恢复被歪曲了的真相，首先是为了明确今后如何做。我当时谈到这一点，并且现在也认为：雷克雅未克会晤的不成功在于西方某些集团所固有的两个带有战略性质的错误观点。第一，认为俄国人害怕战略防御倡议，因而会作出任何让步。第二，认为我们对裁军的利害关系要比美国的利害关系更大。这种情绪也对雷克雅未克会谈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人们在那里等待我们，因为美国代表团没有带来明确的纲领，只是准备把果子装进自己的篮子里。

美国伙伴老是缠着我们去谈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谈判中长期一无所获的问题。而我们则希望真实地和实

际地体现日内瓦最高级会晤中原则上达成协议的东西，换言之，就是给消除核武器的进程以推动力。

实际上，以前只是谈到了限制核武器问题，而现在谈的是削减和消除核武器问题。既然如此，那就需要堵死采取迂回战术以取得优势地位的全部道路。正因为如此，遵守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问题成了一个关键问题。美国方面在雷克雅未克对此问题所持的立场清楚表明，美国没有放弃取得优势地位的方针。美国方面既缺乏责任心，也缺乏政治决心来迈过这个门槛，因为这意味着要摆脱对军界工业界集团的依从。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认为，雷克雅未克会晤为所有的人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创造了新的条件，无论是对欧洲人、美国人，还是对我们自己都是如此。对我们来讲，目前有一点是明确的：既然美国想回避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拼命想实施作为保证取得优势的一种武器的战略防御倡议，那就需要一揽子解决，而且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而我们不会自欺欺人：我们要用这一揽子解决方案向全世界表明，达成核裁军协定的主要障碍，就是战略防御倡议。

雷克雅未克会晤后的一段时间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军国主义集团显然十分害怕。它们过去和现在都企图设置最荒谬的重重障碍，以便以某种方式使在雷克雅未克开始的进程寸步难行。它们对雷克雅未克会晤的内

容作了各种解释，试图千方百计地隐瞒下列事实：美国方面是两手空空地来到雷克雅未克的，只准备苏联作出让步。

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里，而现在已有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各种各样事情。我认为应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从实质上讲，美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是取消雷克雅未克会晤结果的方针。美国政府的一切行动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亲眼看到，美国是如何开始给雷克雅未克会晤的真实情况制造混乱的，这几乎在西欧引起一片恐慌。

但是，主要的是美国的行动。我是指美国生产出第131架装有巡航导弹的战略轰炸机，这实际上已超出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所规定的限额。其次，我是指故意在政府内掀起喧嚣一时的辩论，为对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作所谓广义解释制造声势。而1987年头几个月，我们听到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美国应当着手在宇宙中部署战略防御倡议的第一批装置了。

而且，日内瓦的谈判工作死气沉沉。他们试图使我们后退，并再一次把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摆到谈判桌上来。作为宣传材料，他们广泛散布关于苏联态度强硬和不肯让步的说法。说什么苏联提出了自己的一揽子建议，没有提供今天就能解开症结的条件。

我们当时应该怎样办呢？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吗？

这种行动方式决不会取得好的结果。

我们不仿效美国的“榜样”，并且声明：我们仍将信守自己对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所承担的义务。考虑到当前苏美战略力量的平衡情况，轰炸机多一些或少一些，这很难说明什么问题。华盛顿背离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种举动与其说具有军事性质，不如说具有政治性质。这是用一种特殊形式“邀请”苏联回到雷克雅未克会晤以前的时期。

我们冷静地对待美国极端主义集团发表的必须加紧实施战略防御倡议和立即开始试验乃至部署宇宙基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讲话。

至于说对苏联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的议论，那么，我现在也认为，如果美国接受这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并对它作一些可能的修改和某些变动的話，这将是迈出一大步。在这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中，早就包括了限制并消除进攻性战略武器以及不允许宇宙军事化的问题。它们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联系。对军备竞赛扩展到宇宙中去这件事不加以严格的限制，也就不能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所有的人都应当完全明白这一点。

我们在雷克雅未克会晤时，把有关中程导弹问题列入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希望在所有关键方面同时朝收缩军备竞赛势头的方向前进。同时，我再重复一

遍，我们希望让全世界都看清楚，战略防御倡议是走上核裁军道路的主要障碍。许多西方政治家批评并谴责我们把中程导弹问题列入了一揽子解决方案。我知道，某些社会人士也不同意我们的做法。但是，我认为，当时我们的做法是对的。

莫斯科会议与中程导弹

“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的莫斯科会议给我和其他苏联领导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直接感觉到了世界公众的心情以及他们对雷克雅未克会晤命运的不安与忧虑。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苏联不得不终止单方暂停核试验的决定，这是由于美国破坏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并使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受到威胁。我们非常认真地权衡了一切，并决定再迈出一步，以便使日内瓦谈判富有生气并使裁军取得积极进展。我指的是把中程导弹问题从一揽子解决方案中单列出来。

结果怎样呢？

正如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一样，北约阵营又一次开始感到恐慌。大西洋统治集团对我们迎着西方迈出的新步骤的回答是，开始当众背离它们自己所长期坚持的立场。它们开始放弃自己的“零点方案”或给它附加种种

限制条件。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建议着手扩大欧洲的核武库——用美国的战役战术导弹来“补充武装”欧洲，以代替裁减核武器。

我们还听到这样的说法，说什么如果苏联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如果它把西方社会当作自己的榜样，那么，西方就会对苏联提出的削减军备的建议表示信任。这就太滑稽了。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特别是在我们提出就中程导弹问题签订单独协定的建议之后，在北约集团中，对没有核武器能否保证欧洲安全这一问题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对于这一点，我同玛·撒切尔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她说，对英国来讲，核武器是在欧洲发生常规战争的情况下保证它的安全的唯一手段。但这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哲学！我对英国首相说：“您一定要我们相信，核武器是一种好东西，让美国和苏联削减各自的核武器吧，而英国却不动，那么，大家马上就会明白，在我们面前有一位核武器的热烈拥护者。让我们开始裁军进程，把中程导弹从欧洲撤走，并把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50%，或者是另一个数目，而您却扩大自己的核力量。您在世界舆论的眼里将是怎样的形象呢？您考虑过这一点吗？”

我认为有义务提醒注意：英国曾经是全面彻底禁止

核试验三方会谈的参加者，而后来却失去了对这种会谈的兴趣。我们在一年半多时间内恪守单方面暂停核爆炸的义务，而英国却避开了。

核武器的存在时时刻刻孕育着无法预料的冒险。如果认为核武器是好东西，是安全的可靠保障，那么，让我们也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取消吧。尤其是今天，几十个国家都拥有科技条件和物质条件制造自己的炸弹。目前的核大国有什么道义上的权利来拒绝如巴基斯坦、以色列、日本、巴西以及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呢？但是，那时世界和国际关系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中央政治局在评价局势时，重申苏联领导人坚决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似乎不依靠核武器，处理国际事务以及国际安全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还要回过头来谈谈中程导弹问题。严格地说，欧洲“零点方案”当时是由罗·里根总统提出来的。而赫·施密特正凯觐这一思想的最先专利权。在他担任联邦德国总理时，他的确第一个提出了这种建议。在雷克雅未克，我同美国总统找到了解决方案，几乎使这一问题达到了达成协议的阶段。现在可以赋予它生命力了。一家西德报纸写道，联邦德国有一些活动家曾竭力主张抓住戈尔巴乔夫的话柄。但是，戈尔巴乔夫同意了“零点方案”，他反而抓住了他们的话柄。这家报纸写道，看这些活动家现在如何证明，他们当时不是进行

蛊惑宣传，他们提出自己的“零点方案”，不是指望俄国人反正会拒绝的。读了这篇文章，我笑了笑，但仔细一想：这家报纸说的还是对的。

战役战术导弹问题也可以解决。我们主张消除这种导弹。但是，结果如何呢？乔·舒尔茨来到莫斯科（1987年4月）并开始要我们相信，美国应当有权进行“补充武装”——拥有一定数量的这一级导弹，直到苏联彻底消除这种导弹为止。多么不可思议的逻辑！根本不是什么逻辑！我们正在销毁从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撤出的短程导弹，而后准备销毁剩下的这一级导弹。可是当我们提出这一建议时，北约开始围绕着这一建议兜圈子，就象猫围绕着盛有热饭的碗打转儿一样。历史又在重演。

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丧失信心。纵观1987年春天和夏初在日内瓦谈判中形成的局面，并倾听一下公众——不仅是欧洲公众，而且还有亚洲公众的呼声之后，我们又迈出了一大步。

1987年7月22日，我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宣布，苏联准备销毁自己的全部中程导弹，也包括它在亚洲部分的中程导弹，即取消关于保留同美国总统在雷克雅未克商定的，而后来在日内瓦谈判中提到的那100枚中程导弹弹头的问题。当然，条件是美国也这样做。战役战术导弹也将消除。总之，苏联愿意实行“全球双零点方

案”。

我们有权问心无愧地说：为了使不是消除一级，而是消除两级核武器的第一个重大协定生效，苏联已竭尽了全力。

但是，为了阻挠达成协议，过去和现在设置了多少障碍呀。为了使理智、健全的思维战胜核武器狂，需要越过多少障碍呀。

请你们自己想一想，如果我们赞同双“零点”方案，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仍将保留72枚“潘兴—IA”式导弹，并为这些导弹保留相应数量的美国核弹头，我们会是什么滋味。要是那样的话，一切就都被抛在一边了，无论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无核地位，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还是各方平等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波兰找到我们，并请求向它们提供用来抗衡美国和西德导弹核装置的力量，那时该怎么办？军备竞赛在一个方面被堵死，但又将沿着新的轨道进行下去，难道能容忍这种形势吗？

我对美国国务卿说：您难道真认为我们会软弱到无止境地讨好你们的政府吗？或者，您认为，我们同发展苏美关系有着更多的利害关系，因此，美国方面可以在这方面什么也不做吗？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这是一种错觉，一种十分危险的错觉。我是直截了当地这样讲的，不带任何外交色彩。

世界由于紧张局势而疲惫不堪。人们急不可待地期望会出现局势健康化和战争威胁减小的机会。为了能出现这种机会，苏联已经作出了空前的让步。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就会给整个世界政治打上烙印。

试问，我们苏联其实又何必为这些事着急呢？要知道，我们要消除的中程导弹比西方多，在战役战术导弹方面，情况也大致相同。谁在催促我们？催促我们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明确意识到必须做点什么，必须采取某种实际步骤，使裁军的进程毕竟能开始，哪怕是缓慢地开始，哪怕是受到具体条件的制约。

应当在各种谈判中和集会上，首先是在日内瓦谈判中，探索尖锐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对谈判予以极大的重视。我想，现在读者都知道，我们为使谈判取得进展作了些什么。

我们并不希望为谈判而谈判。在美国有人会对此感到满意（我应老实地这样说），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谈判在进行就可以了。我们对此并不满意。进行谈判是好的。但应该在谈判中向前进，以便取得进展，使我们达成协议，使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最终通过日内瓦协议得到解决紧迫问题的办法，这种解决办法有可能消除核威胁和走上裁军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竭力争取的东西。如果只是把谈判作为掩盖继续执行各种军事计划和增加军事预算的幌子，那

我们是反对的，坚决反对。这种态度是不能接受的。

当然，要改变立场是不容易的，因为50年以来东西方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一立场上的。但是，新情况已经逼上门来了。我们当代的政治活动家应当仔细倾听它的声音。遗憾的是，许多政治家仍然受老一套框框的影响。

选择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我们大家都在经受诚意、政治勇气和理智的考验。显而易见，顺利解决与中程导弹和战役战术导弹有关的问题将是有意義的，并将给整个裁军进程带来重大成果。它将成为信任的因素，而信任是如此的缺乏。

不言而喻，我们将继续进行战略武器和削减战略武器方面的谈判。美国和苏联之间在战略力量的实力和潜力方面有大致的均势和平衡。我从美国方面不止一次地听到，美国认为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是一种特殊的威胁。我们也认为美国方面的潜艇弹道导弹是巨大的威胁，因为它们不易受到攻击，装备着分导多弹头，而且十分准确。我们认为威胁也来自在苏联周围建立的许多军事基地。然而，我们之间存在着战略的均衡。因此，如果说在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结构和数量方面，今天的战略均势还有保证的话，那么在削减50%的情况下，这种均势仍将存在，但已经是在更低的水平上了。这就使局势发生变化。这正是我在雷克雅未克向里根总统所建议的——将三位一体的全部战略武器及其每种武器部分都削减一

半。这将会是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

当然，还必须严格遵守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至于战略防御倡议，我们并不反对在实验室、研究所、制造厂、试验场范围内进行研究工作。我们的这个建议，事实上已考虑到美国在对待战略防御倡议的态度上所存在的5至8种立场。但愿专家们坐在一起，弄清楚并确定，哪些组成部分可以送进宇宙，哪些不行。我们的妥协思想为解决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苏联为创造新环境和新条件来推动苏美关系和改善这种关系采取了许多步骤。最近几十年来，没有一届美国政府提供机会，为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做点什么。你们看它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除了商定缔结中程导弹和战役战术导弹协定外，暂时还没有做什么。

时间紧迫。我们相信，要么达成协议，要么什么也搞不成，只是继续往苏美关系的阴火中添干柴，使它根本灭不了。

在我们的政策中，我们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骤使这种政策摆脱意识形态的成见。西方也应当这样做。首先要放弃这样的谬论，即苏联比西方更需要裁军，只要对我们施加压力，逼迫一下，我们就会放弃均势原则。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请看吧：苏联的所有建议，无论怎么仔细地研究，都规定着各个阶段的均势和均衡。这包括核武器，常规

武器，化学武器，包括任何地理区域——东方、西方、欧洲、美洲。我们正在周密地制定我们的建议，我们的依据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同意采取有损于自己安全的行动。在这方面不会再前进了。

当我们在谈判中，譬如在日内瓦或者其他地方的谈判中提出自己的建议时，我们的出发点是：如果我们只考虑苏联的利益，不考虑对手的利益，任何条约都搞不成。我们呼吁美国方面也这样对待我们。因为我们不容许谋求优势，不容许损害我国的安全。我们也不想损害美国的安全。如果双方都抱这种态度，那么，在苏美合作的各个方面就有可能取得重大的进展。

当然，我们可以等待下一届美国政府。但是，我们认为最好是同本届美国政府达成协议。我们已经开了头，有了私人交情和一定程度的谅解。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正常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就有可能最终达成协议。但是，美国方面往往不那么顺当。更坏的是，每当我们迎合华盛顿采取某个步骤时，那里的反对势力就猖狂起来，它们竭力使事情复杂化和阻止出现预料中的进展。

关于大使馆窃听的风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同乔·舒尔茨谈话时，我向他提出了一个“新想法”：他和谢瓦尔德纳泽就是“主要间谍”。而我们两国分别驻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大使也是“间谍”。他们坐在各自

的岗位上，正是为了正确报告驻在国的情况和意图。因此，围绕大使馆间谍案掀起的这场喧嚣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了解美国的全部基本情况，美国也了解我们的全部基本情况。而这次间谍案之所以掀起，是因为这已成为一个规律：只要想干点什么，只要有可能在我们两国关系中解决点什么问题，立即就会搞出点花招，把事情弄糟。

我知道，正在编造有关苏联领导人对罗·里根总统的看法的各种臆测。我个人对总统有印象。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会晤过两次，会谈过许多小时。我认为，我和总统是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认真对话的。有时，我们相互说些令人不快的事，甚至公开地说，激烈地说。我从自己方面说：我们将继续作出努力。我们将寻求合作，将寻求途径同美国人民选出的任何一位总统和任何一届政府进行有成果会谈。选谁：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这是美国人民的事。我重说一遍，我们将同美国人民委托领导国家的那个政府进行合作。并且我认为，在各种情况下都应该这样做。美国方面也应该这样做。让美国人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生活在自己的美国吧，而我们将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生活在苏联。让我们不再把政治活动家分为受人爱戴的和不受人爱戴的，受尊敬的和不受尊敬的吧。有现实，就必须尊重现实，否则，政策将变成心血来潮、鲁莽行动和缺乏预见性。在政策

中不能这样行事，在美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更不能如此。这是十分严肃的事情。

十分重要的是，苏联和美国都要相信：我们必须达成
协议，我们一定要学会在和平中生活。

苏联和美国今后都面临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量
工作。我们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单独完成这
项工作。我指的是当代最关键的问题——消除人类在核
战争中毁灭的威胁。如果这项工作进行得顺利，那么，可
以预见，苏美关系将繁荣起来，也可以说，将出现一个
“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对苏联和美国，对其他国家以
及整个国际社会都会有好处。

结 束 语

已经是结束的时候了……但是最后还想说几句。

我深信，书并没有写完，并且也不可能写完。为了达到我在书中十分坦率地谈到的那些目标，要进行工作和采取实际行动，应当用这些工作和行动来补写它。

改革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批判地认识自己所走的每一步，用实际成果来检验自己，并深刻地意识到：今天看来可以接受的东西，明天有可能成为过时的东西。这就是社会的革命更新过程的逻辑。

过去的两年半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今后几年，也许今后几个月将会看到一些新的打破常规的步骤。在改革过程中，我们正在加深和修正关于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概念。我们在重新认识自己。我们过去和现在这样做，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并不是为了使人吃惊，出于“爱好”，为了博得掌声。我们前进的动力是十月革命的思想，列宁的思想，苏联人民的利益。

我们相信，改革也将在国际关系中，其中包括在苏

美关系中萌芽。学会新的政治思维是时代的要求。

威胁人类的危险非常大。今天，对抗的成分相当浓，但是我们认为，愿意并且能够制止和消除这种对抗的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

从怀疑和敌视转向信任，从“恐怖均势”转向理智和诚意的平衡，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转向合作，这就是我们呼吁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提出和平倡议的目的，为此我们将继续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世界上，人们越来越渴望相互了解和彼此交往。政治家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在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界人士及广大的居民阶层中，这种愿望也不断加强。如果说俄语中“改革”这个词已很容易地成为国际词汇的话，这大概不仅仅是因为对苏联正在进行的改革感兴趣。现在，全世界都需要改革，也就是需要向前发展，需要质变。

人们意识到并理解这一点。他们需要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需要认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需要了解清楚怎样继续生活下去。这个充满核武器的世界必须改革；这个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存在着贫穷、落后和疾病的世界必须改革；今天必须保证自己生存下去的人类需要改革。

我们大家都是学生，而生活和时间是老师。我相信：人们将越来越认识到，从广义上来说，经过改革，

世界将会接近起来。在获得主要老师——生活的肯定评价之后，我们将胸有成竹地跨进21世纪，并且相信，人类的进步将继续下去。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世纪中，自由能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希望，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能无拘无束地展开，这种竞赛能鼓励互利合作，而不是对抗和军备竞赛。我们希望，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富足、安宁和幸福。达到这一目的要通过争取无核世界和非暴力世界这条道路。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并且呼吁其他国家和人民也走这条道路。